



國論叢書

國防中心論

陳啓天等著



上海大光書局刊行

圖書室

MG

E296.1-53

6

國論叢書

國防中心論

陳啓天等著



3 1763 7547 9

上海大光書局刊行

册		卷

國防中心論目錄

序

國防中心論·····	陳啓天
國防與文化·····	李璿
國防與政治·····	陳啓天
國防與教育·····	邱椿
民族文學與教育·····	邱椿
國防力之「平時經濟性」與「戰時政治性」·····	劉崇岳
從近代戰爭說到我國國防問題·····	沈雲龍
國防與外交·····	謝承平

國防與財政.....	張希爲
從「五四」談到國難.....	左舜生
非常時之青年自處與青年指導.....	左舜生
近代中國的大變局與非常時.....	陳啓天
精神統一與政治統一.....	陳啓天
夾攻中的奮鬥.....	陳啓天
爲國難告國民.....	陳啓天
巴澤的國防科學論.....	鄒江楠

國防中心論序



(南)

這本論文集是集合左舜生、李璣、邱椿、陳啓天及其他諸先生近年一部分的作品而成。每篇題目雖然不同，然有一個共同主旨，便是以國防爲中心。以國防爲中心的主張，他們在十餘年前即曾提出，經過近年國難的嚴重教訓，始獲得全國一致的共鳴。以國防爲中心的要點是：

一、國防的強弱，與國家的強弱成正比例。要救國家，必先強化國防。

二、現代所謂國防，已由狹義的軍事國防，擴大到整個國力的國防。換句話說，便是全盤國家設施，須以國防中心爲根本方針。

三、國防必須做到國家總動員；要做到國家總動員，必先求得國家的統一。

四、國防在精神方面與物質方面的要求同等重要，即國防的實施，必須同時注意精神國防。

序

與物質國防。

五、國防問題，不僅是國家改造的問題，而且是社會改造的問題，不僅是政治、軍事、外交、財政、經濟、工業、交通等的改造問題，而且是文化、學術、藝術、文學、教育等的改造問題；不僅是制度改造的問題，而且是生活改造的問題；不僅是事實的改造問題，而且是理論的改造問題。總說一句，國防問題，是整個國家根本的改造問題。

本書各篇是依據這些要點討論國家各種問題。至於爲甚麼必須以國防爲中心，又應如何以國防爲中心，本書各篇均大略討論到了。我們希望藉此書引起詳細的研究，我們尤希望藉此書促進實際的進行，所以又大胆彙刊着問世。

中華民國廿五年九月一日編者誌。

國防中心論

陳啟天

近年因國難日益嚴重，凡屬真正愛國的人們，幾莫不在極度煩悶之中，尋求一種救國的辦法。有的說要這樣，有的說要那樣，却很少有人將這樣和那樣構成一個整個的方針，更少有人在整個的方針之中，確立一個中心的政策。一個國家在平時尚且不可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而在非常時當更不可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換句話說，無論國家在平時或非常時，必須有一種立國的整個方針，同時又必須在整個方針之下，有一種立國的中心政策，何以必須有一種立國整個的方針呢？原來每個國家的設施，千頭萬緒，不可勝說。千頭萬緒，同時俱舉，既爲財力所不許，也爲事勢所不能。我們必須在千頭萬緒的設施中，尋出一個先後緩急的條理脈絡來，然後才易於求得實效。這便是要對於國家的一切設施，預先加以調整，使其先後有序，緩急得宜。

在調整國家全盤設施的整個方針之中，尚須確定一個中心政策，以爲貫徹各項設施的總目標。然後可以一面免去彼此衝突的毛病，又一面獲得殊途同歸的功效。中心政策是整個方針的聯繫，也是整個方針的歸趨。沒有中心政策，整個方針便無從確定。沒有整個方針，中心政策也無由實現。因此現代列強莫不各有各的中心政策和整個方針，以爲立國和治國的根本前提。然而我國自清末到現在，整個方針在那裏？中心政策又是什麼？我們將近數十年中國的歷史仔細翻看，找不出一個確切的答案。只見今天這樣，明天那樣，這個人這樣，那個人那樣，始終在混亂中打圈子，不見有始終一貫和全國一致的中心政策和方針。無怪一切努力幾乎都成白費。更無怪國難當前，多半束手無策！

我們爲懲前毖後起見，必須要求一種立國和治國整個的方針；而確定整個方針之先，又必須要求確定一種中心政策，以爲整個方針的基本方針。這個基本方針，在橫的方面，要能超越各個人，各黨派和各地方，而成爲全國一致的共同目標；在縱的方面，要能兼具「應急之策」與「百年大計」的兩重功用，而成爲始終一貫的繼續努力。如此，才能構成一種中心政策。中心政策

的必要，大概已爲一般論者所承認。本篇可不多談，但我們必須詳細說明的，是今後中國究宜用什麼做中心政策。關於此點，我們可先簡答一句，便是今後中國只宜用國防做中心政策。提到國防二字，一般人常常聯想到軍事，甚至與軍事完全混同。自然，軍事在國防中的重要，也是我們所承認的，不過軍事雖在國防中居於重要的地位，却並不能說除軍事外，便無國防。原來近代所謂國防，已由狹義的進到廣義的，即已由軍事的國防進到整個國力的國防。而所謂整個國力，不但指物質之力而言，並且含精神之力在內，所以近代的國防，既盡力在軍事方面講究，同時又在其他方面如政治、經濟、教育、外交、社會以及國家的一切設施上講究。即國防的內容，由軍事一部分，擴大到國家設施的全部，軍事的設施，固以國防爲惟一無二的重要目標，而軍事以外的國家設施也都含有國防的意義，於是國防遂成全盤國家設施的最要線索或目標。要充分完成整個的國防，必得注意國家的全盤設施。要充分完成軍事的國防，也必得注意國家的全盤設施。換句話說，國家的全盤設施，須以整個國防做着眼點；同時軍事的設施，也必須賴國家全盤設施的助力，才能完成堅實不拔的國防，這是我們提到國防，不可不首先注意之點。

國防二字的意義，已略說明。我們可進而討論今後中國何以必須以國防為中心政策。關於此點，可分四大理由來說明如下：

第一為應付當前國難，全盤國家政策必須以國防為中心。國難之來，原不自今日始，也決非今日所能了。今日以後，恐只有一天一天的嚴重，這是必然的趨勢。原來日本自明治維新起，即已確立大陸政策。數十年來全國一致的向這個政策繼續進行。甲午戰役是他初步的成功。日俄戰役是次步成功。「二十一條」和對德宣戰是三步成功。「九一八」事變是四步成功。這樣一步一步的演到現在，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發祥地華北五省也陷於危亡的境地。日本越成功，中國便越危亡。任此下去，日本大陸政策完全成功之日，便是中國整個亡國之時。現在中國的命運，已進到最後的生死關頭。這種生死關頭之所以到來，完全由於過去數十年間沒有樹立以國防為中心的整個國家政策。今後究竟如何才能渡過這個生死關頭？有人以為國力不如人，只有暫且求和。然而求和已有數十年了，所得結果又有什麼？日本不是仍舊「依其所信，邁步前進」嗎？日本利用中國求和的空氣，既已從事製造漢奸和準漢奸，以便「以華制華」，又實行「一面交涉一

面佔領；「猶恐不能制中國的死命，還要增加華北駐軍，並強化東北駐軍。這些事實，不是已經表明求和不可能嗎？求和既不可能，那便只有準備一戰。與其和而亡，無寧戰而亡。今後我們必須確切認定中日的前途，無論中國如何曲意求和，決無共存共榮的可能。除非中國甘願整個亡國，最後也不得不出於一戰。與其他日迫不得已，倉皇應戰，無寧從速準備，決心一戰。要決心一戰，則先務之急，莫過於確立以國防為中心的整個國家政策。過去的錯誤，我們暫且按下不提；今後的補救，只有從速確立此種中心政策，從各方面切實推行，準備隨時一戰。老實些說，近年日本之所以敢於進逼不已的重要原因，不在歐美的坐視，也不在日本的富強，而在中國從無一點對外的戰備，甚至連對外的戰意也一點沒有。「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正是中國今日處境的寫照。我國要免於弱昧亂亡，而不為人所兼攻取侮，那便只有確立戰意，充實戰備。要確立戰意，充實戰備，那又只有先行確立以國防為中心的整個國家政策。這是從應付國難上說，非得如此不可。

第二為準備國際鬥爭，全盤國家政策必須以國防為中心。現代世界是怎樣的一種世界？我們可簡單的說，是國際鬥爭最劇烈的世界。一切國家都是各求發展，互相鬥爭。每個國家對外的

第一前提，是本國利益的擁護。爲擁護本國的利益，自不免引起國際的衝突。既有了衝突，自又不得不求鬥爭的勝利。鬥爭的方式，是用和平的方法做前衛，戰爭的方法做後盾。戰爭的方法，固是鬥爭；和平的方法，也是鬥爭。也可說和平方法是戰爭方法的準備，戰爭方法是和平方法的結束。所以現代的國際和平是完全建立在各國的國防之上。沒有國防，固不能從事戰爭的鬥爭，同時也不能從事和平的鬥爭。因此各國莫不盡方國防的準備，從事軍備的競爭，以便隨時可操戰勝的把握。自平時狀態到戰時狀態，幾無什麼根本差異。戰時是武裝的鬥爭，平時也不過是武裝的和平。所以近代各國都成爲「戰國」，近代世界也就成爲另一個「新戰國時代」。「新戰國時代」的最要特徵，也同中國歷史上的戰國時代一樣，非常重視戰爭或國防。德國元帥封塞克氏說：「世界史的表面現象，大半都是戰爭史；直到現在，沒有一本時髦歷史書，能把戰爭摒除於民族發展之外，說戰爭和媾和在世界大事中沒有重要地位。」（見魏以新譯國防軍）霍馬氏說：「自紀元前十五世紀以來，至現代止，三千四百年間，和平時期僅三百三十四年。」俄人布洛說：「自紀元前一四九六年，至紀元一八六〇年，三千三百五十年間，和平年間僅爲二百二十七

年。」（見郭甄泰著中國國防政策）這都是從事實上說明戰爭對於國家的重要。因此各國既在財政上支出很大的款項，竭力充實軍事的國防，又多將一切國家設施置於國防目標之下，以求國際鬥爭的勝利。這種情形，在所謂資本主義國家，固多是如此；即在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如蘇俄，尤其是如此。蘇俄有龐大的國防設備，五年計劃同時又是國防計劃，便是一個鐵證。蘇俄所謂「世界革命」和「扶助弱小民族」，只是蘇俄的一種國防戰略而已，那裏情願，並且真能扶助弱小民族呢？總說一句，近代列強，無一不是準備國防力量，努力國際鬥爭的「新戰國」。近百年來，閉關的中國被這些「新戰國」的壓迫，走入了一個新時代，便是「新戰國時代」。中國加入「新戰國時代」的初期，雖曾一度講求「輪船槍砲」以圖自強。可是經過甲午，庚子兩次戰役以後，便漸次放棄了國際鬥爭的準備，而旋轉於國內鬥爭的紛擾，致今日東北既失，華北亦危，幾已不堪立於國際鬥爭之場。其所以如此的重要原因，惟在中國既已加入世界的國際鬥爭，而又無國際鬥爭的有力理論與切實準備。列強所信的理论，是「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中國所信的理论，是「禮讓爲國，懷柔遠人」。這是在理論上顯然處於相形見絀之地，簡直沒有國際鬥爭的意向。

還要自誇爲「王道」，笑人爲「霸道」！列強固相信「霸道」，却對中國始終勝利。中國所謂「王道」固深入人心，然遇到強則始終慘敗！我們如不顧中國長此慘敗至於滅亡，只有拋棄什麼「王道」，而絕對信仰：在國際上惟有鬥爭，才能生存；惟有準備整個國家努力國際鬥爭，才能獲得最後勝利。要努力準備國際鬥爭，那便必須先以國防爲全盤國家政策的中心政策。國防是國際鬥爭的必要工具，國防沒有準備，你想從事國際鬥爭，必須努力準備國防。而準備國防的先務，便是須以國防爲中心政策。列強爲應付未來的世界大戰，都已有走上國防中心的趨勢。中國在未來的世界大戰中，是絕對無法中立的。中國爲求免於在未來的世界大戰中處於純粹犧牲的慘境，則第一要着爲從速確定國防中心，努力國防準備，況且在未來世界大戰尚未爆發以前，列強之中已有人想完全征服中國，以使他在未來世界大戰中得操勝算，世界大戰也許即因中國的問題引起，那麼我們更無法避免了。既無法避免，便莫如積極準備參加。要準備積極參加，那也只有從速確定國防中心，努力國防準備。

第三爲振作民族精神，全盤國家政策必須以國防爲中心。原來中國的民族精神，本是極端

盛的。從前嚴辨夷夏，主張「攘夷」，這是中國民族精神表現在理論上的明證。中國自黃帝開國以來，漸次擴大，構成漢滿蒙回藏五種混合的中華大民族，綿延五千年的歷史，創造特殊的東方文化，佔據四三千三百萬方里的亞洲大陸，並且拓殖到南洋各地，這是中國民族精神表現在事實上的明證。不過近百年來，遭遇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的許多強敵，致對外戰爭與交涉迭歸失敗。因而民族精神漸由強盛而轉變為衰頹。衰頹到現在，至於有人發出「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憤語。民族精神的強盛與衰頹，究竟宜用什麼標準來分辨呢？最簡要的標準，似莫過於看看一個民族對外鬥爭的意志和行動如何。近三四十年來，中國民族對外鬥爭的意志顯然一天一天的薄弱，對外鬥爭的行動也顯然一天一天的減少。中國民族精神的衰頹，已成不可掩的事實。在數十年中，國家全無一點對外的國防準備，是民族精神衰頹的積極證據。近數年來，遭遇空前未有的國難，迄今尙未能形成舉國一致對外的行動，是民族精神衰頹的消極證據。此外還有最可痛心的證據，便是投降敵人和擁護蘇聯的兩種漢奸一天一天的加多。關於中國民族精神衰頹的現象，最近潘光旦先生曾有所討論，如下：

我們可以說，民族競存的意志，目前實在受好幾方面的威誘：一是個體生存的意志，大於團體生存的意志。一個人但顧身家性命可以委曲求全，別的都以不管；甚至於把公家當犧牲品，亦在所不惜。躺在租界裏的富翁，甘心出賣國家的漢奸，全都受這種意志的支配。二是苟安的心理，大於振作的精神；維持現狀的祈求，大於開拓發展的願望。一條陋規，明知其「陋」，而依然不失為規；一個偏安之局，明知其「偏」，而依然可以「安」之若素；全部是此種苟且心理的表見。三是自餒心理的變本加厲。吃了敗戰，畏首畏尾，固然是自餒的表示；和強國辦外交，別人的要求還沒有出口，我已經先意承旨，也未始不是自餒的表示。承認別人的文化有百是而無一非，自己的有百非而無一是，以為非全盤西化不足以圖自強，也未始不是自餒的表示。四是操切的種種風俗上的改革所可能引起的一種生活上的不寧靜與失望。……民族全般競存的意志，在四者合力威脅之下，不免呈一種異常瑟縮之象，是可以斷言的。……民族的病象，我們以前所已診察過的，也不只一端了，但以競存的意志的薄弱為最關重要。此種意志上一有病象，就無異一個參加比賽的運動員，在沒有上場以前，

便爾宣佈了棄權（自由評論第十二期民族競存的意志）

今日中國似乎像潘先生所說「就無異一個參加比賽的運動員，在沒有上場以前，便爾宣佈了棄權」不過中國又已被迫入了「國際比賽場」，不比賽也得比賽，如果真正宣佈了棄權，那便只有滅亡！滅亡究竟是任何民族所不甘的。一個民族中有少數敗類願當亡國奴，只可算是「例外」。今日中國民族精神衰頹尚是事實；但由衰頹復變為強盛，也不是絕對無法可設的。要求民族精神由衰頹復變為強盛，最要的方法莫過於鼓勵對外鬥爭。中國民族精神之所以衰頹的最要原因，由於傳統的儒家文化不適於近代國際鬥爭，而致迭遭對外失敗。為減少以後的對外失敗，並且取得對外的最後勝利起見，必須運用鼓勵對外鬥爭的方法代替儒家所說「讓」和「懷柔」的方法。只有在鼓勵對外鬥爭之中，才能使衰頹的民族精神重行復興起來。鼓勵對外鬥爭的最要方法，又莫過於確立國防中心，努力國防準備。確立國防中心，是予國民以對外鬥爭的目標。努力國防準備，是予國民以對外鬥爭的實習。能夠如此做去，則雖衰頹而尚未完全滅絕的民族精神，必可漸次振作起來，以共同求得國家和民族的光榮和發展。如果今日尚不

確立國防中心，努力國防準備，以明示對外鬥爭的趨向，則國民煩悶的心理，勢必一部分轉變成頹廢而至於自殺，又一部分轉變成橫決而至於內亂，民族精神必更衰頹至於不可救藥了。

第四爲建設現代國家，全盤國家政策必須以國防爲中心，近百年來，中國已經加入現代世界，却仍未能如列強一樣構成一個「現代國家」[(Modern state)] 這也是中國在國際鬥爭場中屢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現代國家最重要的趨勢有：(一) 國家化，(二) 軍事化，(三) 科學化，(四) 工業化，(五) 法治化，(六) 教育化，而一切又以國防化統攝之。所謂國家化，是一面以國家爲全國最高無上的共同理想，又一面依據國家的需要，將全國各方面組織起來，構成一個整體。所謂科學化，是一面利用科學的方法以研究自然和社會，俾得完成科學的文化，又一面利用科學的發明，以改進一切的設施，俾得充實國家的實力。所謂工業化，是一面利用科學和機器，以促進新式產業的發展，又一面實行國家統制的方法，以保護並調節本國的產業，俾國家經濟得以獨立。所謂法治化，是一面以法律規定政府和人民活動的範圍，建立起國家的公共秩序，又一面依據人民的意向，推進政府的設施，以增加國家的公共福利。所謂教

育化是一面以教育爲激發國民精神的重要工具，又一面普及教育於全國國民。於國家化、軍事化、科學化、工業化、法治化和教育化之中，又統求其國防化，以便完成整個強有力的現代國家。現代國家之所以異於中世國家或古代國家的特點，在此。現代列強之所以稱強的原因，也在此。中國如欲生存，必須與列強鬥爭。如欲與列強鬥爭，又必須使國家澈底現代化。如欲使國家澈底現代化，那便就是必須使中國澈底國家化、軍事化、科學化、工業化、法治化、教育化，而又以國防化調整貫通之。關於中國現代化問題，已有人注意到科學化、工業化、法治化和教育化四項，却少有人注意到國家化與軍事化，更少有人注意到以國防化調整並貫通全盤國家設施。即已有人注意到的科學化、工業化、法治化和教育化四項，去澈底的程度也相差甚遠。今後中國必須在整個政策之下，澈底實行國家化、軍事化、科學化、工業化、法治化和教育化，同時又必須以國防化加強國家化、軍事化、科學化、工業化、法治化和教育化，並予以總目標和真動力。如此而後中國乃能迅速完成一個現代國家。也惟如此，而後各方的努力乃能共同完成一個國家目的。

國防中心論

國防與文化

李 璜

今日一般人的國防見解，大都注意在飛機大砲和糧食資源，於是愛國防之不立，每每慨嘆武器之不如人，糧食之不充分，資源之未開發。固然，別人以槍砲打來，我們不能不有槍砲去抵着，堅甲利兵，勢不能忽視，然而拿槍砲去抵禦，還是要靠國民。這種近代的國際戰爭，所謂傾國之力，作持久戰，譬如前次的世界大戰，那豈是只靠兵器與資源所能濟事！不但不能徒恃物力，就是加上一時的人力，也未必能濟。明白言之，就是有了良好的兵器，又有良好的訓練，還是不夠，或攻或守，還要靠其國民平素的修養如何，是則賴其各民族固有文化之陶鑄也。作者到歐洲時，世界大戰剛剛終了。當時各報所載，飯後所談，多係戰中逸事，其間可歌可泣之事，及其足以支持最後勝利，其原因多半不在其軍器設備與軍事訓練，而在其國民性格特長處之發揮。國民性格即係一

國文化多年陶鑄所成，如法國人之熱烈，德國人之沉毅，英國人之冷靜，皆非一旦所能養成，而在戰時皆賴之以發生莫大效力，足以保衛其國家。

反之，一國文化陶冶而是與他的國防建立相矛盾，則其國必滅亡，滅亡之後而且永無翻身之望，如印度便是很顯明的一個例子。印度的文化程度不為不高，他的宗教的道理及其藝術可以列入世界最高文明，毫無愧色。然而就因為他這種宗教生活，使他無法建立國防，物質既無法講求，精神又無法團集，故雖有號稱聖人的甘地出來，也只有不抵抗主義，能忍耐着多受英國人鞭打一陣，使世界驚訝而嘆息一番罷了，復與印度帝國，還是無望的。

原來，印度文化生活是全部被侵潤於宗教之中，而印度宗教的特性是：（一）非經濟的（也可以稱超經濟的），（二）部落仇視的，（三）容忍而反對鬥爭的。我們平素所習知的佛教便充分表示出一三兩種性格：以佛教對於經濟生活的忽視，及其冤親平等，忍受困辱的教義，他的信徒那還能建立得起物質的與精神的國防呢！但在印度佛教還算是有一「衆生平等」的說法，而其他印度宗教，特別是一千年來支配印度統治階級思想與生活的波羅門教，他除了具有

佛教的非經濟的和反鬥爭的性恪而外，而且仇視國中異教非常厲害。在印度鐵匠有鐵匠的宗教，打魚人有打魚人的宗教，本其信仰，各不相能。這許多的宗教的又兼職業的不同的部落至今彼此仇視着。（英國學者名之爲 Clans，我不稱之爲團體，而稱之爲部落，因爲在一國內的團體未有如印度之 Clans。不通往還，不通婚姻的情事，）而統治階級的波羅門部落，其高高乎在上，看不起其他部落的習慣，則簡直是惡習甚深，豈有此理！譬如一個波羅門教徒正在吃飯，偶然被一個打魚人看見了，則必將所食出而哇之，以爲不潔；偶立門外，遇着鐵匠，亦必歸而洗目，視爲受汗。——這樣的國民性格及其生活方式，雖有堅甲利兵，又有何用呢？

現在我們試來檢討一下我們中國的文化。我覺得中國自秦皇漢武以後，國人的文化思想及生活，雖不似印度那樣與國防建立相矛盾，但是家族本位的祖先崇拜，夢想和平的苟安政治，自然主義的文學主流，個人主義的藝術思想……種種生活內容及方式皆不適於近代國防的建立。這個「不適」，一比之槍砲之不新式，洋操之未得法，還更可憂得多！試剖晰言之。

家族主義不適於近代國家之完成，作者十年以來，更時時爲文論及之。中國大一統後，屢次

遭異民族侵入，或竟至於數次亡國，今日又岌岌可危，所謂「胡虜千秋尙入關，國防之不固，家族主義的習俗，實當首負其責。因為第一，中國人的道德思想及精神生活完全被浸潤於家族本位裏面，由來甚久，中國人的基本道德觀念即是家族道德：不但是「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歟」而忠信亦孝弟之餘緒，所謂「善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在中國理論上，談到愛民族，保國家，不過是「推恩」而已。既然以家族道德爲第一義，則中國人爲國犧牲的精神便差一等，爲國內外公認的「勇於私鬥，怯於公戰」的習性，不是偶然養成成功的！其次，中國人既要將家族倫理做到圓滿地步，舉世相尙的，當然是「仰事俯畜」，「菽水承歡」，「狐死首邱」，「田園廬墓」，這種祖先崇拜的宗教習俗是普遍的，而「匈奴未滅，何以爲家」，「醉臥沙場，馬革裹尸」，只是少數文人壯士的豪語罷了！爲中國建立國防，驅逐胡虜的秦皇漢武總是挨罵，成爲歷史的罪人，而杜甫的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石壕吏，斷臂翁……等等纔最合中國人的口味，所以杜甫便成爲詩聖！我們試拿杜甫的「嫁女與征夫，不如棄道旁」，「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藜」與馬賽歌和德國國歌中詞調的意味一比，我們國風之不競，國防之未建亦非偶然！

中國的基本道德既然在家族生活的圓滿，所以中國的政治也本着這個原則，對外力求苟安，以便實現人民家族的和平生活。所謂「國恩家慶」乃是妻家能得慶，然後國纔算有恩。歷來帝王便是在希圖人民對他有這樣的觀感，所以不惜將自家女兒——公主——犧牲了色相，去嫁給蠻夷酋長，這樣擾害了自己家族的和平，無非爲求萬姓家族的安寧，得個聖君的稱號罷了。漢文帝開「和親」之始，因此漢文帝便萬世被人稱頌。其實匈奴自平城幾乎殺掉漢高祖以後，連年內寇不絕，漢文放下父仇不報，國恥不雪，而要與他「結兄弟之義，以苟全天下元元之民」，這樣反稱爲聖明，等而下之，則南渡君臣，稱姪稱子，乃有由來，不足怪矣。我們讀史至：

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台，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振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爲匈奴讐焉！」（注：讐，音摺，喪氣也。見前漢書武帝紀。）

漢武帝這種雄才大略，足爲先人吐氣，爲國家爭光，多麼使人痛快，真個要令人浮一大白！但是班固等史家不贊成，謂這位孫兒反不及他祖父文帝恭謹，不足以濟斯民。像班固等人的政治思想，竟自充滿於中國的廿四史，以至於廿五史及廿六史，中國國防，又如何建立得起呢！無怪賈長沙要痛哭流涕，認爲中國無人也！

既然在中國文化生活裏，家族社會與政治社會的路線都趨向於苟安，則文學的主流自必趨於順應天行的自然主義。「人生如朝露，飄如陌上塵。」這是中國大半文學家所必具的人生觀；於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或者「好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盡量享受與及時尋樂纔算正當，其餘一切一切的行爲，皆算爲蠢笨，皆覺得滑稽。——近來國中文壇尙幽默，推崇個人趣味，對於世事多以滑稽視之，這種派頭並非新派，乃是傳統的正宗派，中國文學之主流也。

中國知識階級多少受過這種文學的陶鑄，所以口裏雖然國家社會，似乎悲歌慷慨，其實心裏不是那回事，愈是名士，便愈愛錢，因爲拿着較多的錢，可以盡量享受或及時尋樂也。只有青年

人還保存一點爲國爲公犧牲一己的觀念。但是等到這些青年人閱歷漸深，心境亦爲之一變，家族本位，苟安思想，與及時驅錢尋樂的見解都來了，誰管得國家的榮辱，民族的存亡呢！今日「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青年，青年，國防的中堅人物，在這種文化社會的薰陶中，亦至不可靠也！

至於中國的藝術，也自秦漢大一統之後，早已失掉了他的國魂。「泱泱大國之風」的音樂，萬里長城的偉大建築，皆無繼者。秦漢以後的藝術作品，不是爲的媚鬼，便是爲的娛人，他成爲宗教的裝飾品與貴族的娛樂品。「雕虫小技，壯夫不爲，」真慨乎其言之！

總之，談到近代國防，如果是物質缺乏，我們還可以拿錢去買來，惟有精神缺乏，那就非一時用錢所能買得來的。故我提到國防與文化，我是非常着急的。讀者一定要認爲我太自菲薄，把中國文化太看得一錢不值，或者竟因此要對我生氣。其實，我引證的都是客觀的事實。中國未嘗沒有很足以稱贊的文化，但是這個女性的文化是無救於亡國的；中華民族未嘗無崇高的德性，然而仁愛和平乃是弱者的德性，乃是爲強者所冷笑的。如果說得過甚一點，這些德性適足以產生

漢奸和順民！

現在要建立國防，如果我們認為文化的質素很重要，我們便應該拋却失敗的歷史，不要再
去回顧，而一心創建適於生存競爭的文化。這固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的事，好像無以應緊
急的當前國難。然而「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從「戊戌政變」算來，到
現在快要四十年，自當時起，明白的知識階級便對中國文化感覺到了不適生存，故變法維新，共
和民主，以至思想革命，社會革命，中間都包含得有了新的文化運動。明白人本來認識了沒有新的
文化生活，便沒有近代國家的產生，然而這些明白人一經國難的嚴重逼迫，好像又變為糊塗，百
無聊奈，反轉來去乞靈於歷史，如果歷史上的老文化有靈驗，我們國家又不會亡掉了幾回，而現
在又危險至此了啊！

然則，適於生存競爭，適於國防建立的文化狀態又是如何的呢？我以為這個文化狀態是向
前創造的，而不是保守因襲的，是公民道德的，而不是家族道德的，是集團生活的，而不是個人生
活的，是積極征服自然的，而不是消極順應自然的。總而言之，反古之道，則得之矣！

雖然如何始能辦到是則在統治階級與知識階級之了解與努力如何耳！原來，一種文化生活的養成，並不有著先天的遺傳，而皆是後天的習尚。因為是後天的習尚，故欲改變之不難。這種後天習尚之成立，一半是由於社會環境的需要使然，一半是由於在上者的提倡而盛。只要有心人得着機會，能一面為衆人創造新的社會環境，一面自己向新猛進。不要做做又回頭，自家都還是一個調和派，懷疑派，那便不足以為衆人之表率了。我們細一考究支配中國的孔教文化，在漢以前又有何種先天的勢力呢？孔教文化在漢以後獨盛起來，還不是一半由於大一統的政治社會和自耕農的經濟社會的需要使然，一半由於漢文武極力提倡躬為表率，而天下便從此嚮風了。

中國一向是停止在手工業和自耕農的經濟社會，而且民智未開，大一統的政治社會雖隨時在改朝換代，而仍然是從上而下，無非機械式的轉變而已。經濟與知識兩個動力不變，故中國的文化狀態不變。如果我們能勇敢的從這兩個動力下手，則自然可見文化生活並不是有著甚麼不同民族的定型。一讀歐洲近代史，則知道工業革命與強迫教育二事影響於近今的歐洲文化。

國防中心論

甚大。我們的有心救國的朋友們，又豈有無力回天的道理！

二編

國防與政治

陳啟天

筆者在國論第一卷第九期發表一篇國防中心論。那篇文章的主旨，在從應付當前國難，準備國際鬥爭，振作民族精神，建設現代國家等方面，說明全盤國家政策必須以國防爲中心；也可以說那篇文章是專門發揮爲什麼必須以國防爲中心政策的理由書。看了那篇理由書，便可確切承認全盤國家政策以國防爲中心的必要。不過全盤國家政策又應如何以國防爲中心，則那篇文章尙未論及，須待另行加以討論。

全盤國家政策應如何以國防爲中心？簡單的說，便是一面依據國防的目的，以確定全盤國家政策，一面講求國防的實效，以推進全盤國家政策。換句話說，全盤國家政策的目的，要盡量國防化；全盤國家政策的實施，也要盡量國防化。現在國家的任務幾乎無所不包，即國家政策可以

牽涉到國家和社會的一切方面，那末，國防中心政策也可貫徹到國家和社會的一切方面。一切以國防爲中心，一切國防化，這是國防中心政策的主要要求。本文僅將這種主要要求，應用於政治方面，加以扼要的討論。

一 溝通全國民意

依據國防中心的見地，來討論中國政治改造問題，則第一件要緊之事，莫急於鞏固精神國防；要鞏固精神國防，莫急於團結人心；要團結人心，莫急於溝通全國民意。民意對於政治的基本要求，至少有兩種：在一方面要求國家的生存和發展，在又一方面要求表示政治意見和參加救國工作的機會。這兩種民意的基本要求，在政治上是一種支配的力量。一個政府如果顧及這兩種民意，便可日趨於鞏固；如果忽視這兩種民意，便不免困難重重了。一個政府顧及這兩種民意的最要方法是一面公開政治，使全國人才集中於國防目的之下，又一面將實際政治造成一種國防中心，能夠保證國家的生存和發展，如此，而後政府與民意可融爲一體了。我國自鼎革以來，

政治卻失了中心。一般人以為我國要恢復政治統一，必須重建政治中心，這是不易之論。不過所謂政治中心，與其在個人，派系或地方，無甯在國家或國防。國家或國防可以涵蓋一切個人，一切派系和一切地方。而任何個人，派系和地方不能代替國家或國防。真正的政治中心，必須是國防中心，在國防中心之下，才能澈底通達全國民意，盡量集中全國人才，以共赴國難。近數十年來的中國歷史，雖迭遭嚴重的外患，而仍舊在內亂中打圈子的根本原因，自然很多，而過去一般當權者只知以個人，或派系或地方為中心的企圖，不知以國家或國防為中心的企圖，却是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因為只知以個人或派系或地方為中心的企圖，故注重私人的恩怨利害問題。因為不知以國家或國防為中心的企圖，故忽略國家的榮辱存亡問題。愈注重私人的恩怨利害，便愈忽略國家的榮辱存亡。今後中國如欲得救，必須一面盡量除去私人的恩怨利害，一面盡量注重國家的榮辱存亡。要一般人除去私人的恩怨利害，而注重國家的榮辱存亡，又必須確立國防中心的政治，以溝通全國民意。

二 建立國防政府

依據國防中心的見地，來討論中國政治改造問題，則第二件要緊之事，莫過於建立國防政府。所謂國防政府，不是名義的問題，而是實質的問題。實質的國防政府，無論在平時或戰時，都負有國防的任務。在平時，重在國防的準備；在戰時，重在國防的發揮。故從某種意義說來，現代列強的政府，無論形式如何，也無論組織如何，都可說是一種國防政府。如果一個政府不能負起國防的任務，即不能準備並發揮國防，以保衛國家的生存和發展，便難乎其為政府了。所以一個政府必須努力造成一種國防政府。在戰時，固要是旗幟鮮明的國防政府，即在平時，也要是暗藏春色的國防政府，一切政府，尤其是國防政府，以統一為必要的前提。不統一，不成其為政府，更談不到國防。故欲建立國防政府，必先要求全國的統一，換句話說，即不容有地方的割據。全國統一的程度愈高，則政府的地位愈固，國防的力量也愈大。因此各國戰時的國防政府，常較平時的政府，更要求統一程度的增進。增進統一的方法，是一面擴大國民的聯合，又一面加強政府的權力，原來

憲政國家，在平時常不免黨爭，但一到戰時，即須停止黨爭。停止黨爭的最要方法，不外聯合各黨各派共同組織政府，以求全國一致護衛國家。如此組織的政府，稍異於平時的政府，故通稱爲「聯合政府」，或「國民內閣」，或「戰時內閣」，或「非常時政府」，以表明其特徵。政府既由國民共同組織以後，又設法加強政府的權力，使得統制一切，應付一切，以整個國力與敵國周旋，求獲最後的勝利。政府權力的加強，也可說是戰時國防政府的特徵之一。目下國際風雲一天緊似一天，列強均在積極備戰，雖尙未至戰時，而多已走上國防政府的道路，即一面擴大國民聯合，一面加強政府權力。反觀我國，國難雖然一天嚴重一天，而內亂猶接踵而起，尙未能完全統一，不易談到國防，近年政府的權力，已漸次加強，而國民的聯合，則仍待擴大。團結沒有精誠，對外難於一致。敵人侵略我國，尙且認爲非常時期，力求舉國一致，而我反不如之。欲求懲前毖後之計，必須從速建立國防政府。而此國防政府，無論名義如何，實際必須加強中央權力，同時不可忘却擴大國民聯合。真正的國防政府，只能在擴大國民聯合之下，才易加強中央權力。只知加強中央權力，而忽視擴大國民聯合，決不易建立起全國一致的國防政府。這是我們講國防政府所必須切記的。

三 肅清貪污官吏

貪污本爲一般的政治問題，若從國防的特殊見地加以考察，則更感此問題的非常嚴重。近代所謂國防，要求用整個國力切實對外，而貪污却將國力化爲私人的力量，無由整個集中。國防要求團結民心以一致對外，而貪污則足以渙散民心，無由全國一致對外。國防要求與人硬拚，而貪污則足以使一切國防變化有名無實，無由與人硬拚。貪污一經流行，便一切談不到了。以國家的金錢變爲私人的金錢，固是貪污，以國家的事業，變爲私人的事業，或以國家的軍隊，變成私人的軍隊，又何嘗不是貪污。中國官場以及一般社會多用「升官發財」四字來恭賀人，確能道出通俗對於官吏的真實心理，而官吏也多以升官爲發財的無上捷徑。所以一經爲官，不但能專權，而且能專利；不但能爲所欲爲，而且能取所欲取，舊式的貪污，大概用賄賂、中飽、剝削等方法，新式的貪污，又利用建設、統制、改革等名義，以爲壟斷或投機的方便。因此，從來的達官貴人，幾無一不致富，小富可有數萬以至數十萬，大富可有數百萬以至數千萬。民脂民膏，既多入私囊，國力國防，

自無從充實。前清西太后移用海軍經費建築頤和園，以國防費充作娛樂費，這也是一種貪污的方法。因此海軍未能盡量充實，致甲午大敗於日本。傳聞李鴻章經營威海衛軍港要塞，以經手人中飽，所購要塞砲與彈不相合，致甲午戰時，砲不能射敵而失守。這是貪污影響國防的實例。其他例此之事，實舉不勝舉。故欲在中國建設真實的國防，必須先行澈底肅清貪污；如其不然，則在國防名義之下，又恐爲貪污者大開門徑，於國於民究有何益呢？澈底肅清貪污的普通方法：第一要確定文官制度，以保障廉能的官吏；第二要確立主計制度，以實行事前與事後的監督。此外最重要的方法，要能對一切貪污的官吏，嚴刑峻法，加以痛懲。只懲治小官小吏，不懲治大官大吏，決不能肅清貪污。只懲治疏遠，不懲治親近，決不能肅清貪污。只懲治異己，不懲治徒屬，決不能肅清貪污。只懲治他人，不嚴檢自己，決不能肅清貪污。要真正澈底肅清貪污，必須先從本身以及大官大吏，親近徒屬入手。法家說：「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法行所愛。」「法行自貴近始。」這是爲政的至理名言，而於整飭官方，肅清貪污，尤爲必須遵守的信條。

四 確定地方權限

我在本文前面曾經說明建立國防政府必須要求統一，更必須要求加強中央權力。因此便不免引起一個實際政治問題，即中央與地方衝突的問題。自辛亥革命以迄現在，中國政治史最大的問題，恐怕就是這個問題。在中央方面每每要求集權，而在地方方面也每每要求集權，遂致引起繼續不斷的衝突，至於訴之武力，演成內戰。這個問題如不能得着適當的解決，國力將永遠耗於內爭，談不到國防，也談不到實力對外。我以為要適當的解決這個問題，須依據國防的見地，確定地方權限。從國防的見地說來，要求一個統一政府，要求一個相當集權的中央政府，是任何國家立國的前提，而在中國尤為必要，不過所謂中央集權，只是相當的，並非絕對的。一切絕對集權於中央，不但沒有必要，而且沒有可能，甚至因一切絕對集權反而增加統一的困難或危險。這是處理實際政治問題所必須切記的，所謂相當的中央集權，究竟應該怎樣辦呢？我以為外交軍事必須集權於中央，其他如財政經濟教育內政交通等，則可酌量分權於地方，中央於規定的

地方權限以內，只須立於指導和監督的地位，不必爲過度的干涉。就過去的事實看來，每省地方有軍權財權以及一切政權集於一身的傾向，因而形成割據的局面，既破壞了國家的統一，又分散了國防的實力，實爲中國救亡圖存的一個大障礙。要改造這個不統一的局面，第一須打破以軍隊爲私人工具的惡習，原來軍隊應是國防的保障，不是私人的工具。然在實際上，中國的軍隊，多只是私人的工具，而不是國防的保障，所以國難儘管嚴重，而全國軍隊並不能一致禦侮。有時反要發生內戰，全置國難於不顧。軍隊只應屬於國家，不應屬於任何私人。依據此原則，全國正規軍隊一律改編爲國防軍，在統一的中央軍事機關之下，受統一的訓練，指揮和調遣，這可叫做軍事集權，也可叫做軍政軍令的統一。至於地方，不得擁有國防軍，但爲維持地方治安計，可依照國家的規定，編練若干保安部隊，其最大限度不得超過維持一省治安的需要以上。如此，而後一切私軍可盡化爲國軍，不患國家不能統一了。

第二須實行軍民分治。地方之所以易於形成割據的重要原因，在以軍人兼領地方政事，以地方長官兼領軍隊。無論何人，同時兼有軍權與政權以及財權，多不免走上割據的途徑。欲欲

此流弊，只有嚴格實行軍民分治。國防軍雖可分駐各地，但絕對不可令其將領兼任地方長官，更絕對不可許其干涉地方政事。同時地方長官，無論原爲軍人與否，除可編練並調遣規定的保安部隊以外，絕對不可令其兼任國防軍的將領。有些地方長官，因爲某種必要或某種滯礙，不得不暫令現役軍人兼任的情形，必須盡量減少，以免破壞軍民分治的原則。

第三須剷除「地方外交」或「地方交涉」的惡例。一個國家要在國際上有整個的表示，必須做到外交的統一。所謂外交的統一，便是外交須集權於中央，不許任何地方自由辦理任何地方交涉事件，不過中國自前清以來，即釀成所謂地方交涉的惡例，有時地方長官可以辦理外交事件，較遠的例子，且不必提；較近的例子，如新疆，外蒙與蘇俄訂約，冀察可與日本辦理外交事件。地方有了外交權，便是國家分裂的現象。其所以造成這種壞現象的原因，大概不外：（一）外國要求與地方交涉，以求易於取得特殊權益；（二）地方官吏藉辦理外交以求取得外援，而便於保守地盤，從事內爭；（三）中央官吏不明外交應該集中辦理，隨便委之地方，以圖省事；（四）中央官吏威與外交棘手，故意推之地方，以圖避責。要求國家的統一，與國防的鞏固，必須澈底

剷除地方外交的惡例。要剷除地方交涉的惡例，必須嚴守外交集權的原則，由中央負責辦理一切外交事件，凡地方擅辦外交事件必須嚴禁。凡外國要求與地方辦理外交事件，必須嚴拒，外交是國防的前哨，只有集權，才能保持前哨的陣線，不致自亂步驟。

總之，地方除保安部隊外，絕對不得有軍事權，也絕對不得有外交權。國防軍雖可分駐各地，但不得以現役軍人兼任地方長官，這是確定地方權限時所必須嚴守的原則。軍事外交以外的權限，既不能絕對集權，也不能絕對分權，但須斟酌實際，明確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即無不可。

五 力求實際功效

我國實際政治的積習，是不負責任，不求實效。我們要建立以國防為中心的政治，必須澈底剷除這種積習。國防的力量，是由政治的實際成績造成成功的。政治的實際成績，又是由政治的實際功效造成成功的。凡政治上，辦一事，必須有一事的最大功效，用一人，必須有一人的最大功效。費一錢，必須有一錢的最大功效。能夠做到如此，則政治成績自然可觀了。這不僅是求行政一方面

的效率，而且是求全部政治的效率。如何而後可以求得全部政治的最大效率呢？這自然不免要牽涉到全部政治的改造問題。但本文爲篇幅所限，只能提出幾個要點來說。第一須法令一統。法令是一切政治活動的標準。法令不一，則標準不定，不但人民無所適從，即政府自身也不知如何辦理了。要求政治的最大效率，必須一切裁之以法，要一切裁之以法，又必須法令有相當的調整與確定，不得自相衝突，也不得輕易改變。換句話說，爲政必須確立法治，而法令一統，又爲確立法治的必要前提，忽略此點，則不能講什麼效率了。第二須權責分明。每個政府機關以及每個機關人員必須有確定的權限，同時又有確定的責任。如此而後可以專任責成，使每個機關或每個人員發生最大的效率。法家說：「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這是使權責分明的一個方法。此外還有個最重要的方法，便是組織簡要，政令統一。組織重複，政出多門，最不易獲得實際功效。例如中央許多疊床架屋的駢枝機關，最足減少政治效率。又如省政府的組織採用委員制不如採用省長制，較有效率。縣政府採用分局制不如採用分科制較有效率。凡行政之事，權不專則責不明，要便行政權責分明，則莫若使行政組織簡要，行政命令統一。第三須公開詮選。中國行政上有一個

最嚴重的問題便是用人問題。俗話說，「一朝天子一朝臣」，這雖是指從前帝政時代的情形，但民國以來，仍舊是如此。每個行政機關的主官上任，多引用一批親私；及其去職，這批親私也隨之去職。親私固未必個個貪劣，然最貪劣的必屬於親私。前任主官的親私刮過去，後任主官的親私刮過來，貪污尚且不免，還講什麼效率。每個機關大概總是主官的親私得勢，真正廉能的人員不是無從進身，就是得不着一點保障。要裁抑親私，保障廉能，莫若公開詮選。凡引用人員，必須儘先任用攷試合格者。凡經攷試合格的人員，不許隨主官去職而被裁。凡引用未經攷試而確有資格或能力的人員，必須經過負責保舉的手續，保舉的人員如有過錯，保舉者須連帶加倍坐罪。如此而後「私人政治」的流弊可漸減少，而以廉能相尚了。第四須訓導切實。行政人員未經任用之先，及既經任用之後，必須加以訓導。訓導有數種：（一）為普通訓練，例如國防訓練，這是一切行政人員應一律受訓的。（二）為專門訓練，例如縣政人員訓練，計政人員訓練，農業技術人員訓練等，重在訓練專門技能，各種人員必須分別受訓。（三）為實際指導。行政人員是處理實際事務的。處理實際事務，必須具有實際本領。每個行政人員處理的實際事務不同，因此其所需要的

實際本領也不同。只受集合的普通訓練及專門訓練還不夠用，必得隨時加受個別的實際指導。負這種實際指導的責任的人，爲每個機關的主官及主管員司。故主官及主管員司得人與否，與整個機關的成績至有關係。第五須攷嚴嚴明。行政要有效率，必先確有實際。然而中國官場只講官樣文章，多不問實際，上級機關只求政令堂皇，不問下級機關能否做到。下級機關也以敷衍了事，不問政令旨趣所在。以故政令雖多，盡成具文，呈報雖勤，全屬假話。上下只求在公文上過得去。那能求得實際功效？我們要改造政治，必須澈底打倒官場這種積習。頒發政令，務求切合實際，不可過繁，也不可過急。推行政令，務求實事求是，不可貪功，也不可諉責。呈報成績，務求公文與事實符合。做一點說一點，說一點有一點。上下嚴格綜核名實，務求舉辦一事即有一事的實效，委任一人即有一人的功績。隨事攷成，定期攷成，按人攷成，三法並用，庶可舉綜核之實。（參閱拙編張居正評傳，中華書局出版）第六須賞罰信必。既經嚴格攷嚴之後，便須繼之以賞罰。賞罰不僅足以表現權威，而且足以鼓舞人心。如果沒有賞罰，則有功者無以爲勸，有過者無以爲懲。所以深知治體的法家堅決主張「信賞必罰。」韓非子說：「必罰明威，信賞盡能。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

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內儲說上)「明其法禁必其賞罰此必不亡之術也」(五蠹)「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主道)商君書說「民信其賞則事功成信其刑則姦無端惟明主愛法重信而不以私害法」(修權)這都是說明信賞必罰的必要又所謂信賞必罰必須依據法令法令上所沒規定的不得任意亂行賞罰法令上所已規定的不得任意不行賞罰亂行賞罰或不行賞罰均是失去賞罰的功用所以法家引爲厲禁韓非子說「至治之國有賞罰無喜怒」(用人)「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主道)「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不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有度)管子說「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大治」(任法)「禁不行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重令)慎子說「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惟法所在」(君臣)由此可見賞罰又必須合法了。現在有些從政的人們未嘗不知賞罰的重要可惜每每賞只施於親貴罰只施於疏遠無從獲得賞罰的實效。

結論——今後中國一切國家設施，必須以國防爲中心政策。依據此種前提則政治必須加一番大改革，以建設國防中心的政治。要建設國防中心的政治，則（一）溝通全國民意，（二）建立國防政府，（三）肅清貪污官吏，（四）確定地方權限，（五）力求實際功效，俱爲當務之急。

國防與教育

邱椿

筆者在本篇內所說的話都是其友李幼樁、余景陶、陳啓天、常燕生、左舜生諸先生在十二年前已經說過的話。關於國防教育的理論與實施方案，他們曾有極精闢的發揮和極周密的規畫；不幸在當時竟被少數有作用者認為開倒車的言論。近幾年來，痛苦的經驗和冷酷的事實強迫大家走上國族復興的坦途，於是國防教育或非常時期教育的論調遂高唱入雲。十餘年前被認為開倒車的言論，現在已成爲最時髦的文章；但從無人回憶這是李、余、陳、常、左等所說過的話。同是一樣的話，出自我口便爲是，爲先知先覺；出自人口便爲非，爲開倒車，這是國人的通病。只好付之一笑！

吾輩讀中國歷史時，似不能不想到一個頗有趣味的問題：教育的發達或道德氛圍的濃厚

和國運的隆盛是否爲正比例？我的答案是反面的：某一時代的教育越發達，道德氛圍越濃厚，其國運必越衰微。東漢桓帝時，大學生多至三萬餘人，其教育發達情形，在當時實屬空前；但這正是官官專橫，外戚弄權，盜賊蜂起，西羌烏桓鮮卑大舉入寇的時期。顧亭林稱「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尙於東京者！」但不幸風俗最美之時，即國勢最凌夷之日。試問風俗之美何補於國難？顧氏大罵曹孟德爲敗壞士風的罪魁，並稱魏晉之際爲道德最墮落之日。但在這時候，魏擊破烏桓於白狼山，斬其單于蹋頓降，其衆二十餘萬，漢族聲威爲之一振。試問風俗之壞又何損於國威？宋徽宗廢貢舉，立辟雍，將「三舍法」推行於天下，宋代教育當以此時爲最發達。他又立「八行八刑」科，所以道德氛圍在當時亦最濃厚。但結果如何？金兵渡河，汴京失陷，徽宗被虜，北宋不久亦亡。

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是：教育或道德風俗若無關於國防或不以國家利益爲前提，則教育越發達，道德風俗越美善，亡國越快。東漢的教育是抱殘守缺的經書教育，其道德是以個人或家族爲中心的道德。宋徽宗所立的學校多半爲遊民製造所，其所提倡的八行如孝悌睦嫻任恤忠和等亦是家族中心的德行。所以東漢和北宋末年，教育雖然發達，道德風俗雖然美善，國勢仍極衰

微。

我國近三十年來的教育始終未曾注意到國防上的需要。欲知教育是否失敗，先看教育的結果，即先考驗學校所養成的人材。「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這是宋代教育的結果。宋代士大夫雖然無解除國難的知能，但還能自殺殉國，乃不失為愚忠。目前士大夫既無救國知能，復無殉國節操，「無事袖手談主義，臨危一溜到租界」已算是深身自好之士了。這是我國近三十年來學校教育和社會陶冶的結果。近年來我國要人所提倡的十二條道德律如孝順、仁愛、信義、和平、禮節等亦是家族本位或大同主義的道德，和宋徽宗所倡導的「八行」比較亦不見得高明許多。我們敢斷言：現行教育制度若不改弦更張，則祖國的未來大難將與日俱增而毫無解除的希望。

時賢有見於此，故提倡國難教育。所謂國難教育，即以國防為中心的教育，即訓練青年與成人，使其有衛國知能與熱誠的教育。但若干學者對這種教育頗探慎重態度。有人說：「教育本為百年大計，無論其方針如何，編制設施，總宜相當穩固，不宜朝令夕改，輕於搖動；蓋教育收效，甚為

迂緩，非若買貨造屋，可以限期交件，尅日完工。」（天津大公報本年二月十七日社論）這些話固然有相當理由，但若據此而反對現行教育之澈底改造，則非吾輩所能贊同。

第一，教育是爲適應環境而產生的。環境改變，則教育亦不得不隨着改變。教育又是改變舊環境和創造新環境的工具之一。若吾輩不滿意於舊環境而欲創造新社會，亦有賴於新教育的改造。試問我國環境，自九一八以後，是否有劇烈的變化；環境既有劇烈的變化，教育應否跟着環境而起劇烈的變化？天下百年無不變的環境，亦無百年不變的教育政策。自汽機工業發達以來，社會已變爲動的社會，教育亦已變爲動的教育。在此時而懷疑國難教育，若非錯誤環境，卽不懂教育本質。第二，持懷疑論者似有兩種假定：（一）我國已經有了教育百年大計；（二）所定的百年大計是完善的，並無修改的必要。依我們看起來，這兩個假定都無根據，因爲我國並未定下教育的百年大計，更談不到完善與否。

還有些朋友以爲教育目標在追求永久價值如真、善、美、聖等，國難是暫時的現象，不能作爲改變教育目標的根據。這話亦有相當理由，因爲永久價值是超時空的，不管國家是否存在，價值

本身仍是不增不減的，但從另一方面看起來，所謂永久價值決不能離開人生，亦決不能離開國家社會。若說價值是超人生的，那末人類亦無能力實現這些價值。並且宇宙本體即是變動不居的，價值亦是永久自新的。天下無永久不變的價值。依我們看起來，價值離不開人生，國家，社會。除掉國家，價值亦無所寄託。國難教育所以保衛國家，保衛國家即所以實現人生價值。並且國家本身即代表許多極高的價值。反對國難教育者將國家利益和永久價值看成對立的東西，實是一種錯誤。

還有些和平主義者以為教育的基礎在愛而不在恨，其目標在培養國際同情而不在鼓勵國際戰爭。這話亦是對的，但不可用作反對國難教育的理由。我們的國難教育並不叫青年仇恨敵國的人民，只是叫青年仇恨敵國的贖武主義者。只要敵國肯放棄其贖武政策，敵國即變為友國；只要贖武主義者肯改變其態度，他們即變為中國之友。吾輩愛祖國，但並不仇恨真正以平等待我的友邦，並且敵國的贖武主義者不僅為我國人所厭惡，而且為敵國的大眾所嫉視；吾輩仇視敵國的贖武主義亦即所以愛敵國的受壓迫者。我們所鼓動的戰爭，是自衛的戰爭。世界各國

要都有相當自衛力，野心家才不會作侵略他國的夢想，國際和平才可維持下去。所以我們的國難教育，實是促進世界集體安全的工具。

還有些社會主義者以爲國家是近代國際糾紛的淵藪，是一切罪惡的策源地。所以國難教育不如改爲非常時期教育，或改稱「反帝教育」。這雖是名詞上的爭辯，但其背後却有「工人無祖國」的哲學。這種哲學只是一個頗迂遠的思想，未必能應用於今日。蘇聯新憲章第一三三條說：「防衛祖國爲蘇聯每一公民之神聖義務。背叛祖國，如背叛降敵，爲異國作秘探以損壞國家及軍力等事，爲窮兇極惡之罪，應受法律充分嚴厲之懲罰。」（載北平世界日報，廿五，六十八，第四版）足見蘇聯工人亦是要祖國的，防衛祖國亦是蘇聯所贊同的，基此理由，社會主義者似不應反對國防教育或國難教育。

最後，有些利己主義者以爲國家興亡對於個己利益無關係，所以對於國防教育雖不敢反對，而仍持冷淡態度。他們說：「國家對我們小民有什麼好處？我國亡國也不止一次，現在再亡一次也滿不在乎。」又說：「中華民族在過去曾統治過若干異族，現在爲什麼不能爲異族所統治？

在異族統治之下，小百姓不見得更苦。」這種無恥的投降主義，不僅是一般愚民心坎內所要說而不敢說的話，而且是若干知識分子潛意識中的時隱時現的「情緒。」一般人對國難教育如此冷淡，實由於這種潛意識的從中作祟。但我們都知道，中華民族是全世界最優秀民族之一，其創造文化的能力在過去曾有極光榮的表現。從多方面證明，這種文化創造刀現在並未衰退，所以中華民族將來在世界文化上必能作極珍貴的貢獻。但中國必須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華民族必須是自由的民族，其創造天才始能充分發展。所以中華民族的解放，即是提高世界文化之一重要的條件。反之，中國的淪亡，亦即是世界文化的一大損失。這是我們反對異族統治的重要理由。亡國痛苦雖未必大於暴政之下的痛苦，但前者是與日俱增的，後者是易於解除的。我們所愛的中國，即使不是現在的中國，也還有過去的與未來的中國。爲個人私利而不顧國家興亡並漠視國防教育，是一種卑劣心理的表現。

總而言之：持重主義者，玄學家，和平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利己主義者，對於國防教育或國難教育的態度，是我們所不能贊同的，其所持的理由是我們所不能了解的。教育能興國，亦能亡國。

在今日而不談國防教育。還有他種更重要的教育嗎？

近來談國防教育者提供了許多實施方案，其價值如何，應俟實驗若干時日後始能估量，但在筆者看起來，有幾個原則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國防教育實施方策應注意「時間性」的原則，就時間性上說，我以為國防教育方案應以一二年內即能著成效為原則。中華民族的運命即將被決定於今後一二年內，所以我們的教育計劃，亦應在這短期間內完成之；否則遠水不救近火，恐網繆未終，而「金人已渡河矣！」

有些朋友高談教育的五年或十年計劃。有人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所能效力的本是百年大計。即是勾踐沼吳也須靠十年生聚，十年教訓，非一朝一夕之功。」（天津大公報廿五年二月十六日社論）這話固然不錯，但今日我國處境的窘困和昔日的越國不同，目前我國敵人的毒辣又非春秋時代的吳國可比。國勢如此危急，敵人恐未必容許我們從容佈置，作十年教訓的計劃。時至今日，即使效蘇俄作五年計劃已嫌太迂緩，何況十年？現在我們只能談「一年計劃」。

有人以爲國難教育應以普及義務教育爲首圖。所以說：「現在國難深重，而一般人民的國家意識又很薄弱，推行義務教育，實是建設心理上的國防的根本要圖。」（同上）但從時間性上說，這種計劃似亦略嫌迂緩。目前受義務教育者多半爲自六歲至十歲的兒童，他們出來擔當救國重任至少在十年以後。而那時有無獨立的中華民國恐怕還是一個問題。從國難迫切的情形上說，目前與其訓練兒童，不如訓練壯丁。與其普及義務教育，不如推行民衆教育；因爲壯丁是目前擔負社會責任的人，若加以訓練，目前即可收實效。我並非說義務教育不應普及，而是說在國難嚴重，朝不保夕的今日，義務教育似非首要之圖。

依據時間性的原則，國防教育方策應限於一二年內能告一段落的方策。這是應付環境的權宜辦法。若第一年計劃完成後，大戰尙未爆發，那時再作第二年更遠大的計劃亦不遲。國命多延續一年，教育新計劃亦可多伸展一年。如此積累下去亦可成教育的百年大計。我相信教育的百年大計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規定的，而是隨着時勢的推移，不斷修正和逐漸累積而成的。所以我所談的一年計劃和時賢所談的百年大計亦非根本上互相衝突的。「遠慮着眼，近處下手」

的格實在此處可亦應用。

第二，國防教育的方案應顧到「空間性」的原則。依據這個原則，國防教育方案應側重「要塞區」內的教育。各地教育平均發展固然是很好的理想，但若為時間、經費、人手所限制，這種理想不能實現時，我們便不能不有所選擇，不能不先從在民族鬥爭上有重大價值的區域內實施自衛訓練的方案。近來談國難教育者多忽視這個原則，這是很不幸的事情。比方有人主張各省應限期普及義務教育，但一按我國經濟情形，談何容易！據說全國簡易小學教育的普及，每年亦需款二萬萬元，試問民窮財盡的中國從何處籌這一筆大款，此外還有師資問題。依我們的看法，在短期內普及各省的義務教育是不可能的，要塞區內義務教育的普及，若得中央和省政府的補助，是略有成功希望的。又如報載中央擬資助邊省如新疆、四川、雲南的義務教育，但我以為這種辦法亦忽略了空間性的原則。雲南和四川雖是邊省，但在國防上並非最重要的地帶——除非我們都作還保歷賦的計劃。又如日前報載中央擬令各省限期普及成人教育，但一省幅員廣大，人口衆多，普及成人教育恐亦非易事。依我們的看法，不如令各省儘先普及要塞區內的成

大教育真有成功的希望

復次，國防教育的性質亦常爲空間所決定。如第一防線區的國防教育決不能同於第二防線區的國防教育。在特殊地帶，因國際關係的惡化，國防教育的實施是否可能仍成問題——至少要採取最嚴密而最巧妙的方式。在比較安全地帶，我們可以實行更徹底，更嚴格，更表面化的軍事訓練。冀察的國防教育方案應異於汴洛，汴洛的國防教育方案又應異於兩粵，我想這是大家所承認的。又如汴洛之間爲平原，江浙地方多溝渠，川湘諸省多山岳，其作戰計劃不同，所以各地國防教育的內容亦不得不殊異。

第三，國防教育的方案應顧到「整個性」的原則。我們的方案在一方面要注意空間性以適應地方需要，但在另一方面又應顧及整個性以統一全國的步伐。在國防教育實施上，如同在其他教育行政問題上，常有地方分權和中央集權的爭論。我們可概括地定下一個原則：關於國防教育政策、經費、測驗標準、發布動員令等應由中央政府通盤籌劃；關於國防教育的內容、方法、設備等則應讓地方有自由試驗的機會。如在經費上，富裕區域應資助貧瘠區域，中央政府應津

貼要塞區域，這是大家所不能反對的。至於訓練內容，則各地應有自由試驗的機會，如山地可注重爬山，平原可側重溝壕戰，多湖澤區域可注意泅水等。簡言之，中央可規定最低標準，地方可擬定具體計劃，惟後者在實施前仍須得中央政府的批准。如此，我們方能獲得「多樣性中的統一性」。

國防教育應有一先決條件，即國家要有整個的國防政策。要先有國防計劃而後有國防教育，這和先有生產計劃而後有生產教育是同一道理。教育跟着社會變化是正常關係，社會隨着教育變遷並非不可能，但總是比較不常見的事情。社會改造教育收效易而成功速；教育改造社會收效難而成功慢。社會和教育的關係如同雞與卵的關係一樣，爭論孰先孰後是無意識的。但教育不能離開社會的一個原則是大家所應接受的。關於非常時期的政治、財政、軍事、實業等，我國似已有初步計劃。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使國防教育計劃聯繫於國防政治、財政、軍事、實業等計劃？國防政治、財政、軍事、實業等計劃的實施上有些困難問題，高等教育機關能助其解決；這些計劃所需用的人才，各級學校可助其訓練。同時，國防教育內容為國防政治與軍事等計劃所決定；

國防教育的方案之推動亦有賴於政治、財政、軍事、實業家的通力合作。國防教育計劃應與其他計劃密切聯才繫有成功希望，這是我所謂「整體性」的原則。

第四，國防教育方案應顧到「自動」的原則。一切方案都是無用的，如果牠不能顧到廣大民衆的意志和獲得廣大民衆的積極參與。一切命令由政府頒發，一切計劃由政府規定，使民衆完全處於被動地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不適用於民權發達的今日。民衆並非牛馬，決不甘心給人牽着鼻子走；凡是讓人牽着鼻子走的民族是奴性民族，亦決不能復興中國。希特勒說得不錯：「青年應由青年領導。」依他的意思，救國運動應讓青年積極參加，其領袖亦應從青年中產生出來，而政府祇處於輔導的地位。德國國社主義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成功實由於得廣大民衆與青年的擁護。我國有知識的青年決不肯讓人牽着鼻子走。若不准彼等積極參加國防教育的實施，甚至不准彼等對國防教育發表意見；我想成功希望是極微小的。一方面不准青年作愛國運動，他方面又要青年受國防訓練，這不但是互相矛盾，而且使人懷疑政府實施軍訓的目標不在國防，而在其他。殊不知其他任何目標的實現，仍有賴於民衆和青年

的積極參與。有參與而後有興趣，有興趣而後有努力，這是自動的原則。

歐元懷先生討論非常時期教育時，曾標出一個「對流性」的原則。他說：「一壺水置爐上燒之，不久即見其壺底之水上，同時上層之水又向壺底下沉，物理學上謂之對流。及全壺之水沸騰，能將壺蓋衝開，此就是蒸汽力之表現。非常時期之教育亦當如是。過去站在上層領導之人，總思一切由上而下，將下層民衆置於被動地位，實大錯誤。因爲上下層隔膜既深，釀成分崩離析現象，影響所及，勢非使國土盡喪，民族滅亡不可。所以今後所施之教育，應立即將隔膜打開，使成對流狀態；領導者虛衷接受民意，民衆明瞭領導者之政策及苦衷，如是對流不已，一旦沸騰時至，自能發出猛烈力量。」（教育雜誌，廿六卷，五號，四頁）這是一段極精闢的議論。可惜現在政府和民衆、學校和青年的關係不但非對流狀態，而且常成爲對立的現象。

讓民衆自動並非任其盲動，並非拒絕專家的指導。政策的規定與修正，預算的編製與核准，領袖的選出與人員的任命等應由民衆主持之。至少應採納其意見。至於實現此政策的具體方案則應由專家擬定之。民衆決定「應如何」，專家指示「怎樣辦」。專家不受民衆最後的制約，

其弊爲專橫，民衆不受專家指導，其弊爲盲動，這都是實施國防教育方案的障礙。所謂領導權應專屬於某一專家或某一集團，其轉移應是對流的和相互的。誰有能力，誰去領導。某人在某一方面有專長，卽讓其在某一方面居領導地位，但在其他方面他又應退居服從地位。每一公民是一個領導者，同時又是一個服從者，這是自勵或自由的真諦。

上述四個原則並非實施國防教育之絕對的標準，而是初步行動之可供參考的觀點。筆者亦無意列舉一切原則，不過略舉其中最要的几个罷了。真正的試金石是實驗後的效果，而比較客觀的顯著的效果，又須待至和敵人實際作戰時始能看出。所以目前所談的原則只可算是初步實驗的而略帶危險性的幾個假說。

專談原則而不談具體方案是不成的。國防教育實施方案在十餘年前有些朋友已經發表過，近來刊布的方案如雨後春筍，更不勝枚舉。草擬方案是最容易，亦是最困難的事情。它是最容易的，因爲振筆而書，閉門造車，是頗有趣的一種娛樂；它是最困難的，因爲這方案所牽涉的因素除教育外，還有政治、財政、軍事、實業、科學、藝術等，並且教育的範圍亦極廣泛。所以我懷疑國防教

育方案是可以一個人或一個學術或專業團體所能規定的。下面所述的方案不過是個人一時想到的最簡略的初步設計。

關於教育行政，我以為在南京應設「全國國防教育委員會」，為國防教育上最高立法機關，監察機關。其委員名額暫定為廿五人，其中各政黨代表三人，工會，農會，商會代表各二人，大學，中學，小學教師代表各一人，各級學校學生代表三人，均由各關係團體選出。此外應有軍事，財政，外交，實業，教育專家各二人，由各專業團體推薦若干候選人，再由政府選聘。其職權為：確立國防教育方針，審核國防教育預算，編擬訓練最低標準，審定國防教育讀物，制編各級軍訓測驗，改良訓練方法等，其與教育部的關係應如法國最高教育參事會與其教育部的關係。其威權與地位應如全國經濟委員會的威權與地位。此委員會又可組織若干專門委員會。它可聯合教育部，國立編譯館，全國各大書局，聘請專家修改教科書及編輯國防教育的教材。各省，市，縣應設分會，其組織與職權略同於總會，其對教育廳或局的關係略同於總會對教育部的關係。那些委員會一方面能調和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他方面又能溝通民衆意志與專家意見。它們能統一民衆意

志及集合全國人才，因為救國事業決非少數人所能包辦的。

各研究院的努力方向似亦有轉變的必要。過去研究多偏於理論或考古方面。試問這種「嚼枯骨，挖祖墳」的勾當對於國計民生有何裨益？今後研究應以國防為中心，各研究院至少應以三分之一的經費作為國防研究之用。如物理研究所應研究死光，化學研究所應研究毒氣，生物研究所應研究毒菌，天文研究所應調查要塞區域的氣流以利軍用飛機的航行，地質研究所應調查有關於國防的礦產。研究問題應以在一二年內能著成效為原則。各研究所又應和有關於國防的工廠保持密切聯絡。如物理研究所最好設於飛機製造廠或兵工廠之隣近，化學研究所最好設於火藥製鍊廠，鍊鋼廠，硫酸廠之附近。研究員可常至各廠參觀或實習，以引起研究動機，凡各工廠有難解決之問題委託研究所研究之，其經費由雙方分担，不足時再由政府補助。研究員有特殊成績者，國家予以重賞。洩漏研究上之祕密者，應處以極刑。這些辦法有些朋友在七八年前已經鼓吹過，可惜無人肯聽。我們哀戀那些德高望重的學者貢獻其天才於國家！

其次，大學教育似亦有改進的必要。我國優良大學近年來進步很快，其設備，課程，學生程度

可與歐美第一流大學相頡頏，其教授及學生研究成績發表於歐美著名雜誌而漸爲西方學人所注意者亦不少，這真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可惜彼等所研究者對於民族生存毫無關係。我們以爲全國優良大學的理工農醫等科應開一聯席會，各就其經費上設備上人材上之能力所及，分別研究一有關於國防的問題，或數校共同研究一問題，其與各兵工廠之關係，經費之分配與補助，研究成績之獎勵等辦法略同於研究院。大學各院系課程亦宜適應國防上的特殊需要。如工科應使學生測量要塞，橋梁，道路，研究掘戰壕，修碉堡，築砲台，修理兵器和交通機械等。理科宜研究毒氣，毒菌，射擊學及測繪軍用地圖等。農科應研究戰時所需農產品及食糧產量之增加分配法等。醫科宜訓練救護工作人員並籌設後方醫院。文科宜注重民族鬥爭史，遠東外交史，編輯愛國小說，歌曲，戲劇，編製軍用測驗，製作戰歌，繪畫戰圖等。大學軍訓應注重掘壕，築壘，露營，實彈射擊，野戰練習等。學校宜採用軍事管理法，校長和教職員亦兼軍職。

復次，民衆教育亦應以國防爲中心。依我們的意思，全國可劃分爲若干防線區，在第一年內應儘先普及第一防線區的民衆教育，以後逐漸推行於其他防線區。各省實施民衆教育亦應依

照其區域，在國防上的重要性以定其實施之程序，即先普及要塞區內的民衆教育，再逐漸推行於比較安全地帶。民衆教育的內容應以軍訓爲主，宜分期徵集壯丁受短期軍事訓練，注重實彈射擊，緊急集合，露營，消防，防空，防毒，救護，偵察，游擊等練習。各要塞區又應限一年內興築若干砲台，兵營，山洞，戰壕，穀倉，醫院，軍用汽車等。這些工程都可用徵工法完成之。在政治訓練方面，我們應利用幻燈，電影，掛圖等表演中華民族在過去的光榮史，歷代民族英雄的戰績，近數十年來喪權失地的恥辱等以激發其愛國心；又應教以慷慨壯烈的歌曲以振作其尚武精神。近來我國民衆教育新實驗已走上這個路線。山東荷澤的鄉教和廣西的民團，給我們極好的模範。

在高等教育和民衆教育上實施國防教育可於一二年內著成效，所以國家的經費與人才，應儘先集中於這兩方面的努力之上，至於中小學教育在一二年內只應謀質的改良，不宜圖量的擴充。所謂質的改良就是在課程上和生指導上適應國難期內特殊需要的意思。關於課程，中小學的語文學科應多選讀能發揚民族精神的詩文和歷代民族英雄傳記；自然學科應講述戰時原料之來源和軍事上應用之理化常識；數學學科應講述軍事測量和軍事繪圖，社會學科

應注重中華民族鬥爭史，近百年來我國失地史，我國沿海及邊疆之形勢等；藝術學科應製造戰場模型和簡單軍需品，繪畫戰圖，學唱戰歌等。在高中又應設軍事常識一科。

關於生活指導或軍訓，我國應依照俄德意的青年訓練法，將全國自八歲至十二歲的小學生編為幼童軍和幼女軍，自十二歲至十五歲的初中生編為少年軍和少女軍，自十五歲至十八歲的高中生編為青年軍和女青年軍，其編制法應略如我國正式軍隊的編制法。每隊可冠以歷代民族英雄之姓名，如漢武帝隊，唐太宗隊，衛青隊，竇憲隊，霍去病隊，張騫隊，岳飛隊，文天祥隊，史可法隊，戚繼光隊等。每隊精神訓練即以其民族英雄的人格與功績為中心。如岳飛隊即以「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為其格言，而以「滿江紅」為其行軍歌。每隊活動約分三種：（1）組會，（2）軍訓與旅行，（3）社會服務。每隊分十五人為一組，每組於每兩週開會一次，每次二小時，討論政治，外交，軍事等問題。軍訓應注重野戰實習，露營，救護等。在暑假期內每隊應旅行三週以上，全國各廟宇之一小部分建築可改為青年旅行寄宿舍。社會服務應為募捐，慰勞，看護，修路，防空，賑災等。

最後幼稚教育似亦有國防化之必要。文弱華族最普遍的國民性，欲剷除此國民性，應從幼稚教育下手。俗語說：「教婦初來，教兒嬰孩。」又西諺說：「讓我支配兒童六歲以前的教育，以後的教育我就完全不管亦無妨。」足見幼稚教育的重要。如果要培養一個有尚武精神的新民族，我們應從幼稚園做起。在設備方面，我以為目前幼稚園的恩物有一大部分是毫無意識的東西，應即廢除，而代以略有軍事意義的玩具與模型。如小兵，槍，砲，坦克車，飛機，兵艦，砲台，刀，弓，劍，戈，矛，戰場等玩具或模型。在活動方面，故事應注重民族英雄的兒童生活之故事，兵器發明故事，冒險故事等。動物故事亦應注意尚武精神，如「關公的赤兔馬自述」、「唐太宗的拳毛騮自述」等。觀察或旅行應使兒童常參觀童子軍，正式軍隊，飛機場等。製作一科宜使兒童用泥沙製作戰場模型，後方醫院模型，兵士，槍砲，飛機等。歌舞應注重戰歌和凱旋舞；遊戲應表演民族英雄的戰績和列強壓迫中國的故事。一切節目遊戲會都應有提倡尚武精神的節目。說來太囉嗦了，就此打住罷！

前面已經說過，本文所要說的話都是吾友李余陳常左諸先生在十二年前已經說過的話。

進一步說，張之洞、張百熙、梁啓超等，在三四十年前又何嘗沒有說過這些話呢？近來發表的關於國防教育的散文與方案，據說有二百三十餘篇之多，一切好聽的話都被人說得淋漓盡致無以復加了。本文亦不過將人家說過的話重述一遍罷了。但筆者所最憂慮的是：中國是一個「說話圖」。照例，話說完了，事情也完了，方案發表了，這個運動也完畢大吉了。四十年來我們高談國防教育，但國防教育的成績在那裏？失敗的唯一原因，是大家都在文字上做工夫，顏習齋說得好：「文字上多一分，則力行上少一分。」筆者既不能力行其國防教育的設計，復東施效顰地來做這番文字上的工夫，真是罪當萬死！

民族文學與教育

邱椿

某文學家近來發表如下一段談話：

「談民族文學，先要離開政治作用講。民族文學這名詞本是講得通的，不過在事實方面說，提倡則不必等於多此一舉。因為一個民族的文學，自然是代表那個民族的，中國人文學作品豈是代表中國這個民族，直如中國人的面孔是中國式一樣，但不必一定要提倡民族臉。文學也是這樣，如果要去找非民族的文學倒是很不容易哩，所以說多此一舉。」——世界日報教育欄，廿四，十，廿八。

上面這段話似有兩個根本假定：

一 民族文學不必提倡；

民族文學與教育

二 民族文學應離開政治作用。

依我看起來，這兩個假定都有商榷的餘地。

第一，某文學家說，我們不必一定要提倡民族文學，就如同不必一定要提倡「民族臉」一樣。這話很妙，但依我的意思，民族臉也未嘗不可提倡，並且目前提倡民族臉者正大有人在，就是希特勒。在德國中小學人種學的教科書上和希特勒青年團的日記本子上都刊有人種圖表，上有德國境內各民族的典型臉，並以北歐民族的臉為標準臉，這就是德意志的民族臉。希特勒要青年們在選擇配耦時，亦以北歐民族的臉為標準臉，將來生下子女其臉也多半合此標準。幾百年後，德意志的民族臉也許就成功了。這也是一種優生政策。如果有人要選擇一個端正雄秀的漢族臉作為中華民族的標準臉，使青年選擇配耦時都注意於這個標準臉，我想從優生觀點上說，不應視為「多此一舉」。

民族臉的形成多由先天的原素，但仍可用人力去支配；民族文學的創造則多由於後天的原素，我們獨不應用人力去支配嗎？民族文學有種種不同的解釋，但無論作何解釋，都有用人力

去支配的必要。比方有人說，民族文學是表現民族性的文學；中國文學自然會表現中國人的民族性，何必要人提倡？但民族性有好的，也有壞的，前者應培養滋長，後者應昇化遏滅。文學能表現優良的民族性，才算真正民族文學。何者為優良的民族性？這是要人選擇的。表現優良民族性的文學是要人提倡的。如其不然，這種文學的產生至少要推遲若干年。復次，表現某種民族性又有技術問題，若有人提倡，則表現的技術更有進步。又有人說，民族文學是代表民族理想的文學。但這種文學亦是要人提倡的，因為理想的好壞是要人決擇的，發表演想的技術是要人不斷改進的。還有人說，民族文學是鼓吹民族思想，使其爭求國際不平等的文學。但這種文學運動若無若干感權者提倡與推動，是不能成功的。簡單一句話，民族文學不是自然演進的結果，而是人工提倡的產兒。任何文學都是如此，就是某文學家所暗示的自然主義的文學亦是要人提倡的。

第二，某文學家以為民族文學應離開政治作用。這是一種文學獨立論，其不合理和教育獨立論差不多。人是政治的動物，文學家亦是有政治意識的人，古今文學家多半是政治實行家或理想家。中國古代第一個大文豪屈原，便是一個政治家。若要在歷史上找出一個毫無政治意識

的文學家，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現代生活中，政治的力量越發普遍而且深入了。現在政治即是社會，離開政治或社會來談文學是不可能的。莫說文學，就是自然科學也不能離開政治。現代自然科學的目標，內容，組織等常為政治生活所決定。克里克（Ernst Kriek）說得好：『在現代生活之中，政治的領導力支配着一切領域：法律，美術，宗教，經濟，科學，文化，教育的中立性之時代已過去了。上述一切原素在民族的總使命上，都有其特殊的責任。他們從民族使命中，形成其性質，內容，組織，與價值。』（Nationalpolitische Erziehung, S. 12）他又說：『如果一種科學高懸完全的客觀性，或要對價值和政治獨立，牠祇是掩飾其弱點，隱藏其無能，毀滅其效率罷了。』（Die Revolution der Wissenschaft, S. 18）

文學除工具價值外，還有其內在價值，這是我們承認的。但我們決不能視工具價值和內在價值是敵對的東西，更不能離開前者而空談後者。無論何種經驗都有作與受的兩方面，作是手段，是工具，受是目的是結果。離開工具而空談結果，或拋棄手段而高談目的，是不懂經驗本質的說法。手段或工具是經驗的歷程，或經驗之始；目的或結果是經驗的究竟，或經驗之成。我們還可

說，手段是目的之始，目的是手段之成，所以手段和目的並非敵對的東西。同一道理，文學之工具價值與其內在價值不是敵對的東西。果離開政治作用而談民族文學，那是直接地否定文學的工具價值，也就是間接地否定文學的內在價值。

復次，一個文學作品的內在價值亦決不因其有工具價值而減少。托爾斯泰的作品常蘊藏着他的政治理想，是有政治作用的，但並不因此而喪失其內在價值。威爾斯的小說，易卜生和蕭伯納的戲劇，都隱藏着其特殊的社會主義的民治理想，但亦不因此而喪失其本身價值。俄國現代文學家如李阿諾夫、利比丁斯基、格拉得可夫（Leonov, Tjpedinsky, Gladkov）的作品多半是共產主義的宣傳品，但其內在價值或因是而增高。又如現代德國詩人格林（Hans Griem）的名詩「有人無士」（Volk ohne Rauh）是有政治作用的，但亦不因此而減少其本身價值。又如愛爾蘭作家格雷葛露（Gregory）小說中多有愛國思想，但我們似不應因其政治作用而罵其「多此一舉」。歌德總算世界大文豪了，他說：「惟有效用的，才是真的。」（Was fruchtbar ist, allein ist wahr）足見文學家並不輕視效用工具的價值。

我們的結論是：民族文學需要提倡，牠不能離開政治作用。

站在中小學教師的立場，我們對於中國當代文學家至少有三類懇求或希望：

一 希望他們多寫些能改造民族性的文學作品。中華民族性的弱點是文弱、自私、空虛、苟且、缺乏組織力等。這種民族是不易生存於現代世界的，目前我國青年也不免有上述這些劣根性。學校教育的影響本極有限，並且現在學校教育多偏於理智方面，對於青年意志及情緒的訓練，壓根未曾注意。青年讀物又極缺乏，教師雖欲藉指導青年閱讀以陶養其意志與情緒，而苦無相當工具。我們希望文學家多寫些能糾正青年弱點的文藝。例如青年的弱點之一爲文弱怯懦，我們應有提倡尚武精神的小說與詩歌。我們希望我國有如芬得哀森（Findisen）的「褐衣同志」那樣的小說供青年的瀏覽。在積極方面，我國文學家似應描述我國優良的民族性，如勤勞、節儉、和平、禮讓等。

二 希望當代文學家多寫些能代表民族理想的作品。一個偉大的民族必有其特殊的天才，對於世界文化必有其特殊的使命和理想，如其不然，這個民族不是偉大的民族，不配生存於

天地之間。民主政治是盎爾撒克遜民族的使命與理想；國社主義是德意志民族的使命與理想；共產主義與世界革命是斯拉夫民族的使命與理想。但什麼是中華民族的使命與理想？也許我們還沒有找出來。文學家是社會的預言家，應能告訴我們什麼是中華民族的理想與使命。從事教育者責任在如何實現此民族理想，或如何完成此民族使命。教育不能領導社會，教育常為社會所領導。古今領導社會思潮者多半是政治家，哲學家，文學家等。如果文學家不能昭示民族思想，未免荒棄其責任。近來青年太頹廢了，文學家應鼓勵其自信心，加強其意志，使其追隨一高尚遠大的民族理想。

三 希望我國文學家多寫些鼓吹民族自決的作品。近四年來中華民族生命受空前的威脅。我們的處境和命運強迫我們走上復興民族之路。復興民族是全國人的責任，是政治，經濟，法律，宗教，文化，美術，科學，文學，教育的總目標。文學在復興民族的大業上自有特殊的責任，文學應從復興的大業中陶鑄其性質。充實其內容，肯定其價值。在民族屈辱的今日，若仍高談文學的客觀性或中立性，那祇是暴露其弱點，掩飾其無能，摧毀其本質。鼓吹侵略戰爭與帝國主義的文學，

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但謳歌自衛戰爭與民族獨立的文學，是我們所渴望的。這種文學最能影響青年。亦最能改造社會。教師不過是學校式的教育家，文學家是社會式的教育家。前者對青年意志之影響有時還遜於後者。所以我們希望當代文學家也負起青年訓練的責任，以完成民族復興的使命。

國防力之「平時經濟性」與「戰時政治性」

劉崇岳

一

甚麼是國防力？簡單的說：就是國家防衛的力。詳細一點說：凡兵員，金融，財政，交通，產業，及其他一切物質的非物質的等等力量，都無一不屬於國防力，每一個國家，若想爭生存於現代國家之林，必須具備上述各種的國防力。如果沒有具備上述各種的國防力，或雖已具備，尚不合於吾人所提示的兩個條件——（一）「平時的經濟性」，（二）「戰時的政治性」，那依然不能算是有持久性，有強固性的國防力。

作者在本文所謂「平時的經濟性」，所謂「戰時的政治性」等名詞，多少是有點創造性

國防力之「平時經濟性」與「戰時政治性」

的。讀者雖然看見，難免不有點懷疑。那末，我且把它解釋一下罷。所謂國防力的「平時經濟性」就是說：國防力，平時要在「培養國力」的原則下面建設起來。所謂國防力的「戰時政治性」就是說：國防力，戰時要在「宣揚國威」的精神下面應用起來。換句話說：平時不要浪費國力，以講求國防強化；戰時不要愛惜國力，使得國防弱化。更明白一點說：平時的國防力，要顧及到整個國家的元氣；戰時的國防力，要能夠達到國家政治的目的。

我在上面，把我對國防力所提示的兩個條件解釋了以後，我的信念是這樣的：強國的國防力，不具備這兩個條件，強國必弱；弱國的國防力，不具備這兩個條件，弱國必亡。話說到這裏，必有人忍不住的要起來問我：我們中華民國，自然不是強國，而且是弱國；弱國的國防力，不具備所謂「平時的經濟性」與「戰時的政治性」，尙且要亡國；何況我們中華民國，根本上不具有甚麼國防力，那末，我們的中華民國將如何呢？

我敢毫不遲疑的很負責任的答覆說：祇要有偉大的政治家，能夠照我所提示的國防力的兩個要件去作，我敢担保我們中國不惟不亡，而且不會弱；不惟不會弱，而且尙要強。這是什麼道

理呢？吾人應該知道，且應該正確的認識：中華民國暫不過是「亂」國，是「危」國。絕對不是「弱」國，而且不是「貧」國。請予不信，請看我先民的話：「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誠任，不患無財。民誠用，不畏強暴。德明教行，則能以民之有爲己用矣。」這不是商君書鑄法篇明明白白的告訴吾人的嗎？這又豈不是商君所以著強秦之效，開中國兩千餘年來一統之基的根本信條嗎？現在的世界，是一個「新戰國」，我們中華民國，有三千五百萬方里的土地，有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如此而猶對那些土地人口，都比較小好多倍的區區國家，自甘爲弱，自甘爲貧，那真是愧對先民，甘心爲不肖的子孫啊！

所以我們中華民國，祇要有偉大的政治家，能夠如商君所告訴吾人的：「德明教行」，也可說能夠如商君當日治秦的「一民於農戰」的精神（我要說明白的，我是主張法治精神，非主張食古不化的，再來一回單純的「一民於農戰」）來從事於「培養國力」式的國防力的建設，又何患不立時可以已亂扶危，並充實國防力之「平時經濟性」與國防力之「戰時政治性」呢？

話再說轉頭，我所謂國防力，是指那些兵員，金融，財政，交通，產業，以及其他一切物質的，非物質的等等力量。這些力量，要如何纔能合於所謂「平時經濟性」與「戰時政治性」的兩個條件呢？我試簡略的寫給人們看一看。

一一

(一) 就兵員說罷：兵員在國防力構成因素中，有第一位的重要性，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要使得這種國防力，具備「平時的經濟性」與「戰時的政治性」，在形式看，固然要實施徵兵的制度，才能平時養少數的兵員，減少國庫不生產的負擔，免得耗損國家的經濟力量，而戰時又能舉行動員，以爭國家的生存，達到國家政治的目的。但從實質方面研究，要想國家的兵員，充分具備我所提示的兩個條件，最要緊的，也可說最根本的，必須要把國民們，從他錯誤的人生觀，國家觀乃至哲學，宗教，藝術等等所謂無明的迷夢裏面，快快醒覺過來；換句話說：要使得國民們，知道自己國家建國的理想，自己國家對人類的使命，至少也要知道自己的國家現在所處的地位，

由國家地位，決定自己的人生觀。具有這種「自覺」的人生觀的兵員，那才配稱爲國防力，那才能夠真正具備我所提示的兩個條件的國防力。

(二) 就金融說罷：現在的戰爭，人多謂是經濟的戰爭，則在經濟機構中居重要地位的金融事業，自然也是國防力構成的重要因素，那末，這種國防力，要它具備「平時經濟性」與「戰時政治性」，最好可拿歐洲大戰前與大戰時的德意志的金融事業做個模樣。德意志國家銀行組織的健全，紙幣發行權的集中，這是不足爲異的。而其爲德國銀行特點的，就是發展其金融的機能，致德意志產業於繁榮的這一點。譬如那個時節的英國，其儲蓄銀行，對於所蒐集的存款，僅不過依於票據貼現，有價證券收買等方法，以資融通。而在德意志的同樣銀行，就於存款以外，既融通資金，復買賣證券；既担任公債公司債的發行，復主持公司的創立合併。因是德意志的銀行，得着「爲工業開拓者」的令譽。在平時既然把國力培養到很深厚的地步，所以一到戰時，就能夠利用他的銀行的健全組織，施行他所謂「金融的動員」，而且表現他異常持久的能力。若平時不以保護獎勵內國產業爲主要的業務，換句話說，或如我們中國現在的一般銀行，以經營公

債務唯一要務，那就是不到戰時，只要國家政治上稍欠安定，金融市場，就馬上動亂起來，那裏配說爲達國家政治的目的，舉行金融動員啊！

(三)就財政說罷，吾人看世界歷史上有名的幾次戰爭，如拿破崙戰爭，普法戰爭，以及一九一四年發生的歐洲大戰，其戰費的來源，總離不掉(一)中央銀行的一時借貸；(二)公債的發行(有財政部的證券，國庫的證券及公債數種)；(三)租稅的增徵及新設；(四)其他減債基金的挪用，一般經費的節餘，豫儲資金的動用等項。而這四種中間，以銀行係一時的融通，減債基金係一時的挪用，而節餘預儲，亦極有限度，於是可爲戰時主要財源的，僅只公債及租稅兩項。這公債與租稅，在戰時姑無論孰先孰後，而公債又姑無論是否先短期後長期，租稅亦姑無論是否先直接稅後間接稅，要之發行公債，必須國民有消納公債的能力。增加租稅或新設租稅，必須國民有負擔租稅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必須平時有好的財政政策，把它培養起來，平時若無好的財政政策，把它培養起來，不管戰時施行那樣的財政政策，都是竭澤而漁，結果就是民不聊生，而戰時的社會秩序就莫能保，自然要影響於戰事的前途。

(四)就交通說罷，凡屬交通機關如鐵道、公道、船舶、汽車、馬車、牛車、手車、鞍馬、馱馬、驢、駱駝等，無一不可為構成國防力的因素。這些交通機關，尤其是鐵道、公道這兩項，其由國家經營的，大都一面有政治的性質，一面有經濟的性質。若僅有政治的性質，無經濟上利用的價值，總以少到沒有為最好。譬如由甲都市到乙都市，為將來軍事上運輸便利，中間宜有交通線，以資聯絡，就勇敢的，斷然的徵收民田，利用民力，把公路興修起來，修起了以後，就把它擱置着，等候軍事時節的來臨，表顯它的用處。不然的話，它是一點用處沒有的，徒令人民受一種損失罷了。這種公路政策，就是不具備國防力的兩個要件，深刻一點說，根本就不成其為國防力。我再舉一個例子給人們看看：歐戰時節，各國都舉行國家總動員，關於運輸兵員，集中前線，自然需要最多的運輸工具，這些工具，豈是平時都製造完備，一一藏以待用嗎？不是，決不是，十九都在平時也被利用着的，那有都藏着待用的事呢？如德國戰時，運輸汽車上的坐凳，就是平時公園內供遊人休憩的坐凳，甚至路上搬運東西的工具，就是柏林公園平時供遊人賞玩的馴象，這是何等的善養國防力，這又是何等的善用國防力！

(五)就產業說罷：戰爭發生的時節，每一個國家，爲了軍需品的供給，及國民生活的確保，關於工、礦、農、漁、商等各種的生產，製造，分配，消費，交易，儲藏，移動等事，都要把它統制起來，成功一種所謂產業動員的狀態。那末，這所有工、礦、農、漁、商各業，都是國防力構成的因素，是不待言而明的事情。尤其是這些國防力，要具備「平時的經濟性」與「戰時的政治性」，更易爲一般人所理解。我現在僅就工業一端說罷：歐洲大戰所給予吾人的教訓，現代戰爭，兵器彈藥的消耗力量，是該如何的膨脹？兵器彈藥的補充力，是該如何的充實？在這樣教訓之下，無論那個國家，若想單獨利用國立的工廠，以策國防上的萬全，這是做不到的事體。所以人們說：有彈性的國防計劃，才是進步的，才是經濟的。吾人試看歐戰中的德國罷：他施工業動員的時節，是把平時的機廠，工廠，玩具工廠，人造絹絲與染料工廠，分別轉變爲彈藥製造廠，信管製造廠，無烟火藥製造廠，一言以蔽之，是把多數的民間工廠，尤其在戰時經營困難的工廠，把他都轉變爲從事於兵器彈藥製造的工廠，所以才能夠十分表現戰鬥的威力，換句話說：所以才能夠十分表現這種國防力的「戰時的政治性」。假令某一國家，沒有這種認識，想以單純的國家工廠，甚至僅僅借重外來的供給，那

是要一擊立碎的啊！

除了上面寫出來的幾種而外，尚有其他物質的非物質的國防力，作者限於事冗，不克盡說。即以上寫出者，亦各僅及大略，難免掛一漏萬，這當請讀者原諒！

三

本想攔筆的，却是又情不自禁的要問一問我們中華民國的兵員現況如何呢？金融現況如何呢？財政現況如何呢？以及交通現況，產業現況又如何呢？不問則已，一問起來，自己便覺得在前面負責任向懷疑者答覆的一大段話，要發生問題哩。

吾人試看我國的兵員現況罷：我國所謂兵員，當然是指現役軍人而言。那末，他們的人生觀如何呢？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受夠了外侮刺激的軍人們，多少總應該有了覺悟，多少總應該明瞭我國現在所處的地位。因之他們的人生觀，也應該已由國家這樣的地位，把它決定。然而事實如何呢？恐怕軍人們，當兵的，或者尚是「吃糧的人生觀。」當官的，或者尚不少「升官發財的

國防力之「平時經濟性」與「戰時政治性」

人生觀」那末，這樣兵員的訓練，在平時，究竟是不是國防力的涵養？在戰時，究竟能不能為國家的政治目的犧牲？這能夠說一句「不成問題」的話嗎？

再看我國金融財政的現況罷：金融業者的唯一穩當的營業，就是買賣政府發行的公債。甚麼工業啊！商業啊！鑛業啊！漁業，農業啊！誰復過問？縱責任上要過問，又誰復肯真心的過問？政府的財政政策，是不管這些事情的，是仍要施行敲骨吸髓式的租稅政策的，所以弄到現在，農村破產，都市蕭條，若不速謀拯救，眼見無病而終。那末，要說這是由那些肉食的人們，不理解金融財政之為國防力，與夫國防力的兩個條件，又誰曰不宜！

更看交通現況與產業現況罷：最要緊的交通工具，鐵道有好幾條，公路雖然不少了，其已具備「平時經濟性」與「戰時政治性」的，又有好多？汽船有好幾條？汽車有好多部？能夠說「不自慚愧」嗎？至於產業：號稱農業國家，却是食糧要仰給外來，以補不足。號稱寶藏豐富的國家，却是製造原料，尚須他人供給。工業方面，重工業的工廠在那裏？輕工業的工廠又如何？商業方面，只聞倒閉清算之聲，毫無欣欣向榮之象。其他如漁業，如絲業，如茶業等，又無一不是死氣沉沉，旦夕

呼救。唉！這些交通的工具，這等產業的現象，他們自己本身，就根本不配稱爲國防力那裏配說甚麼具備國防力與否？

照上面這樣的說法，中國豈不是業已無可爲嗎？是何言！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只要有偉大的政治家，這兩句話，就可以表現到事實上面。詳細一點說：所有兵員、金融、財政、交通、產業以及一切物質的非物質的國防力，自然可以於短時期完成。（這不是我信口說大話，讀者試觀歐戰時英法的工業動員狀況，就明白了。）並且這個國防力，自然能夠合乎我提示的兩個條件。吾言至此，或者有人要問道：「你所謂偉大的政治家，究竟應該具備那樣的才能，才配做你理想中的事業呢？」那又是另一問題，不在本文範圍之內，容待異日再行討論罷！

國防中心論

八三

從近代戰爭說到我國國防問題

沈雲龍

近代戰爭，隨着人類知識的進步，科學的發達，較諸往昔的小規模戰爭，不僅殺人利器，愈見劇烈，即在其他方面，亦復是有着驚人的變革和顯著的擴大。第一：就戰爭的意義言，往昔戰爭，不過是一種決鬥的進化，而爲貫徹使敵人屈服於我意思之下的暴力行爲；近代戰爭，則是以國家的整個機構，傾全力於國防，與敵人相爭持，而爲確保國家安全與國民生存的戰爭。第二：就戰爭的本質言，往昔戰爭，僅限於武力戰；近代戰爭，則更包含有經濟戰、外交戰、思想戰，以爲取決勝負的手段。因此，吾人的一切生活，殆莫不爲戰爭行爲的一部，無論政治、經濟、教育、宗教、藝術，所有的

國民生活，俱為戰爭的基礎。第三就戰爭的規模言，近代戰爭，無論在質的方面，量的方面，時間方面，空間方面，都比往昔戰爭為擴大，其發展情形，至可驚怖！茲舉一二統計如下，以明吾說：

過去諸戰役出征人馬比較表

戰役	時間	出征人員 (單位千人)	出征馬數 (單位千頭)
普奧戰爭	一八六六年	一、六〇二	二五一
普法戰爭	一八七〇—七一年	三、一六二	五五〇
中日戰爭	一八九四—九五年	五九〇	一三一
日俄戰爭	一九〇四—〇五年	二、二九九	四七一
世界大戰	一九一四—一八年	一七、七四〇	五、九〇八

過去諸戰役戰費比較表

戰役	時間	續繼日數	戰費總額 (單位百萬元)	一日平均戰費 (單位千元)
拿破崙戰爭	一七九〇—一八一五	九、〇〇〇	三、〇七〇	三四一

克里米戰爭	一八五四—一八五五	七三〇	一、七〇〇	二、三二九
美國南北戰爭	一八六一—一八六五	一、三五〇	七、〇〇〇	五、一八五
普法戰爭	一八七〇—一八七一	二一〇	三、二一〇	一五、三〇〇
波亞戰爭	一八九九—一九〇二	九九五	一、二五〇	一、二五六
日俄戰爭	一九〇四—一九〇五	五四八	二、一〇〇	三、八三二
世界大戰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	一、五五六	二〇八、三〇五	一三三、八八〇

從上列統計，可知近代的諸戰役，其戰爭的規模，乃是逐次的擴大。其中尤以世界大戰的出征人馬數，戰費等，其數字之鉅，更較其他戰役爲可驚，故可名之爲「代表的」近代戰爭，吾人不能不予以特別的注意。

二

近代戰爭，擴大到何種程度呢？可以世界大戰爲例，分三方面去觀察：

從近代戰爭說到我國國防問題

（1）動員人數 世界大戰的初期，參戰各國俱於短時間內，實行陸軍兵力的增大動員。
例如：

德國	平時五十師團	一月間	百十二師團
奧國	平時四十八師團	一月間	五十七師團
法國	平時四十四師團	五日間	八十三師團
俄國	平時八十八師團	四十一日間	百十三師團
德國	開戰時百十二師團	最大展開	二百四十六師團
奧國	開戰時五十七師團	最大展開	八十二師團
法國	開戰時八十三師團	最大展開	二百十四師團
意國	開戰時二十八師團	最大展開	七十五師團

是可見各國軍事動員的迅速，遠非兵力散漫的弱小國家所可比擬。而各國在大戰期中，其兵力展開的最大程度，則又如下：

英國

開戰時二十師團

最大展開

九十三師團

此種膨大的飛躍展開，實爲近代戰爭的最大特色。然尙不止於兵力的動員而已，此外如從事軍需品的製造，傷病者的輸送與治療，以及國民生活必需品的生產，戰時一般經濟界的維持，亦均需要大量人員。所謂「全國總動員」一名詞，就是世界大戰中爲事勢所逼迫出來的產物。

(2) 戰費損耗 世界大戰交戰國的戰費，一日平均支出額，據日人神田孝一在其所著近代戰爭論中所引如下：

英國

四七、三六五、二八〇圓

法國

三五、八三二、四二〇圓

美國

七二、二〇九、二五〇圓

意國

一三、七七九、〇九〇圓

俄國

三八、九六四、九〇〇圓

德國

三九、一八七、六八〇圓

從近代戰爭說到我國國防問題

英國

二〇、六〇五、九四四圓

此龐大的戰費，每日皆消耗於無情炮火之中，故大戰結果，無論戰勝者或戰敗者，俱雙方筋疲力竭，元氣大傷了。

(3) 兵器需要 世界大戰的主要兵器，如坦克車，輕機關槍，高射砲，迫擊砲等新兵器的出現，以及輕重砲，重機關槍，飛行機等，在戰爭的末期，較諸大戰初期，亦增大至數十倍。因此，彈藥消耗量極大，而兵器損害率亦極高，時時需要補充。故近代戰爭勝敗的關鍵，恆視武器補給能力是否充實以爲斷，茲將歐戰期中德法兩國軍需工業生產狀況，統計如下，便可明瞭近代戰爭的兵器需要程度了。

世界大戰中德國軍需工業一個月最高生產量

火藥

一四、三〇〇噸

小銃彈

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發

小銃

二五〇、〇〇〇挺

重機關槍

一四、四〇〇挺

輕砲

四、五〇〇門

重砲

八〇〇門

砲彈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發

手榴彈

八、〇〇〇發

飛行機

二、〇〇〇架

同發動機

二、〇〇〇個

世界大戰全期間法國軍需工業生產量

大砲

二一、〇〇〇門

機關槍

八八、〇〇〇挺

小銃

二、九四三、〇〇〇挺

砲彈

二四七、〇〇〇、〇〇〇發

從近代戰爭說到我國國防問題

小銃彈

六、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發

飛行機

五一、〇〇〇架

同發動機

九三、〇〇〇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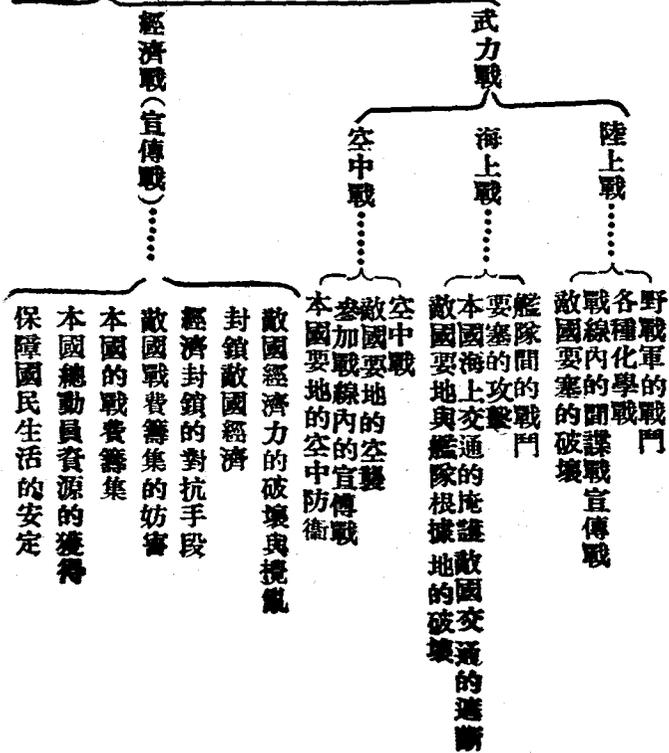
坦克車

三、二〇〇台

上列數字，僅係德法兩國，其他參戰國家，軍需工業的擴大，當亦大致彷彿，故際此鉅量殺人利器發揮其最高效能之時，亦即世界人類血肉橫飛，屍骸遍地之日。是以世界大戰所遺留的慘痛，迄今猶覺談虎色變者，其因即在此。然而大戰結束未及二十載，如今國際糾紛，世界情勢，早又恢復到一九一四年前劍拔弩張，躍躍欲試的狀態。在歐洲，在遠東，戰爭之神已經替我們埋好了兩夥一觸即發的炸彈，目前祇不過剩着時間的遲早先後問題而已。果將來萬一不幸，爆發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其戰爭的規模，無論就任何方面說，都要比過去歐洲大戰來得更擴大，這是一種自然的趨勢，毫無疑義的。

吾人前已言及從來戰爭，祇係軍備對軍備，武力對武力的戰爭，近代戰爭則不然，其形態極端擴大，舉凡國家的一切能力與一切知識，均須全部動員，實行大規模的國力戰，故國家一入戰時，所有軍隊的作戰，交通的運輸，軍需的補給，戰費的籌集，資源的保護，無不在嚴密的指揮與連繫之下，一致總動員，故歐戰期間，德國設有戰時原料管理局，英國設有軍需部，美國亦有戰時工業委員會，俱屬實施產業統制，而為國家總動員的中樞機關。然近代戰爭舍武力戰外，尚有經濟戰，外交戰，思想戰等，或先後利用，或同時並進，以為獲得勝利的手段。是以近代戰爭，不獨所包括的方面多，即所牽涉的範圍，亦極廣汎。日本陸軍少將宇山節太郎，在其所著國防論中，分析近代戰爭的形態甚詳，茲節引之如下表。

近代戰爭形態



外交戰
政略戰
宣傳戰

正義的輿論及同情喚起
阻止第三國加入敵國方面
國際孤立的迴避與優越地位的確保
使用外交手段為戰局有利的指導

思想戰
間諜戰
內政戰
宣傳戰

敵國政情經濟及軍事狀況的偵察
敵國內異民族，不平分子，社會主義者的煽動
國家總動員的妨害
軍需品製造工場及倉庫的破壞
發電所，電線，水道，瓦斯工場的破壞
道路，鐵路，及其他交通機關的破壞
罷工暴動的煽動及助長
要人的暗殺，團體政體顛覆的策動
敵國的政治思想動搖的助長
戰意喪失銷沈的誘導
戰爭妨礙運動的誘發
戰爭轉化為內亂的國內革命之誘發
外交失敗的誘導

從近代戰爭說到我國國防問題

從上表看來，可知近代戰爭的形態，規模龐大，關係複雜，幾乎每個國家的國民一切生活，無所謂平時狀態和戰時狀態的區分，每日都在做未來戰爭的準備。軍備的擴張，經濟的威壓，外交的折衝，思想的煽惑，無一不是站在維護本國利益的立場上，和勢均力敵的國家競爭，或是向勢力薄弱的國家進攻。其原因無他，二十世紀本就是國際鬥爭最劇烈的時代。更何況一部整個世界史，便大半部都是戰爭史呢！

四

近代戰爭的變革與擴大的形態，既為事實所推演的結果，而未來大戰的無法倖免，又為關心國際情勢者所公認。於是今日各列強無不在作積極的準備，一方面從事擴張軍備，他方面努力充實國防，因為近代戰爭既是大規模的國力戰，則凡所牽涉的方面，無論為物質的或精神的，如政治、經濟、教育、思想、宗教、藝術等，俱為近代國防的範圍。簡言之，近代戰爭既包括有武力戰，經濟戰，外交戰，思想戰，則近代國防亦即以武力、經濟、外交、思想為着眼點。因此，國家的整個國策，固

以國防爲中心，即國民生活的各部門，亦無不在政府統制與指導之下，以謀國防計劃的實現。茲將近代國防的趨勢，分別言之如下：

(1) 武力方面 軍備爲武力戰的主體，故每個國家的軍備，一方面最少限度須能完成國防，一方面且須能與其他國家相頡頏，前者爲消極的，視國家的國策，領土的廣狹，地理的關係，而爲自主的決定；後者爲積極的，則需順應國際情勢而變化。惟近時軍備的擴張，大體可說是已從量的競爭，改趨於質的競爭，此由於利用科學的進步，機械力的發達，與夫未來戰爭必須作大規模的持久戰，故不得不如此。是以各列強對於戰鬥技術的發展，極爲努力，大致對於軍隊的火

力裝備，新兵器裝備，機械化裝備，化學戰裝備，空中戰裝備，無不銳意講求，應有盡有。因此，各國的普通工業與軍需工業，密接融合，巽不可分，所謂平和的生產部門，亦即軍需的領域。美國現有民營工廠二萬所，受政府特約從事兵器製造并熟練其技術（參看論國一卷八期拙著最近列強軍備概觀一文），迨至總動員令一下，此等工廠立刻轉變爲軍需品的擴充機關。此可見列強在國防上武力準備的一例。

(2) 經濟方面 每個國家，在平時以一般國民經濟生活的向上爲目標，與夫國防的要
做基礎，對於公私全部產業及金融，爲適應戰時國家總動員的實施起見，不得不予以必要的
統制，但一國經濟對於國防的要求，甚爲複雜，其中以食糧供給是否豐富，與兵器彈藥材料及其
他軍需品的生產力是否充實，爲尤有關係。例如世界大戰中，德國在武力作戰方面，雖凌駕其他
各國，無如國內食糧不足，遂致暴亂紛起，民心動搖，戰意消失，終不得不出於停戰求和的一途。因
此，近代戰爭多半先以武力佔領或破壞敵國的領土與資源，否則亦應以武力隔斷敵國經濟的
外來接濟，使其喪失戰爭能力，并威脅其國民經濟生活，以至於崩潰。由此觀之，一國經濟，在平時
必須以國防爲中心，確立統制的方策；在戰時更須謀軍需品的充足與國民經濟生活的維持，然
後才不致爲敵國經濟封鎖政策所困，且可穩握戰爭的最後勝利了。

(3) 外交方面 近代戰爭，從風雲緊急的醞釀時期，一直到武力戰開始前後，其間政略，
思想，經濟，及武力戰爭行爲，必先互相錯綜爲大規模的展開，然後方舉整個國力投擲於戰爭之
中，與敵人作殊死的搏鬥。因此，與思想戰，經濟戰，武力戰有直接關連的特殊外交戰略，也是近代

國防戰爭中必不可缺少的一種手段。例如日本的大陸政策與南進政策，蘇俄的扶助世界弱小民族主張與極東赤化政策，美國的門羅主義與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英國的保持歐陸均勢與維持世界現狀等等，都無一不是爲自己利益打算，而以本國國防爲中心的外交戰略。是以存在這國際鬥爭最激烈的時代，尤其是弱小的國家，如果不確立外交政策，祇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去應付，不庸說在國防上是一個很大的缺點，即本身也是永遠任人處分而無抬頭自主的機會。

(4) 思想方面 自世界大戰以來，思想戰，與武力戰，經濟戰，外交戰漸居於同等的地位，不僅應爲近代國防戰爭中的重要部門，即在平時亦爲國家相互間生存競爭上的必要手段。因爲思想戰的效用，對內可以統制國民思想，掃除社會不安，穩定國民經濟生活；對外可以打破實行國策的障害，挫毀敵人的戰意，以及破壞敵國政治經濟的組織，如果某一國家對於思想作戰運用得法，那簡直可以不費一兵一彈，足夠亡人國家而有餘。例如日本口口聲聲所喊的「親善」與「提攜」，以及所鼓吹的「王道樂土」；蘇俄所倡導的「工人無祖國」與「援助弱小民

族」以及「實行世界革命」等等主張，骨子裏都是殺人不見血的思想戰略。一般以耳代目的人民，往往因其花言巧語而忽略了隱藏的猙獰狠辣，遂致思想中毒，病入膏肓，無可救藥。此猶如一個人的身體衰弱不要緊，若能注意鍛鍊，不難日趨強健，如果因為體弱再吸鴉片或打嗎啡，那不等到敵人動手，自己便早已走上了一條死路。所以近來言國防者，甚多注意於思想國防，其原因即在此。

從以上各點看來，可知近代國防的範圍廣汎，乃是隨着近代戰爭的擴大而來的，舉凡武力，經濟，外交，思想等作戰手段，都是依着國家的整個國防政策，而作一元的統制。上自政府，下迄人民，俱基於一定的方針，努力邁進，以求貫徹。因此，縱或將來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平素軍備的充實與國防的堅固，尚可與敵人一決雌雄，未知鹿死誰手。反之，如果一個國家在平時對於軍備與國防，均無充分的準備，依然泄泄沓沓，因循坐誤，那麼一至大戰臨頭，豈僅沒有與敵人爭勝負的資格，並且早已成爲刀下之魚與俎上之肉，任人宰割而絲毫不能動彈了！其慘酷的情況，還能以言語來形容嗎？

五

綜上所述，不過泛論近代戰爭的形態，與國防的趨勢，以及戰爭與國防相互爲用的表裏關係。因爲世界上不能永遠無戰爭，所以也就不可一日無國防；等到多數國家的國防都有了充分的準備，結果就不得不損人利己的加速戰爭的爆發。這差不多成爲一定的循環公式，古往今來，都逃不出了這例外。最後，吾人願根據此點，進一步來檢討我國國防問題。

第一：先就國防的構成要素言。考一國國防力的構成，其要素有三：（1）人的要素，如國民愛國觀念強烈，勇於爲國犧牲，政府中樞統一，舉國團結一致，總動員設施完備等是；（2）自然的要素，如國土在攻防作戰上有優良的地勢和地形，及氣候的寒暖，雨雪，瘴癘，足以妨害敵人行動等是；（3）混合的要素，如資源的豐富，武器的精良，交通的發達，技術的進步，情報的周密等是。以今日我國民氣的消沈，共匪的擾亂，政府的舉棋不定，國土的割裂離析，資源的未開發，交通的不方便，以及兵器的落後，技術的幼稚等等情形，衡諸上述國防的構成要素，恐怕任何人都

要據說，是離題尚遠吧。

第二次就國防的根本原則言，一國國防原則，在不使敵人一兵一卒侵入國境一步，故近代各國軍事專家多主張求戰場必於國境之外，英國亞爾夫來多曾說：「真正之國防，在不使敵人上陸一步」，然而我國自鴉片一役以來，對外戰爭，着着失敗，以致藩籬盡撤，門戶洞開，外人勢力，升堂入室。外兵可以駐屯境內，外艦亦可開入領海，巡弋江河，甚至外機也可在我領空，自由飛翔。最近日本大舉增兵華北，我政府熟視無睹，莫可如何！所謂不使敵人上陸一步的國防原則，按論我國今日實際情況，似尚不足以語此！

從上面兩點看來，不僅我國在現今談不到採取攻勢的國防，即連守勢的國防，也還非待舉國一致地大大努力不可。更何況未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迫在眉睫，我國周圍情勢的危險，愈覺岌岌不可終日，如果還不在國防上作全國的準備，豈但如目前偏安之局不可保，恐怕大家都「是死無葬身之地了」！所以我想除開根本不要國家的赤色漢奸——共產黨而外，任何人眼看這破碎的山河，垂亡的祖國，總得要抱着「明知其不可為而為」的信念，來作一番周密的打算吧！

最近陳西澧先生在他的海軍與空軍（載國聞周報十八期）一文裏說「現代戰爭交戰團體的是三種力量：那一方面的人力，財力，及軍火力比另一方面大，那一方面便可以操勝算。」的確，我國國防最低限度在兵力，戰費，武器三方面，先要做到能夠自衛的地步，然後方足以與敵人馳騁於「近代戰爭」的疆場之上，在前面我曾指出歐戰中動員人數，戰費損耗，兵器供給的數字，却很可以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參考。雖然未來大戰，我國未必是處於主動的地位，但我國境內終必成爲他人的戰場，遲早總是要牽入戰爭的漩渦，那是無庸諱言的。因此，關於兵力，戰費，武器三者，怎樣方可以鞏固我國國防，希望國內軍事專家，本多年內戰的經驗，早爲通盤計劃才好。然而祇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做到兵精，餉足，器銳，尙不夠，因爲這不過是初步的治標工作，還得要時時刻刻地在國防上做治本的工夫，是以便須更進一步注意下列兩點：

（1）培養國家觀念 近年來國內所倡導以世界大同爲最後鵠的思想運動，因爲佔有政治上優越地位的緣故，同時又基於某種的排他觀念，遂不惜指鹿爲馬地將國內信仰愛國主義的人，誣爲「狹隘的」，「落伍的」，「反動的」種種稱號。於是一向對於事物名詞含義弄

不清楚的國人，終被挾有特殊勢力的宣傳政策而迷惑其判斷力。因此，國家觀念，在一般人看來，轉不若黨派觀念，飯碗觀念來得重要。及至九一八事變發生，遼吉黑熱相繼淪亡，如今冀察平津危在旦夕，我全國人民，才認識了國家地位的危險，才證實了追求世界大同是夢想。才明白了愛國主義，不是狹隘，不是落伍，更不是反動，而是內憂外患層層環攻中，每個國民所必具的共同信念。所以今後我國人不但要打破黨派的私見，一切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前提；並且對因外力壓迫而拍頭的國家觀念，須努力培養擴大，不能再事摧殘，免得國尚未亡，已經為強敵造成若干的順民。如果我國早在教育上對人民灌輸國家思想，培養國家觀念的話，又何至於今日有這麼多的漢奸！

(2) 樹立根本國策 我國不用說對內沒有整個方針，對外更無所謂根本國策，一切都是事到臨頭，才去設法應付，從來沒有做過未雨綢繆的打算，以致舉國上下，相習成風，俱養成一種苟安懶惰的心理，當濟陽事變發生，一班人以爲不過像民十七濟南五三慘案一樣，遲早日人會退兵的，可是日人蓄念已久，却不像我們打這如意算盤，於是我方節節後退，日人步步緊追，一

直把我們趕進長城以內，還是不肯放鬆，所謂「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外交方針，倒成了人家「一面提攜，一面佔領」的絕好註腳；所謂「以夷制夷」政策，還沒有運用，人家的「以華制華」的策略，反收了大大的功效，像這樣的忍辱求和，人家依然認爲是毫無誠意，那麼，除非甘願束手待縛，靜候亡國，最後怕終不免於一戰了！因爲我們確切認定目前的中日形勢，無論我國如何企望和平，決無共存共榮的可能。及其他日迫不得已，忽促應戰，無寧在國防上，軍事上早作準備，決心一戰。所以我們的根本國策無他，只有戰！戰！戰！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如果國民沒有強烈的國家觀念，則國防上雖做到堅甲利兵，仍是等於虛設；如果政府沒有樹立根本國策，則侈言國防上的一切佈置，都無異乎空談，所以我們在努力準備物質的國防以外，還得建築一道精神的國防，二者相依爲用，相輔而行。然後才可以永遠維護我國家的獨立與民族的生存。末了，我再借用秉志先生關於國防之三點（載天津大公報五月十七日星期論文）一文裏的話，來做本文的結語。他說：

「吾國人最大之惡習，足以使國亡種奴而有餘者，卽自視過於高明，對於正當議論，視

爲老生常談，鄙夷而不屑注意，此乃衰落民族之特徵，原不足怪……然國內不乏有心人，人之愛國，誰不如我。倘肯於國防一切急務，凡百設施之中，留意及此，以爲基本要圖，虛心採用，乘機而力行之，安南高麗之後塵，吾其可以避免乎？歧子望之！

國防與外交

謝承平

在短短的篇幅來討論這個大問題，國防與外交，特別是從近代的科學的立場上着眼，真是太困難的嘗試了。無怪最近有某君編了一本所謂「國防與外交」，該書內容只是國際公法和中外外交史的澆合而已。原來國人對於國防二字的認識極其模糊，外交二字的意義也有傳統的錯誤，因而國防與外交之間更難有生動的運用。所以本文勢必要涉及下列廣泛而重大的節目，或者對於讀者能有些許的貢獻。

一 從家天下到近代國防

「貴爲天子，富有四海，」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這些是中國自古至

近代的「家天下」的觀念，也就是中華版圖「無遠弗屆」的表徵。惟其如此，中國的國界邊疆簡直沒有明確的範圍，一直到了清朝末葉，雖然劃定了國界，樹立了界碑，可是邊疆的界限還沒有弄得十分明白；及至民國初元，蒙藏又成了問題，所以今日不特英、由緬甸、由安南而任意侵佔我國土，乃至滿洲偽國成立之後，與偽「外蒙共和國」的疆界糾紛，竟成了日俄兩國的交涉。無怪乎前清某駐外使臣竟中外人之計，胡亂把外國所製的中國地圖抄襲下來，輕描淡寫地把國土劃歸了外國！正因為中國的版圖遼闊，更無怪乎前清有名的外交家竟稱台灣土著為「化外之民」，而視香港為「臺爾荒島」，棄之如敝屣，國土如此之不值重視，那還說什麼國防？

再則，春秋戰國時代所謂「國」者，不過是天子治下的部族，所以儒家不僅要「治國」，還要「平天下」為終極。秦朝大一統以後，自漢朝至清代所有的版圖的擴張，只不過是文化的征服。「中華」只要威震「四海」，「四夷」只須稱臣進貢，所謂帝國的光榮僅是皇朝的誇耀，中央與邊疆的關係止於「天國」臣服諸「番邦」而已。既少領土野心，又乏政治的經營，更說不上經濟的侵略。我中華幾千年來的武功偉業，從未走上近代的帝國主義之對殖民地為途徑。

依照美國史家海斯國族主義發展史上的區分，中華國族的發展是文化的國家主義，而非政治的或經濟的國家主義，我們文化的歷史的關係維繫了同化了各民族的「兄弟」之情，雖在今日，臺灣回諸部對於中央始終是向心力大於離心力，然而這種文化的關係究竟經不起歐洲和日本武力的進逼。

至於海外的發展，在鎖國時代認為犯罪的行爲。我們祖先，特別是在明清之季，也曾在南洋、美洲各地有過偉大的殖民事業，但在政府方面視為逋逃的勾當，不特不加以獎勵而予以嚴禁，甚至自海外勝利歸來的僑胞功臣只換得朝廷王法的刑罰！直到如今，飄流異土的同胞，縱然握有經濟的實力，不過供他人的驅使，受政治的壓迫；中央政府和革命志士雖受過他們極大的援助，然而對僑胞依然聽其自生自滅，更談不到海外殖民政策。本土的國防既是渺茫，海外的國防生命線當然無暇顧及了。

可是近百年來，列強的砲艦打進了我們的國門，驚醒了「天國」的迷夢，使中華人士認識了所謂「天下」不是登泰山而可小視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悲劇重演不已，於是憂國大夫

纔有了堅甲利兵的建設，朝廷纔有了些許「國防」的認識。區區物質的防禦，既缺乏科學的組織力，又短少愛國的鬥爭心，那能敵住強權的國族生存鬥爭。一切新的設備，徒有虛表，只給貪官污吏中飽的機會；一切外侮的襲擊，只有應以「各保一方」而予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機會；大難臨頭，陸軍望風而逃，士兵死於背後穿入的槍彈，海軍自相撞破，全軍覆沒。於此可見只有堅甲利兵是無補於國防的。「九一八」以後，東北四省的淪亡換得國人的警覺；「一二八」的血戰爭回國族生存的自信心。然而麻木已久的神經中樞，散漫成性的全盤社會，雖受一二強烈的刺激，還不過發生暫時的反應；證諸共匪竄擾和目前的西南問題，更是瞭然。推究這種失敗的近因，專制餘孽袁世凱還是以「家天下」的企圖而自禍禍國，竟承認日本的二十一條要求，把國防上的命脈付諸敵人之手。他這種「安內而後攘外」的遺毒至今未息，對外借款和軍火購入，假國防為名，而實現個人武力統一的迷夢，以致對外屈服，而對內壓迫，造成了國防與外交上無限的恥辱！目前「一致對外」、「國防建設」的呼聲叫得很高，實質上的進展離題甚遠，國民精神和國家觀念——精神的國防——更形脆弱。血族和部落的落伍的社會形態還活躍於各級的歌

治機構之中，民族社會的階段似乎還是某部份人的理想目標，至於社會進化最高層的現階段——國族社會，即近代國家的組織，距離我們中華民族的生活真不止一萬八千里！照這樣落伍的社會組織和政治機構，要想從中建設「近代的國防」，這談何容易；要想從中取得勝利的外交，自然絕望。

從此我們知道，近代國防是國族社會階段中的產物；國族集團意識或愛國情操和國族社會組織或近代國家是國防上形體和精神的基礎，而國防也是愛國情操和國家組織的實力支持者。再則，近代國家生活中兩大特色是科學和民治，而近代國防上兩大生動的要素也是科學和民治。離開了科學，我們就得不着近代的武器，交通工具以及由此而生的全國總動員的活動；離開了民治，我們就得不着效忠祖國，為同胞而犧牲的勇士以及由此而生的全民總動員的鬥爭。所以近代的國防，固然不是為着「家天下」的「獨夫」，不是為着王朝與王朝之爭，也不是為着窮兵黷武，而是為着整個國族的生存，為着偉大民族的歷史的光榮，當前的生存，以及將來新文化的開展的。在國族生存鬥爭的大時代裏，我們爲了中華民族的過去，現在和將來，這個文

化高超的國族底永久生命底維護，我們要有近代的中國國防！全中國的人民總動員，把我們所有的軍力，財力，心力，生命的一切來維護國族的生存；以中華民族的血花鼓舞中華的國魂——「大華魂」——「大華魂」維護着我們的獨立與自由，完成近代的國防，創造近代的國家，而且永遠照耀於世界，象徵大中華文化的火焰。

二 由「縱橫捭闔」而近代外交

關於國防的重新認識似乎說多了一點，其實是必要的。為瞭解「國防與外交」的真切關係，必先明白近代國防的新意義，然後纔能講到近代的外交，纔能談到以國防為中心的外交政策。如前所述，國防為的是維護國族的永久生存，而外交原是國防上一種活動和組織，外交自必以國族生存和發展為其使命，以國防健全為其中心，可是這樣的認識是最近的常識，在過去的外交史上，尤其是在我們中國的外交活動上，却並不如此。

春秋戰國時代有諸侯爭霸，「聯盟」以及「合縱連橫」的種種活動，其中活動分子都是

策士說客。這些人物，嚴格說來，不算是外交家，因為這些所謂國不是獨立的國家，而是一國中的半獨立的部族而已；「國際」社會的形態既不成立，「外交」運用自然也是飄渺，諸侯國君的使臣只不過做些「縱橫捭闔」的勾當。他們「掉三寸不爛之舌」的工夫，既無一定的政策，又無爲國犧牲的必要，純靠一己的聰明，臨時應付；說得投機，立即勝利；說得不投機，甚至結果性命。此等人物之中，最優秀的能「挂六國相印」，最狡猾的也能背叛國主而投降異國，換得一官半職。可以說他們的「外交」活動大抵是以個人爲中心的，或是以家族主義爲中心的；換言之，他們是爲了君主或自身個人的利益，或是爲了王室或自身門庭的光大。

秦漢以降，大帝國的權威樹立起來了，「國際」的往來依然沒有匈奴、回紇僅爲犯邊的夷寇，雖則有時屈辱了公主前去和親，還是懷柔遠人之計，根本不把這些夷狄當作外交的對手。天國的四鄰固然不成其爲鄰國，即對海外的日本還是視同子國，豐臣秀吉問鼎中華的雄圖，只換得王號的封贈。對涉西洋各國的地位也不看眼裏，天主教徒帶來文化侵略和帝國主義先鋒的使命竟也變成了供職京師，侍奉皇帝而已。一直到了鴉片之戰以前，外國使臣來華，朝見皇帝

國屬萬難，運要拜晤地方長官，甚至亦有所不能，幾千年來從未承認有一個外國能與中華天國平等，當然就沒有國際上相互平等的外交；外國的使臣視同稱臣納貢的走卒，中華的欽差一概是宣揚國威，安撫四夷的驕子。

即在海禁大開之後，雖有郭嵩燾、閔容之輩瞭解世界大勢，主張在各國設置常駐使節，免不了受頑固派的侮辱和排斥，等到屢經英法日列強的侵略，國勢危殆，纔承認了中華之外尚有所謂國家的存在，纔信託李鴻章去向外國「求和」，與外國開對等的外交會議。不幸得很，幾千年來中國唯我獨尊的自信心，被列強的砲火打得粉碎，反而一變而為對外國唯命是從的自卑心，以致近百年來的外交多是被動的屈服的，李鴻章最得意的一着就是「以夷制夷」，仔細攷察起來，這還不脫「合衆連橫」，「縱橫捭闔」的舊習；因為所謂「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不特未能制夷，反為夷所制，本國既無確定的外交方針，遇到臨時事件則向甲乙等國求援來壓制某國，同時為酬報第三者的援助反另外予以相當的領土或經濟的利益。請看三國干涉日本交還遼東半島的故事，不是充分說明所謂以夷制夷的失策嗎？本國既無自主的外交政策，一味仰仗

他國求一時的和解，貽無窮的後患；而所謂諸夷，各自懷着遠東侵略的企圖，或單獨進攻，或聯合分調，我國向其乞憐，正中其陰謀。研究近時中國外交史的人都知道要瞭解中國外交的失敗，不能僅求之於滿清或民國的政治腐敗，而須先解剖日本及歐美列強的遠東政策和國際關係。所以如此者，無非因為中國的外交依然是策士遊說，仰人鼻息，自以爲「橫縱捭闔」，「以夷制夷」，實則是被動的而非自主的，是臨時應付而無方針，是受制於夷，甚至於中了「以華制華」的毒計。截至今日爲止，我們中國的外交政策在那裏？寤寐求之，求之不得！有之，則爲時而親日，時而親俄，時而親英美；只見本國外交人物的傾軋混亂，依靠外力，甘作傀儡而已。嗚呼，如此外交，焉得不喪權辱國！

現在我們既要建設近代國防，在國防陣線上決不能再讓屈辱的外交存在。我們要建立近代外交，近代外交的大前提就是要「以國家利益爲前提」，爲維護國族的生存與發展，依照全盤的國策，認國際的關係，從列強以及弱小民族間的利害紛爭中，作有組織的自主的外交活動，爭取本國底領土完整和安全保障。

三 領土完整與安全保障

領土完整與安全保障是國族生存上必要的條件，也就是外交上中心的工作，領土，人民，主權是國家構成的要素，缺一不可；但依我看來，領土的完整尤其重要。有錢的猶太人，偏安的小朝廷，同樣地實質上喪失了他們的祖國；祖國（Fatherland）原是「父土」，母邦，或故鄉，離開了領土，任何民族的生存都是流離失所的可憐虫。這種粗淺的認識似乎是不必多說。然而在今日危急的中國，竟有人主張，那怕退到喜馬拉亞山也能復興民族，對於這種荒謬的論調是不能不痛加糾正的。自從東北淪亡之後，所謂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反帝國主義」的蘇俄，出賣了中東鐵路，南京雖然提出抗議，日俄兩國一樣地置之不理。俄國人還對我國外交人員說：「鐵路不過是地上的龍，如果貴國收復了東北，那中東路是不成問題地物歸原主了！」對於這樣的諷刺我們應該反省！

在領土完整的必要條件之下，對於冀東，察北在敵人支配中的狀態，我們決不能坐視，不特

外交上不許絲毫讓步，尤應立即出兵，消滅漢奸的組織，對於遠吉黑熱四省的失地，雖然明載於「三民主義共和國」的憲草條文上，明定爲中華民國的領土，但是要使條文成爲事實，必須以鐵血外交爲後盾。倘「外蒙人民共和國」半獨立的西藏政府，他們的存在是中華領土完整上絕對不能容忍的。台灣、琉球都是百分之一的中國領土，而且是國防上海洋的第一道生命線，怎能讓他們死在敵人的手裏，反而成爲暴鄰深入我腹地的根據地？至於租借地和租界的取消，更是當然的事。

領土完整的工作，現有領土的保障，已失領土的收復，全都要靠我們「自力更生」。想起華盛頓會議中九國公約「共同保障」我們的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真是絕大的侮辱。在深恐瓜分 and 獨佔的自卑心理上，在被動依賴的外交上，自招侮辱乃勢所必至，最可痛心的，還有人以爲這是勝利的外交。求得一時的安定，了結當衝者一時的公事，是我國外交上傳統的致命傷。

守土保疆，收復失地，已經是極艱巨的工作；然而要切實維護民族的生存與發展，這種帶消極性的積極工作還是不夠的；進一步要求安全的保障。安全二字的意義所見至廣，據法國外交

家康朋·朱律 (Jules Cambon) 在他「法國的外交政策」一文最後一段說：

安全！這個名詞的意義，誠然遠過於一國人民本土的維護，甚至於遠過於他們海外領土的維護。它的意義也指着世界對於他們尊敬的維護，他們經濟利益的維護，總之，包括一切，這一切形式國家的偉大，國家的生命。但是一切人民沒有同一的理想，各依其本國的傳統而認定什麼是該國的利益。

照這個普遍的外交原則說來，我們須依照中華的傳統而決定維護中國的生命上必備的安全保障。爲了中華國族前途的安全，除爭取領土的完整之外，我們的安全線，生命線，國防線必須以安定遠東局勢，維持世界和平，從而保障中華國族的安全；最低限度要使其生存不像今日之受他國的威脅，使其發展不像今日之受列強的阻礙，使其所負的文化使命不致無從發揚，反而禍及世界，尤其是亞洲諸小民族同居於奴隸的苦境，要知道我中華民族有四萬萬之衆，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數量，而中華文化所同化的民族將近兩萬萬人口，朝鮮，安南，緬甸，尼泊爾，南洋羣島固不待言，即強鄰日本也是中國文化的產兒。中華國族的安全如得保障，不特是本土

同胞之福，海外同胞之幸，同時也是亞洲諸民族之幸運。世界和平文化的福音。

如何實現安全的防線？第一要完成領土完整的中華民國。力足以抵抗暴鄰的威脅，而免我神明裔胄再淪落於橫暴強權的魔手之中，呻吟於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第二步要使我「兄弟之邦」同登樂土，擺脫侵略者的羈絆，取得獨立自由的國族地位。看到近年菲律賓、埃及、印度，乃至最近敘利亞的勝利。這個希望不是沒有根據的。第三步要使南洋羣島的中華民族不再把在熱帶苦幹的血汗成爲異族剝削的脂膏，且須依照民族自決的國際正義從奴隸的生活裏解放出來。近來英法海外殖民的勢力漸趨衰微，而某國的「南進政策」猛進，爲太平洋的安全，爲我中華民族的命運，這一步我們必須踏進，方不致失去我們的海洋生命線。

國人看到上述的國防安全線的擴大，或者要說我們又犯了妄自尊大的舊病。殊不知我中華國族不求復興，不求卓立於國族社會而維持世界和平則已，如欲自立立人，則必走向這條大路，把握民族自信心，發揚國族鬥爭力，貫徹文化使命，是國防與外交上第一基礎。今日是我中國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我們死亡，則整個的亞洲諸民族同淪於奴隸地獄，而永爲世界不安的火

藥庫；我們生存，則整個的亞洲諸民族同登自主的天堂。如果不信我說，請看暹羅，在英法夾攻中奮鬥過來，總算是卓然自立的亞洲民族，可是近受某國的誘惑，竟轉而壓迫自己同胞——暹羅的人口，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中華民族，而他們的皇室也是中國子孫——將來難保不跟着世界的禍首而捲入不幸的自殺之境。即此一端，足以充分證明中華民族的存在，復興，發展，不僅爲了本國的福利，實即爲了人類的前途。並且，如果忘卻了我中華傳統的偉大的文化使命，只是留着強暴的四萬萬與人爭食，與人鬥死，那是沒有意義的。因一時強權的威脅而失却了民族自信力的人們！請認清我中華的文化使命，爭取領土的完整與安全的保障！

四 外交活動與外交人物

要實現爲維護民族的生存與發展的外交，有賴於以國防爲中心的外交組織和活動，以及從事於此等組織和活動的外交人物。讓我們先略爲檢討過去的情況。外交部是外交的中樞組織，不說它內部分工不甚精密，專司人員難以勝任，根本外交政策無所取決，只是隨時應付；遇到

急緊外交，更是手慌脚忙。例如近年日本中下級武官可以任意與部長晤談，而外交部司長可以到某國大使館向其科長秘書之流請教。跟着「今日之事我爲政」的個人中心的政治習慣，每換一部長就換一套大政方針，前後可以矛盾；跟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個人中心的官僚系統，每換一部長就換一大批新的官員，至於駐外的使領，雖然比較不像國內宦海升沉之甚，但是年來老成告退，新進茫然，也不是好現象。使館雖不像部里那樣簽到畫押，例行公事，可是也有不少的公使大使，或則失意出洋，或則遊山逛水，或則吟詩論文，或則專辦軍火，或則一無所事。還有鬧笑話的，把比利時的總理大臣認錯者向不相干的人亂說了一番談話。各地領事，也很少爲僑胞效勞，有的以主婚爲能事，進而取得些許酬勞，有的販賣鴉片，見辱於友邦。如此外交人物，還說什麼爲國防線上奮鬥。焉得不有辱國體？

爲挽救已往的失敗，我們重新振作，健全外交的組織，擴大外交的活動，培植外交的人才，實有必要。先從人才培植說起。以往外交人物，除國內和駐外的外交要人的親戚故舊之外，爲事務上的必要，多用些熟識「洋務」的人員，他們大抵是留學生出身。這些留學生自幼未嘗受過深

切的國家教育，未嘗多遊覽祖國的各地，對於本邦的文化不甚瞭解，一旦投身異國，被他人的物質進步和軍力武勢所震懾，因而對於留學所在國不禁發生盲目崇拜的心理。在國內有留學派別之爭，有親日親美之別；在國外服務以外語流利爲唯一本領，以尊敬外人爲外交能事。有鑒於此，培養人才須先糾正錯誤的留學政策。代替之道最好設一「外交大學」。凡大學畢業生經文官考試及格而願從事外交活動者，不必立即分發任用，而先入外交大學初級訓練班，由學識經驗豐富的教官予以實際外交的訓練，教以外交國策的根本大意，受訓期限只須一兩年。經此訓練階段，然後出國做見習官。這樣的留學外交官員纔能有一副自主外交的眼光，纔能有一以本國利益爲前提，「以發揚中華文化爲使命」的思想去在異國的活動中取得寶貴的經驗和勵進的磨練。在外國服務至相當時間，調回祖國，重受祖國的陶冶，或調部任用，用其所長；或入外交大學高級班，作進一步的外交學習，爲斯也不過一二年。這些是爲新進外交人員設想的。對於老成的外交家最好網羅在「外交參謀部」。他們的責任異常重大，決不是爲安置失意外交人員的，外交參謀部的人才不僅是後進者的領導，而且是外交國策的檢討者。根據多年的經驗，體

察國際的新形勢，他們得向中央政府作有力的建議，得爲外交部長有力的顧問。這比立法院的外交委員會，或外交部的外交討論委員會來得切實多了。

其次說擴大外交活動。以往的外交既是被動的而非自主的，所以外交活動只不過爲洋大人供奔走。今日我們要建立積極自主的外交活動，並且擴大活動的範圍。當前急需推進的活動是：（一）廣置情報網——像現在外交部的情報司只在駐華各使館去「打聽消息」，或憑駐外使館簡略的報告，甚或參看外國操縱的新聞社電報，那是極靠不住的。我們要「不惜巨資，廣設情報網，刺探最早而最直接的密秘消息，而非傳聞的官話。不僅向各國軍政要人處用功夫，還要多用間諜耳目深入民間地幹去。」（二）文化事業——我們所以要立國於天地之間爲的是負有中華文化的使命。以往外國對於中國的認識大抵錯誤，咎仍在我，因爲我們未嘗努力於文化的宣揚和交換。今後要努力向世界解說我國歷史的光榮和現在的鬥爭，使外國瞭解而生同情，減少國交上的障礙，而增進世界的和平與文化的進展。這種工作對於亞洲和南洋諸民族，與我們有特殊的歷史和地理關係的「兄弟之邦」尤爲急切，因爲他們在文化上素來離不開我們。

的互助，當茲在掙扎民族自決之中，尤渴望中華的狂進，給予莫大的鼓勵。除了交換大學教授，組織海外參觀團而外，還有資助僑胞創辦報紙，通訊社，資助他們到所在地調查生活習尚，優待並歡迎外賓到中國來遊覽考察。（三）移民通商——我國僑民飄流海外，自生自滅，非人生活，同時對外貿易，多半操之於洋行之手，而本國商人未能直接對外經營。這種工作本該是駐外領事的主要工作，無奈這些外交官僚，同在國內做官一樣，只知剝削同胞，而不知增進僑商的幸福。除新進外交人才急需加以經濟的移民的外交活動而外，凡有志經營海外的國人，外交部都須先施以移民通商的訓練。外國語文的學習，外國史地的常識，日常生活習慣，經濟的詳況，都是必備的智識；各人依他目的地的不同而作專注的留意。如此經過有活動的中心，有組織的奮鬥，不特為僑胞取得經濟的大利，政治的團結，尤能予外交上莫大的助力。要外交勝利，不特本土人民全體動員，海外同胞亦須總動員，否則專憑三五外交人員，又無砲艦掩護。只有永為異族的奴隸。這種工作，對於向南洋，日本，美洲，發展的活動分子，尤為重要。（四）邊防外交——今日我國四面受敵，邊疆危在旦夕，所以外交上的特別用心是不可忽視的。注意邊疆與國防的作者——

宋達波先生他曾提及邊疆大吏須明白世界大勢，善用外交手腕。這在邊疆的大吏守土防敵，是必備的條件。從目前特殊國防情形設想，駐在邊疆的外交特派員的活動，尤其關係重大。我以爲在邊疆主持內政的須深悉土著生活，而應付外交的須深悉鄰國和野心國家的企圖。邊防外交的活動絕非內地外交特派員的例行公事可比，邊地的外交專員須是精通該地實況的能員，須是熟悉或久辦關係強權的外交家；而他活動的經費和活動的深入都要外交部予以特殊的重視。這種特殊的活動似乎有點越出一般的範圍，但是我們要明白，今日邊疆隨時有變成外國領土或傀儡組織的可能，在外交活動上該如何注重啊！

再次說健全外交組織——一般的外交組織我國算是粗具規模，但須力求其作工的緊張和實質的充實。不過我此刻所談的一層，僅就上述急切的活動，而加以組織。(一)外交大學的設立。(二)外交參謀部的設立。此種組織，在外國也未創設。最近英美外交學者頗提倡此說。他們不贊成各國外交部長、首相，乃至元首等政治家，卽制定外交國策者而身當其衝，來做外交政策的折衝者，他們主張像各國陸海軍的參謀部、軍令部、陸海軍大學一樣設立上述組織。爲培植

中國的新人才，爲免老成者投閒置散，被門戶之見所排斥。我認爲更有設置的必要。(三)文化宣揚部。(四)移民通商局。

要之，新的外交活動和外交人物，須「以國家利益爲前提」，以國防戰線爲中心，而痛改以個人或家族爲中心的錯誤。在外交活動上有時突顯某一事件是特殊的外交人物所轉變，其實這不是外交的常軌。常軌的外交是有傳統的外交政策作主的。正如法治主義所說的，正真的法治是不要人在法外作惡，也不要人在法外爲善；引用在外交上，也可以說真正的外交家，不能在外交政策之內賣國，也不能在外交政策之外爲國求榮。由此可見依據國家傳統而形成的外交政策是國防與外交上的關鍵。

至於新中國的外交政策該是如何？再具體說來，在其他國防，尤其是軍備方面，未充實之前，如何打破「弱國無外交」的惰性，而以外交運用取得國際上「平等的」地位和「安全的」保障呢？這個艱巨而切要的問題，有待於另篇的討論；本文暫止於國防與外交上一般原則的推究而已。

國防與財政

張希為

一 國防的解釋

國防二字從字義上解釋是國家的一種防衛行動。平時維持國家的安寧秩序，保護國家人民的利益，一旦遇外敵的武力干涉，暴行，侵略，則奮起以實力相抗。這是最簡單的解釋。但國防的內容及組織形態却隨時代而不同。

在君主專政的時代，國家是君主的，連人民也是君主的，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國庫更是君主的私有財產，不是屬於國民的。這個時候的國防，其意義自然是在於防衛君主的私有財產以免外來的侵略。時代變遷之後，由君主專政而變為民主政治，於是國防的意義亦隨之而變更，由防衛君主的私有財產的國防而變為防衛國民的自由，權利，排除他

國的蹂躪壓迫的國防。而國防的組織形態亦發生變化。

在部落時代，凡是部落中的人們都是防衛的戰士，如韃靼人及阿拉伯人連婦女都上戰場。他們爲防衛其他部落的侵略，或向其他部落報仇，是全部落去作戰的。但是在封建政治國家時代，此種情形已不復見，而代之以專門從事於國防的傭兵組織。後來則又有常備的傭兵，至近代則變爲徵兵制度的常備軍。軍隊的數量，武器，兵種，戰法亦因時代而不同。古代埃及及王發拉奧（Pharaoh）侵略亞細亞的軍隊，不足二萬人，然而到一八二八年，歐洲的軍隊達二百二十六萬五千人，一八九八年爲三百五十六萬二千人，至世界大戰開始當時協約國和同盟國的常備軍隊共達四百零六萬三千人。軍隊所用的武器，軍需品也有極大的變化，十四世紀以前軍隊所用的武器僅爲刀，劍，戈，矛，卽有少數的機械兵器，也不過是弓矢石礮之類。自火藥發明之後，於是有了槍，砲。近代兵器的進步，則更一日千里，不但新銳，而且繁多。因此軍隊的組織，也由多數的兵種構成。海軍的武器則由木造而變成鋼鐵製造。排水量也隨時代而增大。一五八八年西班牙的無敵艦隊一百三十艘，噸數共計五萬七千八百六十噸，但是到歐洲大戰的時候，海中怪物潛水艦出

現了。現在英國的戰艦福德號一艘就有四萬二千多噸。戰法也隨武器的進步而不同。古代希臘及羅馬有一種獨特的戰法，就是所謂密集形的戰法，軍團戰法，因其擅長的武器是長槍。其後又有所謂拿破崙戰法，有大馬爾特凱 (Graf. Von Moltke) 戰法，歐戰時則有興登堡戰法，魯登道夫戰法及福煦戰法。歐戰以後，則有以國家總動員為基礎家總動員為基的戰法。這就是以國家所有一切的財物和人力為基礎的戰法，這不是以軍隊與軍隊作戰的速戰速決主義的戰法，而是國民對國民的持久的戰法。於是國防的內容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所謂國防，不僅限於軍備，而是一國國力的綜合。舉凡國民的精神，體力，國家的資源財富，國家的政治經濟組織，都可說是國防中的一種要素。這便是所謂現代的國防。

二 現代國防的特質

現代國防既隨時代的嬗變而大大不同，因此，有下列的幾個特點：

1. 兵力的增大與動員的迅速。歐洲大戰中動員人數之衆，實為當初所未嘗夢想到的，根

據這次大戰的經驗，預料未來的戰爭，其動員人數之衆將較第一次大戰時爲尤多，因爲世界史上所未曾見的戰爭方法，既層出不窮，而技術與化學的發達又登峯造極，戰爭的範圍更由平面而變爲立體，既有陸上戰與地下戰，又有海上戰與海中戰，復有空中戰，則動員之增加是可以預料的。而其動員又非迅速不可。歐戰時動員的迅速已足驚人。法國僅於五日之內由四十四師團增加動員至一百十三師團，德國於一月間由五十師團增至一百十二師團。俄國於四十日間由十八師團增加至一百十三師團。但未來戰爭，動員展開之日期非更縮短不可。因爲空軍已經非常發達，有強大空軍的國家，可於開戰的第一日，載炸彈、毒氣、破壞敵人的首都、交通、運輸，使敵人不能動員，或陷於混亂，而先制敵人之死命。所以大兵力的迅速動員爲現代國防特點之一。

2. 產業的國防化 現代國防所需要的軍器和軍需品，固有政府的兵工廠爲之製造補充，同時且爲大量的準備貯藏，其中尤以兵器、藥彈、燃料，更爲大量的貯藏，因爲大兵力的急速動員，必需迅速補給大量的軍器及軍需品。而初期作戰對於作戰的全局關係頗爲重大。此種軍用品又非急遽所能徵集的。所以必須預先準備，但是因軍器及軍用品進步的迅速，大量的準備動輒

有變成陳舊品之憾。並且有各種軍器不能大量準備，甚至大量貯藏的，例如毒瓦斯及危險爆發物等。更從軍器及軍需品消耗量的增大言之，費盡辛苦所貯藏的大量軍器及軍需品，一開戰就化為烏有了。這是各國在歐洲大戰中所得來的貴重的經驗。欲以政府所有的兵工廠供給戰時所需要的莫大的軍器及軍需品，則爲事實上所不可能。美國前陸軍部長台維斯氏嘗言：「美國砲兵工廠的全部製造能力，不足供給戰時需要量百分之一。所以欲以軍器及軍用品的貯藏，和政府所有兵工廠的製造能力，充戰時需要之用，這在國防上不能稱爲完備。所以民間產業的國防化，實爲絕對必要。就是在平時將一切大工廠都使之具有變爲兵工廠的可能。或者稱之曰產業總動員。如何能使民間工業國防化？這非本文討論範圍所及。不過我們要注意，這也是現代國防特點之一。」

3. 持久戰的準備 當歐戰將發生的時候，列強各國的國防作戰方針，是採取速戰即決主義的。就是以迅速的動員於最短的時間內，集中優於敵國的兵力於國境或其他重要的地點，於最初的一戰，或二三次的大戰中，將戰備未完整的敵軍引出擊潰。但是這種作戰方針在歐戰中

完全失敗了。德軍的進展，雖如狂風掃落葉，但在三個月之後，却受了頑強的抵禦，變成了未曾有的塹壕戰。於是由速戰即決的作戰法變而為持久戰，舉凡作戰的準備俱有重行檢討的必要。塹壕戰的戰線是非常擴大的。因此不但兵力增大，而且必需有適應塹壕戰的兵種。所以軍隊不得不以兵種為中心而重行編制。例如法國步兵最初的比率為百分之七一·八，至一九一八年十月則減為百分之五〇·四，同時騎兵也由百分之四·八減為百分之四。反之，砲兵則由百分之一八·二增加至百分之三五·七。工兵則由百分之四·九增至百分之九。空軍由百分之〇·四增至百分之四。即軍隊兵種的重點由步騎兵移轉至適宜於塹壕戰的砲工兵及空軍。特種兵增加了，因此特種兵所需要的軍器如重砲，榴彈砲，飛機也增加了。在塹壕戰中，攻擊前進是極其困難的，因此機械化的軍器也普及了，坦克車便是最好的例子。戰線既擴大，於是軍隊給養的運輸不能不以運貨汽車以代馬匹。其他無綫電及通信機等也隨戰線的擴大而廣被使用。種種軍需品也隨之產生，如防毒面具，及適用於塹壕生活的被服等。兵力既經增大，軍隊又重新編制，新軍器及新軍需品又絡繹產生，於是軍部的戰術戰略也不能不重新樹立。因此有所謂疲敵戰法的

產生，就是利用地形，構築極堅固的陣地，吸收敵人的兵力，使敵人消耗藥彈，久之軍器及軍需品告竭，最後不能不因缺乏戰意而降服。但是在這種持久戰之下，國內的情形也必隨之發生變化。歐戰發生後數月，各國因大動員之故，多數的工人被徵入伍了，對於戰事不很重要的產業，疲敝衰落了。失業者增加了。同時因世界經濟關係斷絕，原料的輸入杜絕，銷路受阻，產業更陷入於恐慌的狀態中。金融界也呈混亂的狀態，信用制度也破壞了，停止支付令也頒佈了。這個時候，戰場上的戰事不但不曾停止，而且兵力，軍器，軍需品的要求，更迫切而且增大。國家財政更窮乏了，各國政府不得不求適應持久戰而改組軍隊。為適應戰事計，將全部國民經濟加以改革。如軍需品所必需的原料及工廠的統制，國民糧食的統制，價格的調節，交通貿易的統制，國民勞力的統制，財政，金融的改變統制。這就是所謂國家總動員。國家的一切人力，物資，都為獲得戰爭勝利之故，置之國家統制指導之下。這是現代國防的一個重要特色。而尤為我國談國防的人所不能忽略的一點。因為從作戰的目的說，我國不是一個好戰的國家，想征服他國，侵略他國，而是因為不堪壓迫不甘滅亡，才起來抵抗的一種自衛行動。我們作戰的目的在保全領土主權的完整，和國

家的自由與獨立。所以我們的戰略側重於防守。更從兵力上說：我們的空軍，海軍都不如敵人遠甚，根本上談不到制空權和制海權，沿海一帶到處有被敵艦襲擊的可能，而敵人航空母艦所載來的飛機也有往返轟炸的可能。所以我們的戰略也只有採用持久戰的戰法。馮玉祥氏在其所著中國與二次大戰一書中說：

「中國海軍及空軍兵力與敵相差甚遠，僅陸軍人數尙堪與敵相比，且大半不要動員手續即能開始集中。所以主力作戰一定要在陸地正面。但是我軍新式兵器不如敵人，並且不易保持制空權，所以實行戰略上的積極行動，比較困難，應注意利用強固的工事，實行堅韌的抗戰。不過在延長的戰線上，敵人決不能處處較我優勢，如果發現良好機會，必須以機敏的動作對敵之一部求決戰，亦可因戰線之擴張，而獲得較大的勝利。」

楊杰氏也說：

「依近代戰爭的公例，愈是裝備完善的軍隊，愈是利於速戰。我們固不是好戰的國家，我們目前的希望，只在能夠團聚作戰的實力，能夠作長時間的固守。我們能把工業中心放置在國防

中心的翼蔽之下，那末，萬一不幸而與敵軍作長久的抗戰，我們儘可吸收敵人最大的兵力，支持最久的時間，以尋求最後的勝利。（什麼是國防的基本條件）

由此可知二氏的意見，在戰略上都主張採用持久戰的戰法，但是我們要採用持久戰，必須先要將現代國防上的三個特點有充分的準備，而尤以樹立國家總動員的計劃更為緊要。但是國家總動員的計劃，範圍太廣，而且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本文僅就財政方面言之。

三 國防與國防費

在談國防的財政準備之前，不能不先將國防費作一個解釋，國防而無國防費，則無異紙上談兵，畫餅充飢。國防費之於國防，彷彿如飲食之於身體，身體乏相當的營養，即不能工作，國防而無充足的國防費，則國防無從建設。一切國防的建設，國防的充實，國防的鞏固，都需要物質與人力，在貨幣制度之下，就需要貨幣的支出。所以有人說國防費支出愈多，則國防愈鞏固。但是如上所述廣義的國防是指一國的人力物力以及國民的精神的總和而言，如此則一國的歲出的全

部，都可以說是國防費了。這樣去說，國防費的範圍未免過於廣大。現代國防的中心，依然是軍備。試問無軍備的國家，能夠說是國防鞏固的國家嗎？福熙元帥說，「不經戰鬥無勝利。」戰術理論家克拉榮維志（Karl Von Clausewitz）說：

「戰鬥為種種戰爭的活動中，唯一的有效手段。」

所以內容充實的強大軍備，僅僅沈默的存在，已足以使敵人驚畏，不敢施行侵略，干涉，這已經實現了防衛國家的功效了。即使一旦不幸，動起干戈來，有充足軍備的國家，在開戰之初，亦較易得勝。這於以後的戰局影響很大，事實上已實現國防的第一步企圖。所以軍備依然是國防的中心。因此，一般所稱的國防費也就採取狹義的解釋，換言之，國防費是指準備兵力的費用，及使用兵力的費用，更明白說的就是備軍費和戰費。

從歷史上看來，各國的國防費有逐年增加之勢。茲據希爾斯鐵所著戰爭經濟學（E. W. Hill: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所載一八九八年與一九一四年各國軍備費比較表如下：

一八九八年各國軍備費

	陸軍	海軍	合計	增加百分比
英國	二〇、八〇〇、〇〇〇鎊	二五、六七四、〇〇〇鎊	四五、四七四、〇〇〇鎊	七七〇
法國	二六、三四三、〇〇〇鎊	一一、七一六、〇〇〇鎊	三八、〇五九、〇〇〇鎊	二七六
德國	三一、六三五、〇〇〇鎊	五、九七二、〇〇〇鎊	三七、六〇七、〇〇〇鎊	
俄國	三〇、三二七、〇〇〇鎊	七、〇八九、〇〇〇鎊	三七、四一六、〇〇〇鎊	
奧國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鎊	一、三〇〇、〇〇〇鎊	一一、三〇〇、〇〇〇鎊	
意大利	一二、六八三、〇〇〇鎊	四、七〇九、〇〇〇鎊	一七、三九二、〇〇〇鎊	
日本	三、二〇〇、〇〇〇鎊	一、一〇〇、〇〇〇鎊	四、三〇〇、〇〇〇鎊	
一九一四年各國軍備費				
	陸軍	海軍	合計	
英國	二八、八四五、〇〇〇鎊	五、五五〇、〇〇〇鎊	三四、四〇五、〇〇〇鎊	七七〇
法國	五七、五六〇、〇〇〇鎊	一五、三六七、〇〇〇鎊	八二、九二七、〇〇〇鎊	二七六

國防與財政

德 國	七,000,000 鎊	三三,三三,000 鎊	九五,一六,000 鎊	一五〇.一
俄 國	七,050,000 鎊	三六,一四六,000 鎊	一五,八三,000 鎊	一三.九
奧 國	三,三,000 鎊	二,四〇六,000 鎊	三六,六三,000 鎊	三三.一
意 大 利	一,七,七六,〇〇〇 鎊	一〇,三三,〇〇〇 鎊	二九,〇六,〇〇〇 鎊	六.一
日 本	九,九七,〇〇〇 鎊	一〇,〇三,〇〇〇 鎊	一〇,〇二,〇〇〇 鎊	三三.六

不但歐戰以前，各國的軍備費呈膨脹之勢，即在戰後，直至今日，各國的軍備費，亦急速增加，幾無一例外。茲據日本昭和十年十一月號改造雜誌所載美濃部亮吉教授所列近數年來各國軍備費及對於總預算所占之百分比表錄之如下：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軍備費 百分比	對總預算 百分比	軍備費 百分比	對總預算 百分比	軍備費 百分比	對總預算 百分比
英 國 (單位百萬鎊)	一〇.六	一三.九	一一.三	一三.五	二.三	九.〇
美 國 (單位百萬圓)	四七.七	二.三	六三.八	一四.三	七九.五	一七.六

戰役	年	份	日	數	戰費(單位百萬美金)
法國(單位百萬法郎)	1792	311	11,124	311	11,200
德國(單位百萬馬克)	1870	146	1,331	310	—
意大利(單位百萬里拉)	1860	190	4,300	106	4,614
拿破崙戰役	1790—1815	9,000	3,070	—	—
克里米戰役	1854—55	730	1,700	—	—
南北美戰役	1861—65	1,350	7,000	—	—
普法戰役	1870—71	210	3,301	—	—
南波爾戰爭	1899—1902	995	1,250	—	—
日俄戰爭	1904—05	548	2,100	—	—

各國的軍備費固逐漸膨脹，即歷史上每一次大戰時所耗的戰費也有逐次增加之勢。茲據一般人所常引用的美國巴格特(Bagot)教授所估計的近代幾個大戰爭的戰費如下：

世界大戰

一九一四—一八

一、五五六

二〇八、三〇八

從上述表中，可以看出世界大戰的戰費總額超過南非戰爭幾達二百倍，超過日俄戰爭約一倍百，更加上間接損失費則達三千三百七十九萬萬又四千六百萬美金（仍據巴格特教授估計。）此數字雖不甚可靠，但已足以表現戰費的浩大可驚了。

現代國防費何以會如此膨脹？其原因約有下列幾點：

1. 誠如克拉維志所說，國防的組織，因「力的交互作用」量與質同時增大而且精銳化了。各國都常欲保持優於他國的龐大精粹的國防組織，因此互相競爭，國防費遂日益增大。

2. 因軍器的日益進步，軍艦、飛機、軍器的製造費用也隨之日增，例如日本在日俄戰爭前所買入的日進、春日兩艦，買價爲一四、九三七、三九〇圓，每噸約計一千五百圓。但依一九三〇年美國海軍將官會議會員在美國上議院海軍委員會所發表，八吋巡洋艦的建造費每噸費一千七百美圓，六吋巡洋艦千八百五十五圓，驅逐艦二千七百九十圓，潛水艦

三千三百七十圓。此種精銳軍器不僅造費昂貴，而且消耗度很速，不久就成了時代落伍者，所以非不斷建造新軍器或改造不可。即改造也須浩大的費用。例如倫敦會議之後，美國改造兩隻軍艦，竟費一千四百八十萬美金。

3. 大量的精銳軍器等的維持保存費，亦為國防費增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4. 因兵員的增加，所以服裝費，軍餉及人事費也增加了。

5. 國防費的範圍擴大了。例如機械化設備（坦克車，鐵甲車，自動砲車等）空中戰的設備（如空軍的經常費及飛機廠的設備等）海中戰的設備（如潛水艇等設備費）以及化學戰的設備（如防毒設備）都足以使國防費增加的。

國防費的增加既為世界一致的趨勢，而且又有必然的原因，則中國國防費的增加，實無足奇。但觀最近數年來的預算，則其百分比反有減少的傾向。茲將民國十七年以來軍務費及其在支出總數中之百分比列表如下：

年 度	支出總數（單位百萬）	軍務費	占支出總數百分比
-----	------------	-----	----------

十七年	四二二	二一〇	五〇・八
十八年	五三九	二四五	四五・五
十九年	七一四	三一二	四三・六
二十年	六八三	三〇四	四四・五
二十一年	六四五	三二一	四九・七
二十二年	七六九	三七三	四八・五
二十三年	九一八	三三二	三六・二
二十四年	九五七	三二一	三三・五
二十五年	九九〇	三二二	三二・五

(上表所列數字,十七年至二十二年度係財政報告支出淨數,二十三年度至二十五年度爲預算數。)

有人以爲今日中國的財政已在非常危險的狀態中。國家經費年年膨脹,國家的歲入,實不

足抵支出，於是年年在赤字財政下過日子，公債累積，債務費的支出愈大，在平時已極危險，何況戰時？所以主張開源節流，而軍備費也在節省之列。如尹文敬先生於其所著非常時財政論中所說：「一面注重加稅的增收，停止公債的募集，一面裁減軍政，以節非常的支出。」從原則方面說，這固然是對的，健全的國防是建築在健全財政之上的。財政發生了破綻，國防也就動搖了，但是爲健全財政之故，而使國防不健全，這也非計之得者。何況我們是一個被侵略的國家，這區區保衛民族生命的國防費無論在絕對數方面及相對數方面，和侵略我們的國家相比，都相差太遠。如果這項軍務費真能完全用之於對外的國防上，則我們還嫌其過少。何能再加削減？茲將日本最近數年軍備費的數字及對於歲出總數的百分比列表如下：

年 度	歲出總數 (單位百萬元)	軍備費 (單位百萬元)	百分比
昭和四年	一、七三六	四九四	二八・五
昭和五年	一、五五七	四四二	二八・四
昭和六年	一、四七六	四五四	三〇・八

昭和七年	一、九五〇	六八六	三五・二
昭和八年	一、二五四	八七二	三八・七
昭和九年	二、一四二	九三七	四三・八
昭和十年	一、一九三	一、〇二三	四六・七

日本是一個軍備已經極發達的國家，但是我們觀上列數字，不但其絕對數非我國所能追及，就是在歲出總額所占的百分比也遠過我們。日本的軍部還以為這是最少限度的國防費，尚嫌太少。那末我們為保存我們國家的生存起見，何能再削減國防費呢！或者以為中國官文書所載的數字，距實際支出的數目甚遠，但這也是各國的通病，不僅中國為然。國防費本來含有祕密性質的，如德國、俄國國防費的支出，根本不願意使外人知道。所以預算所列的國防費原來是一種近似的數值。如美國護國軍的一部分軍費是由各州負擔的，失業救濟費則移用於軍事方面。一九三三年所舉行的市民保育團的動員演習所需要的經費約三億元，是由失業救濟費出文的。法國國會於一九三四年通過八億法郎的國防特別預算，以為陸軍設備的改善費。這都是在

公佈軍備費之外，以祕密經費或預算以外的經費等用之於軍事方面的實例。

所以我們要謀中國財政的健全，不能在這國家生存的保險費上想辦法，還得另求出路。

四 中國財政的弱點

國防費的數量既如此龐大，國防費的性質又如此重要，而中國的財政在平時已有捉襟見肘之患，戰時更將如何辦理呢？於是一般關懷國事而又留意中國財政問題的人，鑒於外侮之日亟，戰禍之殆難倖免，遂有戰時財政，非常時財政等的主張發表。所謂非常時財政或戰時財政，也就是國防費的籌措問題。我以為在談這個問題之前，對於中國財政現狀，應先加以檢討，否則樂不對症，空言何補於實際。

目前中國財政狀況，無疑的是不健全。中國財政上的弱點很多，如稅制之不完備，稅源之不穩固，債務費的龐大，公債的累積，信用機構的不完整，財務行政的未上軌道，人民所得的貧乏等等都是財政不健全的明證。其中尤以稅制之不完備，和稅本之不穩固為最大危機。從歲入方面

加以觀察，租稅之全部，幾皆由間接稅組成。試將近幾年來歲入總數，和關稅，統稅，鹽稅的收入，對於歲入總數的百分比列表如左：

年度別	收入總數 百萬元	關稅		鹽稅		統稅		三稅合計	
		數額	百分比	數額	百分比	數額	百分比	數額	百分比
十七年	四三四	一七九	四一·二	九三	六·八	—	—	二七二	四九·〇
十八年	五九九	二七六	五二·二	一三三	三三·七	—	—	三九九	六二·九
十九年	七三四	三三三	四八·八	一五〇	三三·一	三三	七·五	五一六	七三·四
二十年	六三二	三〇	五·一	一四四	二二·一	八九	一三·〇	五九九	八八·二
二十一年	六七二	三六	四·六	一五六	二二·五	八〇	二二·九	二六一	三八·〇
二十二年	八〇一	三五	四·三	一七七	二二·一	一〇五	一三·一	二六一	三三·一
二十三年	九二八	三八	四·一	一九〇	二〇·七	二六	二·七	二六八	二八·九
二十四年	九五七	三一	三·二	一八四	一九·二	三三	二·八	二六八	二八·一
二十五年	九九〇	三八	三·八	一九九	一九·〇	三三	三·三	二六八	二六·八

觀上表所示關、鹽、統三稅之收入，始終占我國歲入的絕對多數，這三稅就租稅的原則言之，有二大缺點，第一違背平等的原則，第二不合彈性的原則。關稅之所徵，廣及布正米麥，這是一般平民日常生活所不可少之物，其在食物支出費中之比例，遠較富人爲大。揆言之，稅額的負擔，貧民更重於富者。統稅所徵者爲火柴、水泥、捲烟、麪粉、棉紗等，其情形與關稅相同，其負擔大部分落在平民身上。中國一般平民，因連年的天災人禍，大都數在饑餓線下，而課之以重稅，其所受之痛苦，自非富有者所能比擬。這顯然是違背公平原則的。這與社會的秩序、人心之安定，都很有關係。第二是缺乏彈性。健全的稅制必須當有伸縮力。有伸縮力的稅制，可以隨國用的需要而變動。國家需用增大，稍更易其稅率，即可獲得鉅額的稅款。但是這三種間接稅都是缺乏彈性的。因爲中國平民的負擔已苦太重，不能再增加負擔。能提高稅率，不但不能增加稅收，而且引起人心的騷動。年來關稅收入的減少，走私雖爲其原因之一，但人民購買力的衰落，未始不是一種重要的原因。所以關稅的提高，其結果是不難預料的。鹽稅自民國二十一年以來，已增加三次，無形中已提高稅率一倍，鹽稅雖略形增加，但食鹽數目並未增加，這就是說明一部分人民因負擔不起而

被迫食私鹽和淡食。鹽稅之不能再加，事實昭然，否則，弱者淡食固有損於國民健康，而強者且強抗搶賣，將激成民變，遠如唐末黃巢錢鏐汪華之作亂，元末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之舉兵，近如山東鹽民之搶鹽，河北硝民之抗變，岱山漁民之暴動，都是因鹽稅過重，民不堪命的明證。設不幸沿海鹽區在戰時而發生事變，則不但稅源無法充裕，抑且影響戰事，所以鹽稅是無可再加的了。至于統稅，則年來中國工業，已呈搖搖欲墜之勢，如再增加稅率，則無異促其崩潰。中國財政所恃為命脈的三種稅源，既如此缺乏彈性，如何能應非常時之急需呢？上述三稅不但無增收的希望，而且有大量減少的可能。如關稅的收入，以江海各關收入為大宗，陸地各關除東北各關已喪失外，新設長城各卡，事實上等於虛設，西南邊境各關收入至為有限。但江海各關的收入，一遇戰事，海口皆有被封鎖之虞，貿易大減，稅收自亦隨之大減。我國食鹽雖有海關池鹽，井鹽，硝鹽，礦鹽五種，但鹽產以海鹽為大宗，據鹽政實錄所載，自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年五年平均產鹽額，以淮北為第一，遼寧第二，山東第三，川南第四，長蘆第五，兩浙第六。以二十年產鹽而論，則鹽產總數為三四、六四一、〇〇〇擔，其中重要各區所佔百分比如下：

長蘆	一五·二六
山東	一四·七七
川南	一二·九四
廣東	一〇·三八
淮北	一一·五八
兩浙	九·三六
遼寧	一一·一二
川北	四·二一

除遼寧稅收已完全喪失外，其餘重要鹽區域如長蘆、山東、廣東、淮北、兩浙無一不是戰爭要地，能否產鹽已成問題，尙何增加稅收之可言？統稅完全爲出廠稅，中國工廠不在沿海，即在沿江，如上海、天津、青島、廣州、汕頭、廈門、無錫、漢口、杭州等處，有的在敵人勢力之下，有的爲敵人奪取的目的，工廠能否安全，尙成問題，因而統稅也發生動搖。所以這三種稅源是很不穩固的。中國財

政既含有如此重大的危機，我們自應設法預謀補救。

五 如何求財政的出路

要求中國財政的出路，我以為應該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從與財政最有關係的內政，外交，經濟入手，一方面從財政本身入手。內政，外交，經濟可以說是財政的先決問題，也可以說是財政問題的基本條件。假如基本條件不具備，則一切都等於紙上談兵，所以僅僅從財政而談財政，是不會得到良好結果的。先從內政來說，如果政體不統一，內政不修明，吏治不澄清，甚至內亂不已，萑苻遍地，則民不聊生，國庫何能充裕？縱有良好財政制度，亦將無從實施。國際地位的樹立，亦由國內政治條件所造成。外債也不失為國防費來源之一，日本之戰勝俄國，大家都歸功於其外交的成功，而尤其是在英美財政上的援助，歐戰時法國所得英美的援助，都是很好的實例。但是必須政治統一，國內秩序安定，然後始能得國際間的援助。如果政治黑暗，社會紊亂，生產衰落，這樣一國家，尚能希望他國的投資嗎？此外如戶口調查，職業調查，財產調查也都與財政政策的施

行有密切關係的所以第一要求在內政上有一個組織完備，權力穩固，政權統一，廉潔有爲的中央政府。

第二是要求有一個一貫的外交政策，一國外交政策的成功，無形間就增厚了國防力。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下，尤宜在外交上先有佈置。中國是一個主權不完整的國家。任何內政的改革，往往會受外力的牽制。譬如營業稅的徵收，至今不能徵及租界，造成了租界畸形的繁榮。又如幣制的改革，如果不得英國的助力，是難以成功的。又如最近即將開徵的所得稅，如果在外交上不預爲佈置，求得國際的諒解與協助，則不但隱蔽於外力下的巨額所得爲課稅所不及，而且如營業稅一樣，有錢的人避入租界，即可避免巨額的負稅，結果必將促成資本的逃避，資金將益集中於租界，內地的金融益形枯竭，工商業愈益蕭條。稅源已竭，稅收何來？所得稅的優點也完全喪失了。所以第二要有一個一貫的外交政策，積極的獲得國際間的援助，消極的防止外交上的阻力。使我們的財政政策得以施行無阻。

最後要求實行國防的經濟建設，中國還是一個農業經濟社會的國家，農業是舊式的小農

業，工業大都不離手工業，商業還是小規模的小商業。信用機構不健全，交通設備不發達，人民除生活必需品外，別無長物。頻年以來，更因天災人禍，農業已告破產，工商業亦極度衰落，人民已在水水平線下過生活。在如此的經濟狀態下，不但不能在短時間內籌得應付戰時的非常巨大的費用，即在平時亦已無法保持財政收支的平衡。孔子說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英國經濟學家披谷也以爲「增加生產是戰時資源之一」。無論創辦新稅，或增加稅率，或發行公債，或徵發民財，要有大量的非常收入，只有培養國民資本，增加國民所得。換言之，只有積極實行國防經濟建設，開發富源，發展工商業，增加生產，完備交通組織。由農業經濟社會而成爲工業經濟社會。則不但物產增加，戰時所需要的物資可以不賴外求。而人民的所得也得以提高，社會繁榮，稅源豐富，稅收自可源源不絕。這就是所謂經濟的條件，一方面從這基本條件入手，同時我們還得從財政本身加以改造。

中國稅制之不完備，稅源之不穩固，已如上述。我們自應先從稅制上加以改造。中國稅制之缺點既爲缺乏彈性，不公平，不穩固。則我們自應代之以富有彈性及確實性的直接稅。如所得

稅及遺產稅均爲財政學家所公認的良稅。馬寅初先生就主張從速開辦所得稅爲中國戰時稅收之中心。有人以爲以目前中國國民所得的貧乏，及戶口調查之不完備，職業調查，財產調查之尙未舉辦，私人簿記之零亂雜碎，欲以所得稅充戰時稅收之中心，未免過存奢望。但所得稅既爲犧牲公平，富有伸縮力的良稅，我國自應立即開辦，縱目前所入有限，但假以時日，不難漸成稅收的中心。英國在一九一三——一四年度所得稅收入指數爲一百，至一九一九——二〇年度則增爲七百六十，六年之間幾增八倍。美國在一九一三年聯邦所得稅的數目僅占該國稅收百分之五，至一九二七突增至百分之六十四。固然英、美是世界主善發達的國家，所以所得稅能夠如此發達。但是我們如果也能夠走上現代化工業生產之路，則所得稅的增收，又何嘗無望！所以，我以實行國防經濟建設爲中國財政求出路的基本條件之一。有人以爲到現代化工業生產的時候，中國已不知成了怎樣的狀態了。國難如此緊急，還容我們徐徐的建設嗎？但是要真正挽救國難，造成現代的國家，自當從根本做起，只要我們肯上下一心，埋頭苦幹，也不要過長的歲月。最怕是因循蹉跎，空談而不實行。一般人常說，歐美百年的進步，日本只費了五十年，蘇俄則僅要

十年。所謂物質建設，愈到後來愈佔便宜。那末我國能夠學蘇俄，十年也就夠了。所得稅暫行條例，現在已經立法院通過，希望遺產稅及地價稅等也從速舉辦，樹立健全的租稅制度的基礎，同時將阻礙民族企業，及平民生計的惡稅廢除。

第二應改良財務行政，制定完備的財政法規，劃分中央與地方財政的收支，絕對不許地方當局干涉中央的財政。如目前各地之自定稅率，或任意附加，或霸佔扣留。同時又須預算確實，迅速收支適合會計，審計，金庫完全獨立。財政機關之合理化，裁撤疊床架屋之駢枝機關，財務人員之任免調遷，須于考試制中求之，以求人盡其才，並加以保障，使得安心任職。絕對革除推薦援引之陋習。如此則營私，中飽之弊可除，而人民所納之稅款，可以涓滴歸公，財務費亦得減少。

第三應改善金融組織國防所需要的實體，固為物力與人力，但在現在貨幣制度之下，大部分還是以貨幣為收支的手段。所以如果有完善的金融組織，更可以藉信用的膨脹或通貨膨脹而增加國防費的收入。但是我們的金融組織尚不足以任此重大的使命。依目前的情形言，第一應從速成立統制金融的中心機關，使有領導金融，操縱通貨的能力。現在的中，中，交三行聯立式

的中央銀行制度，尙不足以語此。目前的資力不充的小銀行，在戰事發生時，不足爲防止信用恐慌的助力，應使之集中合併。第二集中於上海的資金，必使設法藉金融機關的運用流入於內地。第三現金的集中，應求其澈底，無論地方當局及民間所保藏的現金，都應迅速集中。以充實中央銀行的準備，且可以防止戰時暗盤的發生而擾亂物價。第四紙幣發行仍應集中，現在市面流行的鈔票，尙嫌紛雜，地方銀行的鈔票在內地尙占勢力，戰事發生，此種鈔票難免跌價，而爲擾亂物價的因子，發行集中之後，則人民無選擇之餘地，物價自亦不至紊亂，人心亦得安定，這是金融方面應有的準備。

中國財政果能從上述三方面着手準備，則不但平時不至有軍備費過重之感，卽戰時的戰費，也不患無籌措的方法了。

關於戰費籌措的方法，時人論者已多，如提高奢侈品稅，印花稅，郵稅，創辦地價稅，土地增殖稅，戰事營利稅，享樂稅，銀行收益稅，徵收救國捐，自由募捐，籌借外債，增發公債，以及有限制的紙幣政策等。此外又有節省浪費，停付債務費，停止非急需的建設等。方法很多，利弊亦不一致。茲因

限於篇幅，不再評論，要在隨機應變，因時制宜，茲特提出籌措戰費時應注意之三點，以爲本文的結論。

(一) 戰費之籌集以迅速爲要，又應注意數量之巨大。戰爭一開始，財政上即應立刻增加大量之收入，以應戰爭的急需。

(二) 巨量收入之增加，須源源不絕，以支持相持的戰局，而獲得最後的勝利。

(三) 迅速而又長時期的巨量收入，須顧及社會最小經濟犧牲之原則，以收一致對外的效果。不可激起人心的騷動，使全部戰線動搖。

從「五四」談到國難

左舜生

民八的「五四運動」是由新思想運動過渡到新政治運動的一道橋梁。我們要了解中國最近二十年來政治上的種種事變，對於這個具有支配一切政治活動的思想運動的內容有加以一番體會的必要。所謂新思想運動的興起，就大體言之，不外下面的幾個原因。

(一) 民國三四年之交，袁世凱所代表的一個力量，想要作恢復帝制的嘗試，第一步乃有一種復古運動的提倡，因而激起一種有力的反撥。

(二) 民三歐戰爆發，民四二十一條交涉，均普遍的，深刻的，給予國人一種刺激。

(三) 民五洪憲改元，民六張勳復辟，尤其使大家感到國本動搖，覺得非把代表帝制思想的魔鬼根本撲滅不可。

(四)民六俄國革命成功，是形成新思想運動另一方面的一個因子。

(五)民七美國大總統威爾遜發布議和基本條件十四條，及是年十一月協約各國與德國簽定休戰條約，頗給予中國一種新的希望，以爲二十一條及山東問題可於和會中得到相當的平反。

(六)民八巴黎和會既開，我國關於二十一條等的提案，被和會拒絕討論，山東問題，以日本事前與英法已有成約，而民七章宗祥奉段祺瑞命與日本所訂山東善後協定，又有「欣然同意」四字，致和會只能以德國戰前在山東所享權利全部授之於日本。因此才有「五四」一幕的產生，也因此才有對凡爾賽和約的拒絕簽字。

本來，「五四運動」一幕的本身是很單純的：它不外是一面反抗誤國的軍閥，一面反抗協以謀我的帝國主義者。可是這兩點已經不是一種思想，而是一種行爲，所以我說五四運動是由新思想運動過渡到新政治運動的一道橋梁，其原因就在此。

再進一步觀察：(一)「五四」這一幕，是學生運動的成功，他們博得了全國的同情不少，

在他們的領袖中，也確實有一部分人才，因此他們的行動更趨於組織化，於是有學生聯合會和全國學生聯合總會的產生，這種組織是把全國多數青年推進去，積極過問政治的一種工具。

(二) 這個時候，白話文的運動已漸次成熟，刊物特別加多，且容易為一般人所了解，對於宣傳實有非常的便利。

(三) 自民六以迄民八，當時的所謂護法運動，實在已成了強弩之末，中山一眼看見五四這班活潑跳動的青年，同時又回顧過去自己的一班老同志，實在不能不怦然心動，因此才發奮著書，也因此才漸感國民黨有改造的必要，同時國民黨新興的言論機關如建設月刊、星期評論等，也才在上海出版。

(四) 正當着國內蓬蓬勃勃由新思想走上新政治一條路上去的時候，不先不後蘇聯在民八民九（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兩度由加拉罕著名的對華宣言，也就在這個時候映入中國知識分子的眼簾了，這是兩篇具有十足誘惑性的文字，以中國知識分子這個時候的心情，讀了這兩篇宣言，不能無動於中，而對蘇聯抱若干的好意與期待，這當然是很自然的一個趨向。

(五) 蘇聯在兩度宣言以後，乃由空言而趨向實行，於是有民九以後優林、表克思的相繼來華，雖與當時的北京政府沒有發生何種正式關係，可是對於中國知識分子

的宣佈，已逐漸樹立了一個中俄攜手的基礎。民十，越飛又來，中俄關係乃有了加速的發展。雖然在越飛手裏依然沒有與北京政府建立中俄間的外交關係，可是等到他由北京南下預備東渡日本以前，在民十二一月二十六日與中山聯署發表的四條宣言，却已造成了國民黨容共聯俄的張本。（六）到了民十三，蘇聯對華的工作，可以說是南北雙管齊下：一面對北，由加拉罕與北京政府簽定一個『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一個『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同年九月，蘇聯與東三省且成立了一個『奉俄協定』，一面對南，自民十二年未，便到了廣東，而國民黨吸收共產分子而加以一度大規模改組的機運，便已成熟。

在民十三一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集的全國代表大會的議席上，李大釗曾以代表共產黨的資格，鄭重的作如下之聲明：

『第三國際共產黨員加入本黨，係服從本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國民革命，絕對非想將國民黨化為共產黨，其加入本黨，係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非以黨團作用加入本黨。』這本來是國共關係的一種正當解釋。假如共產分子加入國民黨以後，能遵守他們這個最

初的解釋則言僉民十六以來國內的若干不幸事件可以不至發生，如僉民十七的五三，僉民二十的九一八這種嚴重的國難，也斷然可以沒有，可是國共之必得分家，這差不多是命定的，因為蘇聯與第三國際其所以命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其最初的認識，祇是以共產黨太無憑藉，不堪一用，不如讓他們加入一個較有歷史的黨派，可以得到一種掩護，比較有利，這本來不過是一種策略，原無所謂誠意可言，等到十三年國民黨的代表大會既開，共產分子如李大鈞、于樹德、譚平山、于方舟、彭素民、張國燾、毛澤東、羅秋白、林祖涵、韓麟符等，即已當舉為中委或候補中委，而共產黨吸收分子的工作，更從此積極進行。當毛澤東在廣州大會後來到上海的時候，便和鄧中夏等向當時的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大肆活動，第一步宣讀大綱加入國民黨，毛澤東却不客氣的說：

「我們加入國民黨，只是一種利用，老頭子（指中山）的病，已不可救藥，最多只能活六年，只要把這六年度過，完全是我們的世界了，你們爲什麼不來呢？」

毛更補充說：

「我們豈止對國民黨不過是利用，就對陳獨秀們又何嘗不是利用呢！」

這種話在言者或許無心，而聽者則不能不留意，國共關係之斷不能有好結果，乃至共產黨本身將來也大有問題，我們便從這種話裏面明白了一個大概，所以當時對他們的一番『好意』，祇得婉辭謝絕。這個時候青年黨在國內的組織已漸次形成，他們知道我們要奪去他們一部份青年，同時也知道我們要與他們立於正面反對的地位，假如不把我們『收服』，當然對於他們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障礙，因此他們仍不死心，在民國十三年一個春天的清晨，鄧中夏、劉仁靜、楊賢江四位，便到了上海民厚北里一七八九號我的住宅，要與我們作一度詳盡的談判，當時代表我們這一方面的，便是我和李璜、陳啓天，此外另有一位於兩方面都無政治關係的朋友列席。從早晨七點鐘，一直談到吃過晚飯，兩方的論點，到底無法接近，當我們握手言別的時候，中夏對我們說：

『好！以後我們相見於疆場之上吧！』

氣概是頗凜凜然的。我們從私人的見地，對當日這四位中現在已死去的三位，還能想見他們當時的聲音笑貌，這要算是少年中國學會散伙中最可紀念的一幕！

從民十三一月國民黨改組後，一直到民十六四月國民黨的清共，在這三年多的時間，總算共產黨飛躍的時代，尤其是十五年國民黨在廣州的中央黨部，簡直可以說大體上已在共產黨的把持之下，九個常委共產黨已佔去三個，八部的秘書，更由共產黨一手包辦，便連一個秘書處的書記長，也被共產分子佔去了，毛澤東更代汪精衛做了事實上的宣傳部長。所以等到一旦北伐軍到了長江，在廣州的國民政府又已遷到了武漢，共產黨這種篡奪國民黨的陰謀，到底不能不歸於根本破壞。平心而論，以民十一二年國民黨的景象，受了當時新潮的鼓盪，與國際的影響，其不得不出於聯俄容共，可以說是『勢有必至』，及至經過了三年以上的時間，以共產黨人的幼稚，和國民黨所發動原於生存上的自衛，乃至當時國內國外種種情勢的逼迫，其不得不出於清共絕俄之一途，也可以說是『理有固然』。至清共以後，仍不免這八九年間之擾亂，這或許不是清共的當時所能逆料。

本來，所謂『五四』前後的新思想，內容是矛盾渾沌的：有個人主義，國家主義，世界主義；有勇往的奮鬥精神，也有靡廢的頹廢思想；一切的舊思想，舊倫理，舊習慣，既被攻擊得體無完膚；而

辨介紹進來的許多東西，又并無一個明白的體系，不容易使人去辨別選擇，至如何消化使之變成一種人生態度，當然更是談不上。女子在這一時代，大致可以說是被解放了，但所謂「女子解放」這件事實，是直接影響了這十幾年的中國政治以及社會的各方面，從大體上看，可以說是不甚健全，這在一個平日留心世變的觀察者，或許不會否認。更從一般國民的經濟生活上看，「享樂」兩字也是自有所謂新思想後才流行的，我完全沒有意思反對一般人合理的把生活水準提高，可是細究今日一般人經濟生活的內容，實在是不堪聞問，大體總是充滿了醜惡，卑鄙，自私，在一片的黑暗中，確確實實有一種極端的個人主義在那裏作怪。更概括的說一說，讀者試閉目靜想一會，在你周圍的朋友，假如除掉其中少數某種程度的白痴而外，究竟能有幾個不是害得有很高度的神經病的？他們的歌哭無端，他們的喜怒無常；他們所追逐的沒有止境，他們所懇求的沒有壓足；他們的言論與行動一會兒可以說是極端古典的，但一會兒他們可以變成極端的浪漫，從表面上看，某人某人好像是很能節制的；但他們的內心或許是極端的放縱！一切古今中外聖哲的是是非非，他們不一定能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換言之，今日人與人之間，並沒有

什麼公共的信條可守，並沒有什麼公共的軌道可循。兩個以上生活在同時同地的人，他們的見解可以完全格格不入，你說上一篇大道理，認爲是天經地義，他簡直可以充耳不聞，退避三舍，認爲你這個全是胡鬧！從這種精神上或思想上的病態所產生的結果，我們滿眼所看見的，只有仇恨，猜疑，褻狹，專橫，有己無人，你死我活，對人既絕對不能原恕，處己也絕無半點精神上的緩衝，平日在報紙上連篇累牘看見那些跳水吃安眠藥的自殺。還是自殺之小焉者，祇有那些吃了時代的迷魂藥一羣一羣走上自殺之途而自命爲勇士的，才真是這一時代的病徵！以思想生活陷於這樣一種病態的國民，我們希望這個國家的政治歸於清明安定，當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可以說是大不幸，也可以說是大幸，九一八的國難居然降到我們的頭上來了，並且經過了近五年的時期，還在繼續不已的發展中，這可以說是對中國人投下一帖起死回生的猛劑。如何由浪漫而返於嚴肅，由頹廢而返於振作，由空洞而返於切實，由高調而近於平易近人，由狹隘褻狹而返於宏博寬厚，可以說已經漸漸的引起了中國人的反省，雖然現在所表現的還是異常的幼稚，所犯的一切毛病，似乎仍有不少諱疾忌醫的地方，可是自從國難以後我們反而有一點點

新的希望，却是事實。我們不要過分的悲觀，我們無疑的要利用這一度的國難，求得國家的新生命。

非常時之青年自處與青年指導

左舜生

最近因冀東有所謂自治政府的出現，華北局勢驟告緊張，平津岌岌不保，察綏亡在旦夕，於是岑寂已久的學生運動，乃忽形飛躍，以請願的方式，作羣衆的示威，能發能收，在大體上並無何種軌外的行動。吾人於此，實在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喜者人心尙未盡死，教育畢竟有效，敵方難以雷霆萬鈞的威力，花言巧語的勾引，迫誘兼施，希望我們放棄反抗的態度，到底全部歸於失敗。去年十二月二十二那天，我正預備乘午後一點十分的京滬車從上海赴南京上課，一到北站，便看見五六百復旦大學的學生，正列隊月台，準備出發，秩序整齊，態度沉着而精神活潑，什麼威迫，什麼利誘，在他們視之是狗屁不值半文的！車站雖有若干的警察和保安隊，但都是徒手，既未

配帶鎗枝，也未攜帶木棒，他們的面色異常和平，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心境與學生完全一致。登車以後，看見旅客衆多，驟然加上五六十的學生，車內當然異常擁擠，但是學生的領袖發下號令，教同學把座位讓給旅客，大家勉強擠一擠，我更受着他們的優待，給我讓出了一個很舒適的位子。結果這一次的客車雖然沒有開出，但旅客并無怨言。有一位年老的旅客對着大家說：『實在太不成語，也應該大家說說話了，再不說話，將來連說話的機會也沒有了！』從這種地方我們可以看出羣衆對學生的舉動是何等的同情。雖然如此，在我個人仍然是非常的憂懼。中國人沒有人願意亡國，尤其是受過了中等以上教育的青年，他們的國家觀念已經很強，更絕對的沒有一人願意亡國，這完全是事實。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一直演變到今日，敵人所加於我們的侮辱，以及政府所處置這件事的態度，全國有知識的青年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一着火便要燃，一觸動便要炸，這也完全是事實。可是待解決的問題既是那樣嚴重，是不是就是這樣僅足以表示一點意思的請願運動所能有效呢？卑鄙的高呼親善，固然決不足以圖存；單靠一點冷熱不常的感情衝動，是否就能倖免呢？我想了又想，因此便有兩大問題懸在我的眼前：

一個是生在今日中國這樣國家的青年，究竟應該如何自處？一個是立在指導青年地位的。人們究竟應該如何去盡他們最善的努力，以求對於青年有一點切實的幫助，這兩個問題，本來就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換言之，假如立在指導地位的人，能夠好好的去盡他們指導的職責，青年自然便不難受得一個適當的自處之方；同時假如青年能夠有一番深切的反抗，就自己的知識，能力，以及當前的環境，能多有一點明白的識認和親切的體驗，則自然也就能夠盡己以聽，而使指導的工作易於有效。

一一

在這裏，我們有一點首先應該認識：凡事要標舉一個目的都不很難，要如何去達到這個目的却絕不容易，譬如說：『我們要保全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這自然是舉國從同，沒有一個人不會舉起雙手來贊成的；但是，以今日中國這樣一個國家，以今日世界這樣一個世界，而敵人又是這樣一種敵人，假如我們不具備可以應戰的實力，不具備不恤一戰的決心，則一切皆成夢囈！

實言之，領土不僅不能保全，甚至失掉三分之二，五分之四也說不定；主權不僅不能完整，甚至一切次要惟他人之命是聽也很難說；情勢顯然，洞若觀火，既用不着自己對自己說寬心話，當然更用不着自己欺騙自己！可是說到戰，一個國家對一個國家的戰，則今日戰的概念與古代便完全不一樣，我們不必先看自身，姑且看一看我們假定預備去應戰的對象：他們是侵略別人的人，但他們却舉國憂惶着一個『非常時』的將至，而從種種方面準備着這個『非常時』的到來，好像一架火車頭，他們正在那臺上水添煤，火已經是熊熊的燃着，只待鐘點一到，笛聲一鳴，這一串滿載客貨的列車，便可以鼓輪前進。更具體一點說，他們的智識界可以說早已動員：他們在計劃如何統制他們的經濟，如何調度他們的財政；如何使他們全國大大小小的工廠，一旦到了戰時，便可以適於大量軍需品的產生。如何運用他們國內和殖民地的資源，使其不虞匱竭而適於長期的戰鬥；他們知道這一戰不爆發則已，一旦爆發，固然不是以往的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可以相提并論，甚至比較上一次的世界大戰規模還要宏大得多。他們憂慮着：他們憂慮他們貧瘠的石油，他們憂慮他們不足用的鋼鐵，他們憂慮到了戰時他們的生絲將不能易得美國的棉花，

有若干萬以出產生絲爲副業的農民將陷於窘境，同時他們大規模的纖維工業也難保不有一部分被迫而陷於停工。他們審度他們的國際地位，一旦到了戰時，難保不與上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一樣，將有多數的敵人要从四面八方將他們封鎖，他們正在積極的想方法如何解除這種將要降臨的厄運，他們想要實實在在的做到自給自足，因此他們感到他們的經濟集團單只擴大到滿蒙還嫌不夠，非更進一步囊括華北的資源不可！他們雖然不是一個食糧怎樣貧乏的國家，但他們依然憂慮戰事遷延太久，難保不像上次大戰時的德國一樣，要把他們全人口總數十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壯丁，先後送往前線，（第一次大戰時德國的人口不過六千七八百萬，但動員多至一千萬）農村中因壯丁的缺乏，穀物的生產勢將遽減，因此他們注意到如何利用婦女與兒童，希望他們能担負平日爲多數壯丁所担負的一部分工作。他們高呼着「消費節約」甚至希望他們的國民提早過歐洲人在前次大戰中那種吃黑麵包的戰時生活，應該放棄精美的好而吃那種雜有糠稗的糙米！同時他們又并不只靠這種消極的方法，一方面他們還是在竭力講求耕田面積的增加，有所謂開墾助成法，每年由國庫支出鉅額的助成金，以獎勵一般農

民去從事開墾，甚至戰時關於農具肥料如何補充，也在他們經濟學者的攷慮之列，質言之，他們明明知道一入戰時全國國民的生活便要發生非常的變化，但他們決不願一下便放棄他們平日那種豐富潤澤的生活水準。凡上所云，都是隨手舉出若干顯明的事例，但我們已經可以看出這個侵略我們的國家他們是何等的緊張！我們的敵人是這樣一種敵人，我們處在這個非常時的青年究竟應該如何自處？立在指導青年地位的人們究竟應該如何去盡他們指導的職責，這種問題還不值得我們回答嗎？

二

結隊遊行，示威，請願，喊口號，發傳單，甚至高呼「打到東京去」這種做法我們差不多已經幹了二十年，我大胆的斷言，這種舉動即令多少就有一點效果，也總是偏於消極一面的，想要以這種幹法去應付敵人那些積極的行動，那真是等於癡人說夢！我們第一要明白，所謂「和平」所謂「犧牲」這并不是一二政府當局一、向情願就可以實現的，一定要我們全國人具備有取

得和平的力量才可以希望和平。也一定要我們全國人具備了犧牲的決心，才可以發現犧牲的事實。我們也不必囔囔政府「睦鄰」的明令，我們要知道這不過是一種軍相思想，所謂您愛林妹妹，林妹妹不愛你，你便怎樣呢？以今日全國人心的怠惰鬆懈，一切事業的雜亂無章，貪污已成痼疾，奢侈已成習慣，士尙清談，女炫妖艷，不要說我們不配和一個方興的國家去講戰爭，我們又有什麼資格和人家去修言「親善」呢？讀者不要罵我憤世嫉俗，一味「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我姑且不憚辭費爲你們舉出一些眼前的事實：我們偶然走到一家販賣新書新報的書店，所見新出版的刊物誠然不少，就是研究日本，研究蘇聯，研究一般國防問題，一般外交問題的雜誌書籍，也不是完全沒有，可是爲多數青年所耽讀的刊物，畢竟還是林語堂大師等所提倡的論語，人世間，宇宙風一類的幽默作品，和劉復大師周作人大師等所鼓煽的霓裳續譜一類的艷曲情歌！或者是以一折八拍大拍出賣的明人小品，我在南京的一家書店，曾親眼看見一個短髮蓬鬆，高跟挺挺的摩登女郎，從她嶄新的來路皮夾子裏面掏出一張五元的法幣，去買一部新出版的金瓶梅詞話！我真不懂，爲什麼像這樣一部「純太太教科書」在今日這樣一個國亡無

日的時代，還值得多數的大師濫費如許有限的精力去盡力的倡導！在三十年前就知道著上下古今談一類的小說去提倡科學文明的吳稚暉老先生，現在居然老當益壯還龍搖筆即來寫出一篇一萬五千字的長文，誠然是一個可喜的消息，但可惜這篇文字的內容還是打的三十年來或許一輩子也打不清楚的一樁「章吳交惡」的臭官司，真是連我們看的人也看得怪厭煩了！胡適之先生最近寫給石伏高信的兩封信，和他最近在大公報所發表一篇主張外交公開的文章，是何等來得親切而有力，但我仍然相信：假如胡先生肯把他爲一部怕老婆的小說——醒世姻緣寫幾萬字考證的精力多移用一點來處理中日問題，那一定對於青年的指導可以更來得有效。我們檢查青年界的讀物是如此，我們再看一看今日一部分青年的行動，也會立刻使我們感到中國備戰的空氣實在是異常稀薄。他們中很顯然的還有不少的人隨時出入曲線波動的舞場，很顯然還有不少的人欺騙他們的父兄在一個大學中隨波逐流的鬼混資格，他們放着上好的學生裝和中服不穿，每年一定要以父兄心血換來整百的洋錢送給一班殺人不眨眼的「洋鬼子」去換取一身漂亮的洋服！他們只覺得非此不足以媚事婦人，他們絕沒有想到養成了

中國女性愛「假洋人」的習慣，終有一日她們會有拋棄他們這班「假洋人」而去愛「真洋人」的危險！每年輸入中國幾百萬的巴黎高級化妝品，自然大部分是搽在女青年嘴上的口紅，和塗在女青年手脚指甲上的蔻丹，可是今日油頭粉面的男青年又豈在少數？提到女青年，對不起，我想說的話更多了！今日有不少略具新知的女性，她們頗多高談戀愛，而遲遲的不願結婚，她們雖也有不少的人高呼「復興民族」，可是她們把誕育國民的責任，早已算在她們的天職以外！山額夫人的說法，經過胡適之先生的口譯，曾在中國風靡一時，至今還支配着不少青年男女的心理，近來更變本加厲，在中國幾處的都會，竟有以爲人打胎妨孕爲專業的醫生，關於這一點，我是贊同近年以提倡優生著名的潘光旦先生的，我反對中國青年男女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前舉蔻丹口紅，已爲中國習見之事，萬料不到最近更有少數特別摩登的女子，居然利用最新的醫術注射，設法把她們的鼻子升高（絕對事實，斷不虛造）當然的，鼻子既可高升，要把頭髮弄黃，眼皮弄綠，睫毛弄豎，那還成什麼問題呢？「幸有適伊川，見被髮而髻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或乎！」日本的大學生以戴油膩的方帽子穿破爛的皮鞋爲榮，不以褻狹冷「弁當」去上課爲

恥，所穿的還是明治以來那一身沒有多大改變的制服，他人勤勞儉樸如彼，我們的驕奢淫佚如此，我們不必計算別人的飛機有多少架，大砲有多少尊，更不必顧慮別人的炸彈，毒瓦斯多於我們的有多少倍，只要把我們青年男女的拳頭伸出來和別人去比一比，我們不會立刻要感到歸於劣敗嗎？莊子說：『兩軍相爭，哀者勝矣。』中國的領土已經失去了大半邊，在中國的社會仍然感不到一絲絲的哀意，這真是我所最杞憂的一點好，上面責難我們青年的話不覺已說得太多！以我平日這樣一個篤愛青年的人，更覺得不免言之過重，可是『若藥弗眩眩，厥疾勿瘳』，我總希望大家不要以辭害意。

我們責難青年的話雖然是如此，可是檢查我們的同輩我也決不放鬆：我真不知道今日全國五千左右的大學教授有不有半數是夠得上做青年的領路人的？國家已陷入如今日的一種景象，這班先生們的多數，能不能除掉以販賣知識為職業的故態以外，還能從了解青年，誘導青年去與多數青年發生一種精神上的共鳴？他們有不有對於他們自己所擔任的課程曾提出過他們所傳授的知識對於今日中國的青年究竟有何種作用的疑問？一般青年所急切待解決的

問題他們有沒有本其所學作過一番深刻的考慮而給予他們一種親切的指示說到這裏，我又記起一個故事：九一八以後不久，我會很榮幸的隨着一位留學東西洋十年以上而自命名流的某教授在上海一處大學去講演過一次「中日問題」。當時看見成千的大學生坐滿一禮堂，我胸中實在有一種不可遏抑的慚愧。我因為他——某名流教授——是在日本留過五年以上的學，而年齡也比我大得不少，於是我很誠意的讓他先講，也正想藉此先聽聽他的一番崇論宏議，可是不聽猶可，一聽之後我恨不得要把我「打倒欺騙青年的大學教授」一句口號衝口的叫了出來！我估量他事前實在沒有作過半點的準備，以致弄得所說的一番話前後矛盾，雜亂無章，並且還杜撰許多數字去說明日本的軍備，捏造許多事實去說明三井三菱與日本政黨的關聯，胡說八道總算弄完了他的三十分鐘！然而這位先生在他臨死以前，已經居然受着一部分左傾青年的擁戴，死了爲他出專刊，爲他開會追悼，簡直偷天換日，悲維得他如何如何是中國學術界的權威，思想界的先進！我這裏所舉的是一個極端的例，我想中國教育界像這種妄人決不會怎樣的，可是十年八年挾着一部陳死人的講義，東跑西跑兼課兼到二三十小時，只顧自己的肚

子吃得飽，不願被他所害死的青年有好多，像這種人總還不是絕對的少數吧？「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弟視其師，今日立於指導青年地位的還有不少這樣的貨色，我們又那裏還有多事責難青年的餘地呢？

四

好，上面的話已經說得很多，現在要把我上文已說過和遺漏着沒有說到的一些話，歸納的彙舉於下，以作為本文的結論：

一、我們絕對的主張外交公開，要使一班國民有研究批評的機會，如果等到賣身契已經簽定好了，還把全國的國民蒙在鼓子裏面，則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承認，我們就要這樣去指導青年。

二、我們不反對和平，我們也不輕言戰爭，但我們只能承認從備戰的空氣與實力中可有和平的取得，我們反對以屈辱的態度與棄權的方式去換取和平，我們要高呼「國民

備戰』我們要高呼『知識界動員！』我們要高呼『全國總動員！』

三、我們覺得今日學校的軍事訓練有些近於兒戲，我們要求把訓練青年的軍官的資格和學力提高，要使他們不僅可以在操場上喊幾聲『立正』『稍息』，我們還要求他們能上講堂對一般青年說明今日一個中國青年所應具的軍事常識。此外我們也希望能使一般青年常有接觸一切輕重武器的機會，不要使他們永遠肩着一桿木槍無異於徒手談兵。

四、我們主張把大學裏面若干的課程——例如經濟、史地、外交、文學等等——擴大範圍，改善內容，使它們能與明日的戰爭發生關係，尤其在化學物理的研究室裏，我們主張要使學生的工作能與未來的戰爭發生關聯。

五、我們希望同在一地方的大學中學的教師，能自動的組合，使大家多有交換意見的機會，以免在指導青年的時候彼此背道而馳，南轅北轍。

六、我們主張一切學生要着國貨的制服，打倒所有的長袍西裝，尤其要禁止女學生的

奇裝異服。

總而言之，時候已經不早了，即令急起直追，也還有些來不及，如果還要悠悠忽忽的過去，真是不知死所！青年要起來過問國事，這絕對不是一種壞現象，但我們要把他們的熱力範圍在火車頭上的鍋爐裏，他們才能夠致遠任重，否則好比散布在空氣裏面，不久就要隨烟消而消，隨雲散而散！

二五，一五，上海。

中國的大變局與「非常時」

陳啟天

以一個擁有五千年歷史和文化的中國，因受近代世界的影響，幾無一不發生根本變化。政治軍事經濟教育文化學術以及社會一切方面，固然有了根本變化，只就中國在國際的地位和國家的命運說，即已成爲一個大變局了。中國的大變局，發端於鴉片戰役，變到現在，共計九十三年（自西歷一八四二年至一九三五年，即自道光二十二年至民國廿四年）。在此九十三年中，大變局的過程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爲開闢期，即自鴉片戰役至甲午戰役以前，共五十二年；第二階段爲發展期，即自甲午戰役至歐戰以前，共二十年；第三階段爲「非常時」，即自歐戰至現在，共二十一年。試就此三階段分別加以說明，藉便明瞭中國大變局的由來及其前途。

中國的大變局與「非常時」

二

原來中國在鴉片戰役以前，另成一個世界。中國這個世界，是所謂大一統的「天下」，具有悠久的歷史和特殊的文化，既自視爲「天朝」，不願與他國等視齊觀，復閉關自足，不願與他國交通往還。鴉片戰役以前雖已有了國際貿易，但內地既禁止通商，海口也只准限於廣東一隅，無論輸入或輸出，還須經過「公行」做中介，不得直接通商。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年）盧坤、鄒賁，年奏定防範夷人章程八條如下：

- 一、外夷護貨兵船，不准駛入內洋，應嚴申禁令，並責成舟師防堵。
- 二、夷人偷運槍炮及私帶番婦梢人等至省，應責成行商一體稽查。
- 三、夷船引水買辦，應由澳門同治發牌照，不准私雇。
- 四、夷館雇用民人應明定限定。
- 五、夷人在內河駛用船隻應分別裁節，並禁止不時閑遊。

六、夷人具稟事件應一律由洋商轉稟，以肅政體。

七、洋商承保夷船應認派兼用，以杜私弊。

八、夷船在洋私賣貨物，應責成水師查拿，並咨沿海各省稽查。

由此章程，可見當時海禁之嚴，同時也可見當時主權之尊。不過此時英國已歷產業革命，必欲在中國取得通商自由。於是於道光二十年藉林則徐嚴禁鴉片入口的問題，先後用海軍進攻沿海各地如廣州、廈門、定海、鎮海、寧波、上海、白河，以及自上海至南京各地。清廷不得已，於道光二十二年與英國締結南京條約，爲不平等條約的開端。該約除規定賠款及割讓香港外，尙有以下二要點：

一、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爲通商埠，這是解放東南的海禁。

二、兩國往來文書用平等款式，這是承認中國只是世界的一國之初步。

接着美法二國又於道光二十四年先後援例締結修好條約，於是中國遂由閉關的國家，被新式武力的壓迫，不得不變爲半開關的國家。所以說鴉片戰役是中國大變局的開端。大變局雖

已開端，然當時的政府及士大夫既不了解西洋，也無一點覺悟，更談不到什麼準備。

鴉片戰役以後十四年，即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又因廣州開放問題及亞羅船事件，引起中英衝突，可說是鴉片戰役的延長。自衝突發生以後，英國聯合法國攻陷廣州，占領三年，復以聯軍由廣州至白河攻陷大沽，迫訂天津和約，更進兵攻陷北京，迫訂北京和約。其時中國正苦於太平天國之亂，政府不得已，一一允諾英法的要求，乃得於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年）宣告了結。此次和約中的要點如下：

一、中國與英法二國互派公使，以西洋禮節相見，這是完全承認西洋諸國與中國同等。

二、除五口通商外，更開牛莊、登州、台灣、瓊州、淡水、天津、南京、鎮江、九江、漢口等地為通商口岸，這不但是將海口完全開放，並且將內河也開放了一大部分，使外國勢力由外海深入內河。

三、教士得入內地游歷並自由傳教，這是後來一切教案的先河。

四、外國人在中國境內享有領事裁判權，這是中國司法權不適於外國人，致外國人處於特殊的地位。

五、各通商口岸除商船自由航駛外，並許外國兵船得自由停泊並遊弋。這是使中國沿海及沿江一切口岸失其險要，而處處時時受外國軍事的威脅。

六、關稅協定爲值百抽五，這是使中國關稅權失其自由，不得用關稅保護本國產業。

七、最惠國條款，這是使後來列強援例要求一律待遇，喪失國權於一國，即喪失國權於列強，增加外交的糾紛，引起列強的競爭。

看了以上七項，便知英法和約幾集不平等條約的大成。從此中國門戶洞開，國權大失，重重鎖鍊縛着中國，致至今尚不能恢復獨立和自由。從前外國要求平等待遇，中國不肯與他，現在竟由平等待遇而享有特殊待遇了。從前爲獨立自尊的國家，現在爲處處感受壓迫的國家了。從前爲深固閉拒的鎖國，現在爲列強深入，任人擺佈的國家了。經過這番空前的鉅創之後，古老的中國，在極少數人的心目中，始有一點小小覺悟。那一點小小覺悟，可以叫做「自強」運動。咸豐十年欽差大臣恭親王奏等奏說：

探源之策，在於自強，自強之術，在於練兵。現在操防雖成，而國威未振，亟宜力圖振興，使該夷

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以期經久無患。况髮捻等尤宜迅圖勦辦，內患除則外侮自泯。
(見近代中國外交史料輯要上卷)

當時比較了解自強的必要之代表人物，當推李鴻章。他於同治十一年說：

竊維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互古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東西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來一大變局也。(見覆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摺)

他又於光緒元年說：

今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爲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械之精，工力百倍；又爲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見因台灣事變籌畫海防摺)

中國經鴉片及英法聯軍兩次戰役以後，確已成爲數千年來一大變局。惜乎像李鴻章這樣了解當時局勢的政府當局，既是絕無僅有，而多數士大夫的腦海又爲頑舊之說和夷夏之見所

充塞，對於當時所謂「洋務」一概加以反對，同文館加設算學一館，召集正途員生學習，當時所謂「理學名臣」倭仁卽以「變而從夷」極端非難，可爲例證。因此自英法聯軍至甲午戰役以前的自強運動，只限於外交與軍事方面，及與外交軍事有直接關係的事業。綜計自一八六〇至一八九四年前三十四年間所辦應付「大變局」的重要事項如下：

一、咸豐十年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爲中國創立中央外交機關的先聲。

二、同治元年創立京師同文館，二年設上海廣方言館，三年設廣東方言館，學習外國語言文字，以造就所謂洋務人材。

三、同治四年創立上海製造局，其後又附設機器學堂及翻譯館。六年天津、金陵，光緒三年四川、七年吉林等地相繼設立機器局廠。

四、同治五年創立福建船政局，附設船政學堂，以造就駕駛與製造人材。

五、同治十一年派幼童赴美留學，光緒元年二年及七年派福建船廠學生赴美習船政，二年派軍官赴德學習。

六、同治五年初派斌椿赴西洋游歷，六年派志刚出使歐美。光緒元年初派出使日本及美國大臣。光緒四年派曾紀澤出使英國，六年改派出使俄國。十五年派薛福成爲出使英法意比大臣。七、光緒元年李鴻章督辦北洋海防，始購砲船。六年創設北洋水師學堂。十一年初設海軍衙門及南京水師學堂。十三年，設廣東水師學堂。十四年北洋海軍成軍，以丁汝昌爲提督。十七年校閱海軍，丁汝昌率海軍至長崎，日人嘆爲不如。

八、光緒十一年創設天津武備學堂，以求「盡敵之長，制敵之命」。但陸軍以舊人過多，舊習過深，在甲午以前，尙未及大改革。

九、同治十一年創設輪船招商局，光緒七年遣公司船赴英貿易。光緒五年初設天津電報學堂，同年天津大沽關初設電報。自是以後至二十年全國陸線及海線大部相繼完成。光緒七年初修唐胥鐵路。十四年由閩莊延長至天津。十六年漢陽鐵廠兵工廠成立。十九年湖北設繅絲、紡織、製麻、織布四局。

原來此期中國的自強運動，乃以受了西洋壓迫而起，在三十餘年中只做了以上九項事業。

中的一點初基。同時日本也因受西洋壓迫，整個維新，雖在海軍方面不及中國，然在其他方面則均超過中國，積極想法抬頭，並向外發展。光緒二十年竟藉口朝鮮問題造成中日戰爭，致李鴻章等所經營的自強事業，完全宣告失敗，因而中國的大勢局遂轉入另一時期了。

三

朝鮮本爲中國的屬邦，以與日本鄰近，日本久欲取而有之，以爲實行大陸政策的根據地。會光緒二十年東學黨亂起，日本據光緒十一年天津條約，出兵朝鮮，亂事既平，日本不肯撤兵，並強迫中國軍隊退出朝鮮，同時襲擊中國海軍。於是中國被迫倉皇應戰，海軍既大敗於黃海，陸軍復敗於東北。英法聯軍以後李鴻章所一手苦心經營的北洋國防，從此歸於消滅。中國不得已，與日本講和，訂成馬關條約，要點如下：

- 一、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及其附屬島嶼，澎湖列島。
- 二、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爲通商口岸。

中國的大變局與「非常時」

三通商口岸允日人自由從事各種工業製造，致國貨更不能與外貨競爭。

四、其他一切享受最惠國條款待遇。

遼東半島以俄德法三國干涉而退還，但增加賠款，共賠了二萬三千萬兩了。

經此戰役以後，中國的大變局更加深刻化。與甲午以前顯然不同的，有以下兩點：第一甲午以前，日本尙未能十分與中國抗衡，但甲午以後，則日本忽然躍起，積極與歐美列強在中國競爭勢力。北進取得朝鮮做根據，南進取得台灣做根據，繼續向中國的大陸取進，於是中國從此就不僅爲歐美列強所苦了。第二甲午以前歐美列強尙未敢十分小視中國；但甲午以後則羣欲效尤，爭起染指，致領土與主權相繼喪失甚多。沿海良港如大連，旅順，威海衛，膠州灣及廣州灣既爲英，俄，法，德等國所強占，而全國領土復被強分爲所謂勢力範圍，至成初步的瓜分。至鐵路稅關郵政等主權的喪失更不可勝計了，列強在爭奪中國的進行中，有欲和緩列強衝突，而設法保持列強在中國的均勢的，便是美國所提出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不滿意於國際均勢，而出於武力爭奪的，便有以中國領土爲戰場的日俄戰爭。原來日俄兩國在列強中比較有領土野心。日本的

大陸政策與俄國的東進政策直接衝突致釀成戰爭。其結果俄國勢力由全滿縮至北滿，而日本勢力由朝鮮伸至南滿。於是朝鮮爲日本正式吞併外，又取得大連旅順爲海軍根據地，南滿鐵路爲經濟策動所。田中義一所謂侵略全中國的司令塔，便從此立了一個根基。然當時日本國勢雖大張，而實力尙未充足，故與俄國所訂的和約，猶有幾分均勢的意味。中國雖在列強均勢的局面之下，得暫且維持殘破的生命，然以一個富有歷史與文化的大國屢遭外交的失敗，自不甚甘心。由多年的積憤，造成一種對外反抗的運動，便是庚子的拳變，拳變的方法雖極幼稚，而其根本動因，則在發洩對外的積憤，不然的話，便無由造成當時朝野一氣的舉動。不幸這種舉動，引起八國聯軍，又遭一次對外大大的失敗。這次最大的損失，在物質方面，是鉅額的賠款；在精神方面，是對外思想的消沉。

因甲午對外失敗，引起一種變法運動。此運動由康有爲、梁啓超等倡導，造成戊戌百日維新的局面。但以帝后爭權與新舊衝突而遭夭折。又因庚子對外失敗，維新運動乃復起。此復起的維新運動與前次的維新運動之僅僅發動於康梁諸人的不同：第一在中央有西太后等親貴藉維

辦來掩飾對外的失敗，以求延長滿清的生命。第二在地方有封疆大吏如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欲藉維新以圖振作。第三在野方面有梁啟超等，仍繼續鼓吹維新。經此各方面的努力，維新運動見於實行的重要事項，有以下數種：

一、廢科舉，

二、興學校，

三、預備立憲。

爲預備立憲，雖已設立資政院與諮議局，然正式國會清廷尙遲遲不肯召集。因此一般人民遂多覺清廷對立憲無誠意，由維新運動趨向革命運動。原來革命運動由孫中山、黃興、章太炎等所倡導，發端於中法之役以後，復起於甲午之役以後，大盛於庚子之役以後。對外失敗一次，革命運動便激化一次。至光緒卅一年同盟會成立，革命運動的形勢，遂超過維新運動。其最大原因在清廷對外既迭次失敗，無以發揚國民的精神，而對內又死死抓住政權，不肯尅期真實立憲，無以寄託國民的希望。故黎元洪等在武昌起義，全國卽行響應。清廷雖倉卒起用袁世凱，組織非親貴

的內閣，頒佈十九信條，也不能挽回頹勢，滿清的命運固從此完結，即中國兩千餘年來君主專制政體也從此推翻。南北議和，民國統一，列強承認，氣象一新，這是對內改革的一次大成功。如果袁世凱及其部屬能遵守約法，保障自由，領導國民，努力建設，則中國的新政治制度，可以從此樹立，而國防、經濟以及教育各方面，也可以從此大進了。不幸袁世凱及其部屬私心自用，既盡量壓迫異己，如刺殺宋教仁，解散國民黨，又盡量破壞憲政，如廢止臨時約法，解散正式國會。如此猶以為不足為所欲為，更假名籌安，實行帝制，取消信誓，背棄民國，雖對外受「二十一條」要求的屈辱，亦所不辭。於是激起反抗，造成「護國之役」，即其部屬也起而倒戈相向，以梟雄稱於一世的袁世凱畢竟不得不死於民意之手了。不過袁世凱雖死，而民國初元所建立的新政規模也無由重立。中國遂從此陷於長期內亂的局面，自然談不到什麼對外。中國因對外失敗所引起的對內改革，既遭此次的挫折，因而中國在國際的地位又踏入「非常期」了。

四

當袁世凱準備稱帝的時候，正是歐戰剛剛爆發的時候。日本乘此時機，假借對德作戰爲名，始而攻佔青島，繼而強迫袁氏承認二十一條要求。於是中國由國際均勢的局面進入日本獨霸的局面，而成爲非常期的發端。此次袁氏所擅允的重要條件如下：

- 一、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讓與日本；
- 二、承認日本在南滿及東蒙享有優越地位；
- 三、承認漢冶萍公司由日中合辦；
- 四、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借與他國。

從此日本的勢力，便由南滿進到東蒙，更進到山東，並且在消極方面遭到沿海各地了。其後日本又利用北京政府，大借西原借款，造成中國南北對峙的局面，以便獲得種種權利。因此引起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五四運動。中國在巴黎和會雖遭失敗，然在華盛頓會議却爭回稍許權利，勉強抑止日本侵略的野心。五四運動的原來目的本在對外，不意一變而爲新文化運動，純成對內問題。新文化運動的着眼點，本在徹底改造文化，解放思想，然其結果不是流於世界大同的空

想即是陷於個人主義的病毒。政治既已解體，而精神又復解體。無論世界大同或個人主義的思想，都走向反國家的路上去了。當此思想界大解放並且大混亂的時候，所謂共產運動乘之而起。共產運動是以俄國爲背景的。俄國革命以後，旗幟雖完全改變，然骨子仍舊要稱霸世界。首在歐洲進行共產運動，迭遭失敗，乃轉變方向在中國策動。於民國九年派人攜款到中國來收買智識分子組織所謂中國共產黨，以「打倒帝國主義」與「打倒軍閥」爲口號。十二年俄國又命令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造成聯俄容共的局面。因此國民黨得由廣東迅速的發展到長江流域，同時共產黨也得掛羊頭賣狗肉的大大活動。十六年以後國民黨雖實行反共，然共產黨又受俄國的命令，改行暴動政策擾亂廣東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福建浙江省等，政府竭數年和數十萬大軍的力量，迄未完全肅清。近年又由中部擾亂到四川，與陝西甘肅的匪軍，採取聯合行動，打通所謂國際路線，實行「武裝擁護蘇聯」。以農立國的中國鄉村，被共產黨底破壞，造成近年的經濟恐慌。而兩湖四川以及陝甘等省約近十萬的共匪武裝勢力，又成中國獨立和統一運動的大障礙。這種內亂兼外患的共匪武裝擁護蘇聯運動，是俄國侵略中國的急先鋒，已使中國受到致命傷。

當共禍正猖獗的時候，日本又來一次曠古未有的九一八大事變。這次大事變，在外表上雖似是突發的，然在實際上，仍爲數十年來日本大陸政策的繼續狂進。中國誤於既不抵抗又不交涉的混頓政策，致不出二年，東北四省全部失陷，豈止日蹙百里！上海的抗戰，只留下一點歷史的紀念。長城的抗戰，又成爲城下之盟的「塘沽協定」的下場。塘沽協定只是將對日問題延緩下來，並未將對日問題根本解決。所以到了今年上季，南京政府在華北的勢力被迫總退卻，日本猶認爲不滿足。現在又要求澈底取締排日，華北五省自治與所謂共同防衛赤化。至於所謂中日滿三國經濟提攜，也在強迫承認之列。所謂取締排日，便是要中國國民在精神上屈服於日本所謂華北自治，便是要硬建第二傀儡政府。所謂共同防衛赤化，便是要在中國取得軍事行動自由。所謂經濟提攜，便是要在經濟上完全控制中國。總說起來，便是要一步一步的將整個中國置於日本統治之下。因此中國遂有不能獨立生存的危險。

由上說來，中國刻下已處於日俄兩重勢力夾攻的危急狀態之下。俄國的急先鋒即共產黨越猖獗，對日問題便越難應付。日本進逼越迫急，勦匪問題便越難解決。兩種勢力相反而相助，使

中國陷於左右爲難的苦境。專力對日罷，共匪又乘其後。專力勦匪罷，日本又進逼不已。目前中國的險狀比較明末的情形實有過之而不及。日本彷彿是當年的滿清，共匪是有國際背景的新自然要求，不是出於我個人的杜撰胡說。中國主義是中國今後起死回生的應時辦法，不是復古的守舊，也不是蹈空的幻想。現在先說明中國主義的基本原則如下：

中國主義的第一個基本原則是：中國是整個中國人的中國，凡是中國人才有權利和義務去過問中國的事。凡非中國人便沒有權利和義務去過問中國的事。凡原屬中國人而不問中國的事，或者幫助外國人干涉中國的事，便是自外於中國，不應在中國人之列，甚至可以視爲漢奸。凡原非中國人而強迫干涉中國的事，便是中國的敵人，應極力予以抵抗。中國只可由純正的中國人來自己解決自己國家的事。

中國主義的第二個基本原則，是中國國家是中國民族生存保障的集團。這個大集團是經過五千年來先民的艱苦創造而來。我們要將這個大集團的生命永遠延續下去，必迫我們個個人不但要求個體的生存，並且要求全體的生存；不但要求物質的生存，並且要求精神的生存；不

但要求及身的暫時生存，並且要求後代的永遠生存。我們生存的最大意義，全在國家的尊嚴和民族的繁榮之上。如果國家的尊嚴被人忽視，民族的繁榮被人摧殘，便是使我們失去生存的意義。我們必得犧牲一切，以維護國家的尊嚴和民族的繁榮，然後整個集團即國家才有生存的可能。

中國主義的第三個基本原則，是從歷史上遺傳下來的統一和完整的國家，絕對不許割讓也絕對不許分裂，只有促進國家的統一，才能鞏固內部的團結。只有維護國家的完整，才能抵制外部的侵略。凡以外國做背景而從事國家分裂運動者，即是為敵人張目的漢奸，應在不赦之列。凡中國的寸七尺地，都是先民歌哭的塋所，今人生存的根據，我們不能任其喪失，更不能聽其分裂，我們要用鐵血守護國家的統一和完整。

中國主義的第四個基本原則，是一個超個人，超地方，超黨派的全體國民的共同理想。一個國家之所以有內亂，由於只有以個人或地方或黨派為前提的個別理想，而沒有以國家為前提的共同理想。有了超個人，超地方，超黨派的中國主義之共同理想，則一切人們便有共同努力的

目標可在國家利益之下互相犧牲個人地方和黨派的利益，以盡量減少內亂。一個國家之所以有外患，也由於國民只知個人，地方或黨派，而不知整個國家。使得敵人利用此弱點以爲侵略的。李自成張獻忠。一切漢奸是當年的洪承疇與吳三桂。而政府的權威又不及崇禎帝。如果歷史有重演的可能，中國實已到了生死關頭，真令人不寒而慄了。中國的大變局，變到現在，局部亡國已成事實，整個亡國也有危險。我們中國人是聽其亡國，甘作奴隸呢？還是自作主人，守護國家呢？這就全恃我們中國人的自決。

五

目下中國的危機已如上述，而今後三五年以及十年內的危機，或者還要加倍厲害，也在意料之中。不過危機越大，轉機也大，兵法上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也可適用於今日中國的境地。原來中國自秦漢以來即爲一個大一統的帝國，國內可以安於一種自足的農業經濟，在國際又無足以與牠比較的文化國家。從前一般人心目中的中國，幾等於世界環繞中國。

的小國，不過視爲蠻夷，施以懷柔政策即夠應付。在歷史上雖有數度外族入主中原的故事，然以中國固有文化的深厚與民族吸引力的博大，終得同化外族，恢復故物。可是近百年來，中國的國際環境完全改變了。閉關的中國成爲門戶洞開的中國，大一統的小世界，成爲列強競爭的大世界。經濟自足的中國成爲貿易交錯的中國。總之中國由一統天下被逼入於新戰國時代的世界。中國在此新國際環境中，必得講求新的適應方法始能生存。近百年來一切對外和對內的改革，都是在講求適應新國際環境的方法。不過因傳統勢力過大，傳統觀念過深，致一切新改革不能繼續的澈底的貫徹，而收到實際的效果。加以改革的意見也不致，致互相抵消，互相毀壞，無由表現整個的力量。貽誤到現在，國際環境更逼着中國走向最後的關頭，是生呢？還是死呢？是存呢？還是亡呢？在這種最後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中國人不容不有一個堅定的決心和共同的信仰，以保國家的生存。在層出不窮的國難刺激之下，將我們中國人從和平的夢想和享樂的迷醉中，喚出一個新的國家觀念來。表現這種新的國家觀念的具體名詞，便是「中國主義」四字。因近年國難的嚴重，「中國主義」已漸次形成全國的共同信仰，而一致決心走向這條生路。今後也

只有決心信仰中國主義，才能將中國的危機轉成生機。

「中國主義」在一般不甘爲亡國奴的人的心理中，或者還有的只是一點輪廓的概念，而未完全具備詳細的內容。所以我現在要將中國主義詳細解釋一番。中國主義是一種集團生存法門。如果每個國民，在精神上有一條「中國主義」的國防戰線，敵人便無所施其技了。所以要抵禦外患，戢止內亂，只有在國民精神上建立起一個超個人超地方並超黨派的中國主義共同理想。「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家不存，個人、地方和黨派又附在什麼地方呢？不求整個國家的生存，而只求個人、地方和黨派生存的，就是國家的罪人，民族的盜賊。

中國主義的基本原則，約略有以上四個。這四個基本原則，並不是我個人的什麼發明，而是稍有中國國家觀念的人之共同要求。我們中國人，如何才能渡過非常時的難關，只有信仰中國主義，如何才能建設未來的新國家，只有實行中國主義。關於實行中國主義的具體方法，以說來很長，擬另作專文說明，本篇暫且於此告一結束。

國防中心論

（見二十四年十二月國論第十卷第一期）

精神統一與政治統一

一切國家生存的必要條件，至少須具備兩個：一個是「統一」，又一個是「獨立」。就對內說，必須統一始能生存，就對外說，又必須獨立始能生存。如果一個國家對內不能統一，便必陷於混亂，甚或形成幾個國家，致原來的國家歸於瓦解。同時如一個國家對外不能獨立，便必陷於屈辱，甚至夷為他國的附庸，致自己的國家歸於滅亡。統一與獨立對於一個國家的生存，既如此必要，所以政治學者論定國家成立的要素，無不重視統一與獨立，而用「主權」一個名詞統括之。拿主權的名詞做論題來說，統一與獨立便是他的兩重必要屬性。對內主權須能表現「統一性」，對外主權須能表現「獨立性」。如此方能算做一個完整的國家。時無論古今，地無分中外，一

切國家要保持他的完整，便得要求統一與獨立，這是人類一致的心理。

不過就歷史的事實看來，有的國家有時統一生了問題；有的國家有時獨立受了威脅；更有有的國家有時統一既生了問題，而獨立又受了威脅，於是國家便到了生死關頭。單只統一生了問題的國家，無論混亂時期經過多久，總得一致要求再行統一，不然勢必分裂為幾個國家，單只獨立受了威脅的國家，無論屈辱程度到何種地步，也總得一致要求完全獨立，不然勢必漸次歸於滅亡。統一生了問題而獨立又受威脅的國家，於理論上似宜同時要求統一與獨立，然在情勢上又每每不能兼顧。強求兼顧，則必陷於進退失據，左右為難的絕境，在此種絕境之下，自然而然後生「先求統一後求獨立呢？還是先求獨立後求統一呢？」的問題。先求獨立罷！這是每個國民心理上的急切要求，然而力不若人，勢不能戰，急切強求獨立，每每得到愈不能獨立的結果。況且內部既不統一，即已失去國家生存的一個最要條件，常易招致外患，漸次使國家完全喪失獨立的資格，又如何急求獨立呢？「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是自古及今的國際事業。「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是值得反省的先哲格言。明瞭了這個事實和格言，便知其求

統一爲一切國家先務之急了。

更進一層說，統一與獨立雖在理論上同爲國家生存的必要條件，然在實際上偶有統一而不能獨立的國家，絕無不統一而能獨立的國家，——從前閉關時代，不統一的國家或有僥倖獨立的；現在世界交通時代，不統一而能獨立的國家，則絕無其例。一個國家如果不幸同時陷於不統一又不獨立的險狀，在救濟的程序上，統一的要求似乎急於獨立的要求。這不是說不要求獨立，而是說須先求統一而後才能要求獨立。彷彿統一成了獨立的前提，統一的前提不備，獨立便無從求起。近代的國際鬥爭與從前迥然不同：從前的國際鬥爭，多只限於甲國朝廷與乙國朝廷的鬥爭，而不十分與一般國民相關。而近代的國際鬥爭，則是甲國整個集團與乙國整個集團的鬥爭，每一國的全國上下都要休戚相關，從前的國際鬥爭，多只限於軍事的鬥爭，而近代的國際鬥爭，則是整個國力的鬥爭，不僅限於軍事，即除軍事的鬥爭外，尚包含有經濟交通以及教育文化的鬥爭。要將國家完成一個整個集團，運用整個國力，以從事國際鬥爭，也必得先行完成國家的統一，國家統一了，才能產生整個的集團。國家統一了，才能運用整個的國力，由此可知求統一

是求獨立的必要準備工作。忽略了這種準備工作，空言對外，急切對外是於國家有害無利的。至少也是利少害多。

總說起來，統一無辦法，獨立更無希望。故欲求獨立，必先求統一。這是一個國家到了生死關頭必由的路徑。

一一

統一對於國家生存的必要性，一般人們或者約略知道一點。不過一般人們心目中的所謂統一，每每過于着重形式方面。而忽略了精神方面。統一的精神方面，可以簡單叫做「精神統一」。統一的形式方面，可以叫做「政治統一」。本節於此兩方面的分別和關係，試加以說明。

國家統一的形式，是政治制度問題，如國體政體等問題。這種形式，各時代的各國家不必全同，也不必完全同，只要能夠完成某種程度以內的政治統一，便可以了。至於精神統一，則為立國的根本所在。具備了精神統一，才能完成政治統一；喪失了精神統一，便要失却政治統一，故欲求

政治統一必先求精神統一。現代各國政治統一的形式，雖有種種不同；或者是君主制或者是民主制；或者是憲制，或者是獨裁制；或者是單一制，或者是聯邦制；然在精神統一方面，則有一個幾乎完全一致的基本觀念，那便是：

國家無上的基本觀念國家超於一切的基本觀念

所謂「國家無上的觀念」，在積極方面要求每個國民以國家爲前提，對於國家直接或間接有所盡力，在消極方面要求每個國民抑制個人、地方以及一切派系的私見所發生的衝突，免得妨害了國家的統一。一個國家具備這種觀念的國民數多一分，國家統一的可能性也就多一分。每個國民都具備了這種觀念，國家的統一才能完全告成。此種觀念對於國家政治統一的關係既如此重要，所以近代國家無不特別注意培養此種觀念，培養此種觀念的基本標準，總括的說，是要求全國上下以國家爲前提，而在國家緊急時期，更特別要求全國上下以國家爲前提。分析的說，便是國家超於個人、國家超於地方、國家超於一切派系。如個人、地方以及一切派系的利益與國家衝突，便須一致抑制個人、地方以及一切派系的利害，以顧全國家的利害。能如此的

國家，乃能保持國內的和平，使國家漸次歸於統一。不能如此的國家，必長期陷於混亂，而趨於滅亡。近代各國培養此種基本觀念的主要方法，大約有以下數種：

一、用各種教育的方法養成國民以國家爲前提的觀念，使其知爲國族而奮鬥，并爲國家犧牲個人、地方和一切派系的利益。其中最要的教育方法是強迫教育——即國民教育或義務教育。次要的方法爲政治教育，即概括一切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中關於政治方面的教育，並普及的提高的養成國民以國家爲前提的觀念。

二、用徵兵的方法，強迫國民入伍，受正式的軍事訓練，養成健全體格，組織習慣，服從精神，作戰能力，以備必要時能夠親入戰場保衛國家。

三、利用與國家生存有密切關係的事件或時機，儘量喚起國民愛國的情緒而予以獎勵，同時并抑制國民自私的心理而予以懲責，使知愛國者爲無上之榮譽，不愛國者爲無上之恥辱，這即是以愛國爲道德的最高標準，使國民都向此最高道德趨赴，久而久之，自然國民無不愛國了。

四、執政者自認爲國民的公僕，公忠爲國服務，不避責任，不曠職守，不違法律，以示範於一般

國民同時確認國家是全體國民的公物，不專屬於任何一人一地或一派，故任每個國民都有爲國服務的均等機會。關於政見縱不免有種種差別，只要在國家範圍以內，即須互相尊重，互相容忍，不以政權在握即肆意摧殘，激起反感，也不以政權不在握即不顧一切倒行逆施。如此才不致把「政爭」變成純粹的私爭，因而養成一切從政者的最高道德。在國家危急時，尤須有舉國一致的精神。故雖素行政黨內閣的國家，也多採行「戰時國防內閣」或「國民內閣」。如歐戰時的英國內閣及最近麥克唐國民內閣，即其一例。能如此的國家，則能應付國難，保持統一。不能如此的國家，則必貽誤時機，招致外患。

近代各國多用以上四種方法，培養國民以國家爲前提的觀念，而漸次造成全國的精神統一。因之政治統一也相繼完成。這種精神統一，是超乎任何個人、任何地方，以及任何派系的全國的共同信仰。一切個人、一切地方，以及一切派系都站在這種共同信仰之下，雖不必用武力或恐怖，可使國家漸次歸于統一。不站在這種共同信仰之下的任何個人、任何地方，以及任何派系，雖用武力或恐怖強求統一，也未必能統一。縱萬不得已而對內偶用武力，也要國民公認這種戰爭。

的勝敗關於個人成敗的成分少，而關於國家興衰的成分多，才有成功的可能性。全國國民都有以國家爲前提的共同信仰，政治可在任何形式之下統一起來。沒有這種共同信仰，雖在任何形式之下，政治無從統一，所以我說精神統一，重於政治統一。要完成政治統一，必須先行培養精神統一，即培養以國家爲前提的共同信仰。本來愛國的心情，是每個國民生來就有的，不專屬於任何個人任何地方以及任何派系，但須加以培養，才能戰勝一切個人、一切地方以及一切派系間的私見，而成功一個以國家爲前提的共同信仰。現代各強國對於這個共同信仰都已養成，所以政府統一早經完成。至於尙未養成這種共同信仰的國，則自然多在衰亂混亂之中了。

二

國家的政治統一既須以精神統一爲基礎，乃有成功的可能。那末要求國家的統一，不可過重政治的統一，而忽略了精神統一。一個國家如果不幸陷於政治不統一的狀態，凡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們都有要求統一的傾向。不過這種傾向每每偏在政治方面而忽略精神方面，致愈求統

一面愈不能統一其中最大的癥結所在不外三種：

一、張三要求由他一個人一手統一國家，李四也要求由他一個人統一國家。大家最初的發心，也許都是爲的國家。然而國家只有一個，你讓由你一個人統一，他也想由他一個人統一，結果彼此不能相容，勢必出於決戰一途。決戰下來大家同歸於盡，或彼此無可奈何，或一勝一敗而準備繼續作戰。這樣徒然斲喪國家的元氣，那能促成國家的統一呢？這種癥結所在，便是只知以個人爲前提，而不知以國家爲前提。只知以個人爲前提者，只能搞亂國家，決不能統一國家。

二、單純以個人爲前提，決不能統一國家，似已爲一般人所知道。於是以個人爲前提的觀念，每每化裝一種地方勢力。這個地方想用他的勢力統一全國，那個地方也想用他的勢力統一全國。彼此之間形成一種對據的形勢，各不相下。這個地方想兼併那個地方，那個地方也想打倒這個地方。結果又必出於決戰一途，相斫相殺，循環不已，等於自己毀滅自己，怎能統一國家？這種癥結所在，便是只知以地方爲前提，而不知以國家爲前提。只知以地方爲前提者，只能分裂國家，決不能統一國家。

三、以個人爲前提的觀念，又每每化裝爲一種派系勢力。這個派系想用他的勢力統一全國，那個派系也想用他的勢力統一全國。彼此之間，形成一種你死我活的形勢，各不相容，幸而勝利的，則不顧一切，毀滅一切，彷彿以爲自己的最後勝利，即在於澈底毀滅他人。不幸而失敗的，也不顧一切，推翻一切，彷彿以爲自己的再度復起，即在於根本推翻他人。然而要毀滅的，未必能立即毀滅；要推翻的，也未必能立即推翻；於是造成此起彼伏的黨爭，使國家永遠陷於混亂之中。即令較有勢力的派系，將其他的派系完全毀滅完了，而其本身也必派中有派，系中有系，五花八門，明爭暗鬥。其內鬨的程度之劇烈，往往出人意料之外，結果，本身亦將歸於消滅。這種癥結所在，便是只知以派系爲前提，而不知以國家爲前提。只知以派系爲前提者，只能毀滅國家，決不能統一國家。

以上三種癥結是一切國家由不统一到統一的最大的主觀障礙。這三種主觀障礙不除，決無法減少統一的客觀障礙。一切從事政治運動的人們，以爲國家統一的障礙，只在他人而不在自己；只在客觀，而不在主觀。所以一心一意集中精神去掃除他們心目中所認定的客觀障礙，其

實這樣做下去，所謂客觀障礙，越求掃除，越發加多。因為國家的事情只有在涵蓋一切的國家之大前提之下，才能化障礙為輔助，化敵對為合作。如只以個人、地方及派系為大前提，而置國家於第二位或更不加開問，則一切皆成仇讎，無一而非障礙。障礙層出不窮。斯統一永無希望。始而以爲最大的障礙，在其心目中的所謂敵人。敵人幸而掃除了，而所謂同志，又相互變成敵人，彼此掃除，永遠不盡。故我以為國家統一的最大障礙，不僅在他人，而且在自己；不僅在客觀，而且在主觀，能克服自己的主觀的障礙的人們，才能克服他人的客觀的障礙。

四

一切國家由不統一到統一的過程，因種種關係，功夫有難易，時期有長短之別。大概說來，統一小國的工夫較易，時期較短；而統一大國的工夫較難，時期也較長。統一歷史較短文化較少的國家，功夫較易，時期較短；而統一有歷史有文化的國家，則功夫較難，時期較長。能用舊形式統一的國家，功夫較易，時期較短；不得不用新形式統一的國家，則功夫較難，時期較長。沒有外國勢力的

侵略入國內的國家，統一功夫較易，時期較短；面有外國勢力侵入國內的國家，統一功夫較難，時期較長。無強鄰逼處的國家，統一功夫較易，時期較短；面有強鄰逼處的國家，則統一功夫較難，時期較長。富於愛國精神的國家，統一功夫較易，時期較短；而缺乏愛國精神的國家，則統一功夫較難，時期較長。能對外作戰的國家，統一功夫較易，時期較短；而不能對外作戰的國家，則統一功夫較難，時期較長。有特出的政治家的國家，統一功夫較易，時期較短；而缺乏特出的政治家的國家，統一功夫較難，時期較長。明瞭了這種種事故，對於國家統一的密切關係，就可知道一切國家何以有的易於統一，又何以有的久久不能統一。

現在假定在一個大國用新形式做統一功夫，一面有很久的傳統歷史和文化，與政治的新形式衝突，而一面又有極複雜的外國勢力阻礙政治的新統一，那末，就應當有以下幾種認識。

一、須認識這種國家新統一的工作最難，非短期所能成就，亦非及身所能完全成就。欲完全真正的統一，恐至少需要二十年至三十年，而統一完成以後，還須加作二十年至三十年的建設功夫。一個人的能力有限，只能做一部的的工作，其他的工作，則須讓給他人去作。一個人的生命有

限，只能做一段的工作，未完的工作，則須讓給後人去。

二、須認識對外問題必依據一個遠大的計劃，而用坦當的氣魄做去，始能解決。最忌「避責」，最忌「長拖」，最忌完全被動，任人擺佈。最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最忌顧慮多端，舉棋莫定；最忌到處乞憐，抓沙抵水。能去此六忌，則任重大的對外國問題，終久必有解決的途徑。不能去此六忌，則必使小問題變成大問題，大問題變為更大的問題，致國家所受的損失更大。須知能從遠大處着想，能為國家減少損失，也是好的，但是無論如何，不要忘却國防的準備。

三、須認識對內問題必依據遠大的計劃，從深實處多用功夫。這個遠大計劃，須能涵養全國人民的精神，相率共同趨赴，不單為一部分人着想，如此乃能使全國人民對於國事發生密切的觀感，覺得國家的成功，就是個人的成功，國家的失敗，就是個人的失敗，而樂於為國家努力。原來統一的工作，是必須待全國人民共同努力的，有權為國努力的，固須切實努力，同時也得讓全國人民有為國努力的機會，使其不致流於頹廢，激為非常。尚未直接負國家責任的人們，須知成功不必自我，樂得國事有人負責，而自己但求在可能範圍以內，體驗時艱，埋頭做去而已。

焉，須認識一個國家已經到了非常時期，只有舉國一致，才能渡過最後難關。一切個人、地方及派系間互相爭鬥的理論和方法，已經不能適用。目前在緊急時期，只有希望現狀逐漸改進，以促成統一的完成。他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成功。如其不然，則相斫相殺的結果，就無異於鹬蚌相持，漁人得利了。人之愛國，孰不如我？人之欲善，又孰不如我？國人倘能如此相諒，自然善端漸次萌生，國勢有轉好的可能。凡在非常時期從事政治運動的人們，亟宜培養這種大政治家的風度，乃能突破一切相忌相殘的惡習，而一致為國努力。

以上四種認識，是一個國家到了非常時期應有的認識，有了這幾種認識，才能將國家的危機轉變為生機。沒有這幾種認識，則國家的危機，必日益增多，最後或不幸至於不可救藥了。總說起來，全國人民須認識時勢的危險，共同以國家為前提，對內對外均從遠大深實處用功夫，求收效於二三十年以後，這是求國家生存的最要途徑。循着這個途徑做去，然後國家可漸次完成真正的統一。

（見二十四年七月國論第一卷第一期）

夾攻中的奮鬥

陳啟天

近年中國最大的危機，在什麼地方呢？我可先簡單的答復一句，在日俄繼續不斷的夾攻。中國處在這種夾攻形勢之下，幾乎不易奮鬥出來，所以成了最大的危機。原來日俄兩國對我國的夾攻，不始於近年，而始於四五十年之前，在近四五十年中，日俄對我國所以形成夾攻形勢的根原因，在日本的大陸政策與俄國的遠東政策。同以中國為爭奪的目標，立於絕對衝突的地位。日本的大陸政策，自明治時代確立以來，一天一天的推行並擴大，沒有絲毫根本改變，固不待說。即俄國的遠東政策，也未因革命而有所根本改變。帝俄時代與蘇俄時代的遠東政策，在目標方面，是一樣想爭奪中國；不過在手段方面，蘇俄時代較帝俄時代為更巧妙，並且毒辣而已。因為蘇俄的遠東政策，在手段方面與帝俄稍有不同，所以中國在日俄夾攻中的形勢，可分為兩個大階

殺來說。

第一個大階段，自甲午戰役至俄國革命，即自光緒二十年至民國六年。甲午戰役是日本大陸政策的正式開場，也是日俄夾攻形勢的正式開場。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即積極開始準備實現大陸政策。光緒二十年日本藉口朝鮮亂事問題，進兵朝鮮，事後不肯撤退，更進一步向中國宣戰。當時中國政府全無一點對日作戰的準備，以致倉皇應戰，海陸兩軍全部失敗。結果，中國除賠款外，又割遼東半島與朝鮮，原來俄國也想染指於朝鮮及滿洲，戰事結果如此，自不免有些醋意。同時當時負外交責任的李鴻章也想聯俄制日，於是造成三國干涉遼東的事件，並訂立中俄密約。三國干涉遼東雖似是戰敗後對日外交的一種勝利，然允許俄國在滿洲境內建築鐵道，又租借旅順大連於俄國，不過是從日本手中拿回送給俄國並且還外加許多禮物。到庚子年間，俄國藉口拳亂，駐重兵於東清鐵道沿線，意欲永久占領全滿。此時日本一面想報復俄國干涉遼東的宿怨，又一面想進一步實現大陸政策，因而釀成日俄戰役，在中國境內殺來殺去。從前中國政府想專從外交上討便宜，不在內政上想辦法，致日俄在中國境內開仗，無可奈何，只得宣佈局外中

立，以自掩其醜。更奇異的事情，是當時的國民輿情，有一種袒日反俄的傾向，彷彿以爲日本是爲中國打俄國了。然而戰事的結果，南滿成了日本的勢力範圍，北滿成了俄國的勢力範圍，中國並未能用外交的方法收回半點主權。從此以後，日本的勢力，日益深入南滿各部，並擴大到內蒙東部。俄國的勢力，雖在南滿方面退却了，又進入外蒙方面，造成外蒙古獨立的局面，訂立俄蒙協約，排斥中國主權。在日俄戰役前，日俄對中國的夾攻，是完全獨占的爭奪；在日俄戰役後，則是暫時均勢的深入。這種均勢式的夾攻形勢，到歐戰時期又有變化：便是俄國因爲參加戰爭，一時無暇東顧，日本藉口對德作戰，進兵山東，伸張勢力在滿蒙以外，又強迫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以求漸次襲斷全中國。於是國際均勢的局面，遂開始打破了，日俄夾攻中國的形勢也另入一個新階段。

第二大階段，自俄國勞農政府成立至現在，即自民國六年至現在。在此階段中，蘇俄雖曾宣言放棄帝俄時代的對外政策，然又以打倒帝國主義，實行世界革命相號召，而另形成一種新帝國主義，繼續向中國進攻。帝俄的遠東政策，其目標僅限於滿蒙新沿俄邊一帶；蘇俄的遠東政策，

則將目標擴大到整個中國。帝俄遠東政策的手段，是武力的壓迫，蘇俄遠東政策的手段，是巧妙的利用。本來中國久苦於舊帝國主義的壓迫，蘇俄利用此種形勢，提出「扶助弱小民族」的口號，以一面欺騙我國一面侵略我國。在「扶助弱小民族」的名義之下，蘇俄首將外蒙古造成一種傀儡組織，脫離中國而獨立了。這可說是完全繼承帝俄對外蒙的遠東政策。在蘇俄製造外蒙傀儡組織之先，日本也曾利用俄國舊黨謝米諾夫進攻庫倫，想將外蒙造成日本的勢力範圍。這是日俄均用傀儡夾攻中國的一個先例。自外蒙的蘇俄傀儡成立以後，蘇俄更進一步用傀儡的方式，侵略整個中國；那便是組織共產黨，冒充國民黨，造成民國十三年至十六年聯俄容共的局面。十六年以後，雖因全國一致反共的結果，共黨稍受打擊。然思想界散佈着傾俄的言論，幾乎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此外尚有「武裝擁護蘇聯」的共黨勢力，由中部各省擾亂到西南以及西北各省，幾乎一時不易肅清。最近共黨擾亂到山西，又喊出騙人的抗日旗號，可見其用意別有所在。十餘年來，蘇俄用共黨進攻中國的方法，是一面用理論欺騙青年，一面用武力破壞社會，使得中國受到致命傷，幾乎動也動不得了。

中國正苦於蘇俄利用共黨進攻的時候，日本又乘機繼續不斷的大進攻。不過二年的功夫，遼吉黑熱四省全被日本佔去，造成所謂「滿洲帝國」的傀儡組織，與蘇俄所製造所謂「外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傀儡組織毗連而對峙，更進一步，製造冀東的傀儡組織，策動冀察及內蒙傀儡式的自治運動，並以防共爲口實，強迫訂立什麼協定。於是我國文化發祥地的華北數省，也因不戰而漸次即於淪亡了。在華南方面如福建等省，日本也於暗中有所策動。

目前日俄間的空氣，雖時緊時鬆，但今後數年間內，尚不至引起直接的戰爭。日俄所以不至立即引起直接的戰爭之原因，自然很多，而日俄雙方均欲先行奪取中國，以爲直接戰爭的準備工作，實係顯而易見之事。日俄奪取中國的方法，均是以華制華，不戰而勝，因而形成一種夾攻的形勢。日本的攻法，是以滿洲做根據，華北做前衝，華南做側擊，而求漸次將整個中國置於日本控制之下，然後再圖直接對俄作戰。俄國的攻法，是以外蒙做根據，西北及西南等省的共黨做遊擊，以求擾亂中國，牽制日本，而獲得最後的勝利。至於用兵力與日本直接衝突，是俄國在今後數年內決不願幹的，自然更談不到以兵力幫助中國，最奇異的事，是在目前夾攻中國的過程中，俄國

國希望共黨猖獗，日本也似乎希望共黨猖獗，然後乃更有所藉口，進一步的侵略，使中國無可如何。同時日本因希望能更進一步的侵略，俄國以及共黨也希望日本能更進一步的侵略，然後乃為引起輿論的憤怒而盲目的左傾，藉解共黨之圍。假如只有共黨的問題，我國也比較容易解決。假如只有日本的問題，我國也比較便於應付。不幸這兩種問題同時加在我國的身上，成了一種夾攻的形勢，外難相反，內實相成。如其讓日本得假借防共的口實以壓迫我國，則共禍必更猖獗。如其讓共黨得利用抗日的幌子以擾亂中原，則國難必更嚴重。當前中國的最大危機在此。當前中國最大的難關也在此。宜如何挽救這個最大危機？又宜如何渡過這個最大難關？這是國人應該苦心焦思的一個大問題。關於應付這個大問題的一般意見，大概有兩種如下：

第一種意見，以為共黨擾亂後方，不易積極對日，只有暫且忍辱求和，將共黨解決了再說。這種意見，如果日本有個限度，不侵及中國的獨立主權之前提下，未始無放棄的餘地，可惜近年實際的教訓，是日本得寸進尺，毫無止境。中國雖盡量忍辱，——東北四省淪亡，華北成了九一八前的滿洲第二，日本還說中國「無誠意」，那有什麼和可言？照日本的想法，似乎是要整個中國放

爲滿洲第二，才算中國有誠意求和，那麼又要「和」幹什麼？對日一味忍辱，固絕對和不了，即對共黨問題也未必能澈底解決。因爲對日如果忍辱過度，則國民憤激的情緒無所發洩，勢必挺而走險，甚至共黨得假借抗日以欺騙民衆，引起更大的國難。中國有實力求戰，然後可使日本認爲中國有誠意求遠，否則永遠和不了。明瞭這一點，就可知中國對日的急務，不是過度忍辱，一味求和，而是準備實力，決心求戰。如此，而後民衆的感情乃有所寄託，共黨也不易假借名義，欺騙民衆了。

第二種意見，以爲若任日本進逼不已，整個亡國迫在眉睫，不如再來一次「聯俄容共」，共同對日。與其做流奸，毋寧做共黨。與其亡於日本，毋寧亡於蘇俄。這種意見，在共黨當然充心贊成，我們不必多所說明。在共黨以外的中國人們，如果是出於一時憤激之語，而未加一番深思熟慮，不免成了一種「左傾幼稚病」。我們也不必多所指責。但是如果既非共產黨，又是中國人，而主張再度聯俄容共以抗日，便有鄭重討論的必要。近年俄國立國的整個方針，是保持和平，關門建設，準備實力，鞏固國防，求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參戰國疲敝之餘，坐收漁人之利，決不願立即

冒險挑戰，以實力與任何國周旋。至於俄國對遠東的政策，是一面盡力避免與日本直接衝突，一面利用傀儡以間接牽制日本。爲避免與日本直接衝突，不惜出賣中俄共有的中東路，俄國整個勢力退出滿洲，爲利用傀儡牽制日本，不惜破壞中俄協定，與外蒙古偽國私訂俄蒙軍事互助談定書。甚至利用共黨由西北向冀察方面擾亂，以促起日本對華北更進一步的侵略。至於與中國聯合抗日，惹禍上身，是俄國決不願幹的。所以自中俄復交以來，雖然交換大使，俄國連商約也遲不肯訂立，還講其他！既然俄國的真實態度是如此，聯俄也未必能成，即令能成，也未必肯以實力相助。換句話說，除非俄國業已決定與日本開仗，是決不願與中國聯合抗日的。那末中國癡想聯俄，豈不是抓沙抵水，毫無實效的單相思嗎？這是就聯俄的不可能和無實效說。就是聯俄有可能，而且有效，也不過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甚至前門之虎未能拒，而後門之狼又進來了。較遠的歷史教訓，是甲午戰後李鴻章的聯俄，較近的歷史教訓，是民國十三年至十六年的聯俄；我們不要忘却！至於說到再度容共，更是荒謬。以前武漢政府時代堅決主張容共的某要人，最後不肯發出「非我不容共，實共不容我」的懺悔聲嗎？原來共黨也不過是一種理論化的赤色漢奸，實

在無法相容。你要當共黨，他未必容你當。你要藉容共來共同抗日，他未必真肯抗日，他現在雖然曾用抗日的幌子來騙人，但是他只能在雲南、四川、陝西、山西等省境內空口喊喊。如其真的抗日起來，共黨能赴前敵嗎？共黨能在後方搗亂嗎？共黨能不乘機擴大赤化運動，使抗日戰事受致命的打擊嗎？凡是真切了解共黨實情的人，凡是親與共黨交過手的人，對於以上各個問題都絕對不能提出確有保證的正面答案。那麼信口亂倡容共以抗日，不是適中共黨之計，並不足以抗日嗎？容共不准不足以抗日，而且反使抗日無法持久。如果不是別有作用的人們，便絕對不宜再倡了。

有的人說：「第一種意見既不妥，第二種意見也不行，那末，中國要救亡圖存究竟怎樣辦才好呢？如果照你的第三種意見，一面應付日本，又一面應付俄國，那不是很困難嗎？」自然，第三種意見是比較最困難的。目前中國的最大難關，既一面有日本進攻，又一面有俄國進攻，只有從夾攻中奮鬥出來。如想日俄那一方面不進攻中國，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國聯絡這一方面打倒那一方面，也未必可能，縱有可能，也是極危險的。中國應有中國的立場，中國應走自己的路徑，中國須

用自力守護自己的國家，中國應從日俄的夾攻中奮鬥出來。立國於國際競爭最烈的現代世界，是絕對沒有什麼便宜可討的，更絕對沒有投到他國懷抱中可以倖存的。外交有時也可以運用，但必須先在自己國內具備運用外交的資格。中國古代政治學家韓非子曾說過：「恃諸侯者，危其國。」這是頗撲不破的政治戒條。爲當今謀國者所必須遵守。過去四五十年中，中國曾經幾度想在外交上取巧，而結果只落得益發喪權辱國，漸次釀成今日整個亡國的危險。今後中國如欲得救，只有走最艱難的路，只有靠自力奮鬥，只有一面積極準備抗日，一面澈底肅清隱患。積極準備抗日，才可集中國力，使全國上下趨於一致。澈底肅清隱患，才可安定後方，使對外戰事易於持久。敵人已逼着着進逼了，我們不能再久忍耐了，不能再久等待了，不能再久猶疑了，我們必得全國一致加緊準備，從夾攻中奮鬥出來！

（見二十五年五月國論第一卷第十一期）

為國難告國民

陳啟天

曠古未有的兩重國難，同時夾攻中國：日本從外攻進來，俄國利用他操縱的共黨從內攻出去，使得經過五千年歷史，擁有四萬萬人民的中華民族，入了最後的關頭，有亡國滅種的危險，不得不令我們悲憤痛恨。我們悲憤痛恨什麼？一面悲憤痛恨日本的橫蠻，一面悲憤痛恨俄國的毒辣，其勢非使中國亡國滅種不止。但是我們既是中國人，眼睜睜看着中華民國行將亡國滅種，不能坐待亡國，做「候補亡國奴」，也不能坐待滅種，做古生物室的陳列品。因此，我們徒然悲憤痛恨是不中用的，我們必須於萬分悲憤痛恨中稍稍轉過念頭，澈底加以反省，澈底加以懺悔，澈底加以改造，古話說得好：「國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日本不敢侮他國，而獨

悔中國；俄國能伐中國，不能伐他國。（中東鐵路戰爭，是俄國正式出兵伐中國，滿洲國勦匪戰爭是俄國用改裝的便衣隊，即所謂紅軍伐中國）這必是由於中國自侮自伐，而有令人可侮可伐的所在。我們必須在這種可侮可伐的所在，澈底加以反省，澈底加以懺悔，澈底加以改造，然後才能從日俄的夾攻中，將中國救出來，以免於亡國滅種的慘禍。

中國民族令人可侮可伐的在什麼地方呢？我們應該很坦白的承認：我們民族的基本立場，即一般國民的基本立場，不適於近代的國際競爭，我們民族的基本態度，也不適於近代的國際競爭。近百年來對外的種種屈辱，都由於此，最近日俄兩國敢於拚命夾攻中國，也由於此。近代任何國家一般國民的基本立場是國家，基本態度是鬥爭，站在國家的立場上一致向外鬥爭。所謂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的國民固是如此，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如蘇俄的國民也是如此。所以他們都有舉國一致，令人不可侮不可伐的精神，我們將他們的基本立場與基本態度和自己的基本立場與基本態度對照着反省一下，便可恍然覺悟到中國令人可侮可伐的所在。我們一般國民的基本立場和基本態度是什麼？我們不妨將敵人對於我們民族的批評加以省察。去今十八年

前即民國二年，日本川島浪速曾著「對華管見」一小冊子，說明日本併吞滿蒙的必要與可能。他所謂併吞滿蒙的可能，即由於中國民族缺乏國民資格。茲引該書一節，以作反省的資料。

「由來漢民族之大缺點，利己心分外發達，奧巧黠性儒是也。若將其性情下一通評，則全爲女性的，毫無男性的意味；雖偶有慘酷暴亂之行爲，或悲憤激越之舉動，亦與婦人女子噴怒發狂之狀態無異，決非堂堂男性的勇氣所發動也。國民性化爲陰柔，即亡國之兆。」

「吾人之口頭禪，常喻漢民族爲砂。砂之爲性，就其個體檢查之，其團結如石，保守自身之力強固而易碎。中國人利己的觀念達於極端，其保衛國家之勢力，究不及我國人。砂之個體太堅，故黏着力完全消滅，雖引起多數而結合之，終不能作團體。是故中國人具有一種人種能力，而完全缺乏國民資格者，乃以此耳。」

中國民族的大缺點，在「全爲女性的」，「利己心分外發達」，「完全缺乏國民資格」等，雖出於敵人之口，我們不能不坦白的加以承認。此次日本強佔東北，以中國不抵抗而垂手得之，中國國內猶內爭不已，一般國民也無對日作戰的一致決心，都不外是女性的表示，利己心在暗中

作怪，國民資格缺乏的證據。我們要抵抗日本，並且要抵抗任何其他強權國家，必須先在我們國民的基本立場和基本態度上痛下一番改造的功夫。這種處所，如果不澈底改造，休想抵制日本，活該做亡國奴而已。

一一

我們一般人民的基本立場，簡單點說，是在自私自利主義的特別發達；分析的說，有的是個人的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有的是家族的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有的是地方的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有的是黨派的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因為這四種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遂使整個的國家亂如散砂，幾乎陷於不可救治的慘境。

何以說我國一般人民的個人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呢？個人的自私自利主義在中國最爲普遍而且澈底，但以自私自利爲惟一目的，不問個人以外的事件，縱有問及的，也不過是達到自私自利的一種手段。這種主義表現的方式有種種：第一種表現的形式好似是豬仔，只求自己

個人以及他的家族有吃有穿多活幾歲關在檻內也不管睡在坑裏也不管只要暫時可以享受甚至預備要上殺場也不管自然管不到國家大事這種人可以叫做豬仔式的國民第二種表現的形式好像是棉羊有毛給人穿有奶給人吃總算盡了相當的義務但對於強力的壓迫多是屈服不敢反抗所以對國家的大事不能發生一種積極的力量這種可以叫做棉羊式的國民第三種表現的形勢好像是蝙蝠朝秦暮楚覆雨翻雲是這種人的常態惟利是視惟勢是視是這種人的方針在這種人心目中無所謂是非曲直只要有奶便是娘有力便是理這種人可以叫做蝙蝠式的國民第四種表現的形式好像豺狼榨取並壟斷他人的利益以完成自己的安富尊榮小而言之強盜土匪大而言之軍閥黨棍都屬於這一類這種人可以叫做豺狼式的國民當前中國差不多全爲豬仔式的棉羊式的蝙蝠式的和豺狼式的國民所充塞雖然他們表現的方式各各不同但其歸結均在自私自利而不肯爲國家絲毫犧牲像這樣只講自私自利的國民怎能配做國民呢？又怎樣能使國家免於危難呢？

何以說中國一般人家族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呢？中國社會的進化尙未脫離宗法時代，

以故每人的宗法觀念仍非常濃厚。父母兄弟和妻子的關係將每個人捆得緊緊，不能放下，在未受教育的人們，不消說得，以此爲盡其天職，逃不出家庭的圈子。而已受教育的人們，以父母兄弟妻子的緣故，不敢大胆爲國家服務，致國家受了他們消極的損失。即在社會事業上稍稍有所建樹的人們，也爲家族的勢力所包圍，幾乎非有生殖器的關係，便得不到親信的地位。這一面不免於堵塞賢路，使人才投於無用之地，又一面不免宵小把握，致事業敗於冥冥之中。這種種情形，在中國可以到處尋得，考其歸宿，不外求家族的自私自利，既只求家族的自私自利，自然管不到國家的大事了。每個人顧問國家大事的意向，敵不過他營求家族利益的企圖，國事焉有不壞之理？

何以說中國一般人的地方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呢？地方的自私自利主義是擴大的個人的或家族的自私自利主義。地方或家族的利害關係，在一般無大知識的人們也能稍稍感覺得親切有味，所以地方的自私自利主義也能特別發達起來，地方自私自利主義表現的方式有兩大種：第一種視地方的利益重於國家的利益。在國家危難的時候，不求保持國家的利益，但求保持地方的利益。例如東北事變發生以來，有幾個地方有切實保衛那個地方的企圖，却無一個

地方肯用實力去收復東北。也無一個地方肯將東北事件擴大到他的範圍以內同受災難。地方當局利用這種觀念按兵不動。保持實力，以遂其個人的自私自利主義。雖然有些地方當局曾經通電主戰，而其用意在籍以博得同情，果真要他統兵出戰，他便縮頭了，還要藉口地方治安，不使輕離職守。這便是個人的自私自利主義假借地方的自私自利主義以達到其目的。第二種視同鄉關係親於其他一切關係。從前所謂直系和皖系，現在一切地方派系差不多全是以同鄉關係做結合的基本條件。任何國家利益都可不顧，惟同鄉的利益決不可犧牲，這是我們在政治上所習見習聞的。從前有人說某部成了某省會館，可見地方觀念之重。難怪一個稍有才能的人，不問是在公共機關或私人事業中都要盡力援引同鄉，以為只有同鄉才可靠，只有同鄉才能狼狽為奸，不相搗亂，這樣一來，個人的自私自利主義固可藉地方的同鄉觀念得層保障，而公私事業却為這種地方自私自利主義所敗壞，至於不可收拾。

何以說中國一般人的黨派自私自利特別發達呢？此節所謂一般人自然是專指與政治運動有關係的人們，原來黨派只是用來解決國事的，而目前中國的一切黨派，不認國家的利益趨

於黨派的利益，而認黨派的利益重於國家的利益；不認國權高於一切，而認黨權高於一切。因此黨與黨之爭，派與派之爭，循環不息，雖當國難正盛之時，而黨爭猶不肯止。只講黨爭不講國難的把戲，我們實在看慣了，用不着多舉例證。

由上說來，中國雖號稱一個國家，然組成這個國家的國民，都爲自私自利主義所浸潤。大多數國民沉醉於個人的，或家族的或地方的自私自利主義而不管國事，少數過問國事的國民又牢執着黨派的自私自利主義而忽略國難。像這樣的國民如何可以共救國難？我們要共救國難，使中國免於亡國滅種之禍，必須自己反省一番，將個人的、家族的、地方的尤其是黨派的自私自利主義剷除盡淨，確切覺悟國家的利益超於一切，有了國家，然後個人、家族、地方和黨派才有託庇的所在。大家犧牲一點個人的、家族的、地方的和黨派的利益，以共救國家，然後中國才能有得救的可能。總說一句，我們認爲在國難臨頭的時候，全國國民應該澈底加以反省，澈底加以覺悟，澈底加以改造的處所，即在自行剷除個人自私自利主義，剷除家族自私自利主義，剷除地方自私自利主義，剷除黨派自私自利主義；重新建立舍個人爲國家，舍家族爲國家，舍地方爲國家，舍

黨派爲國家的精神，如此然後才可以抵抗強敵國家及其他一切強權國家。

見二十年二月五日民聲週報第十期

爲國難告國民

二三三

國防中心論

二三四

巴澤的國防科學論

德國地理學家巴澤（E. Parso）以綜合的態度，發揮一種特殊見地之地理學而得名。巴氏自一九三二年以來，專心提倡國防科學的新科學。以地理學著名的巴澤，爲何要提倡國防科學的新科學呢？其科學之內容有些什麼呢？這種國防科學的新科學與地理學有什麼關係呢？此科學之提倡者，竟爲德國有名之地理學者，這是應該惹起吾等注意的。試將巴氏所提倡之新科學的成立與內容等，略述如次。

一 國防科學的成立

全國性的研究，爲現代研究方法的重大特色。自由主義時代，因分裂與懷疑，遂致減少了各

種事物的價值。到了國民主義時代，革新了自由主義的現象，是以國民主義時代的任務，對於自由主義時代所殘餘的斷片，是要依全體而與以綜合的研究，從無定形的人羣之混亂中，而應找出有定形的國民全體之單位。

像這持有全體性的努力，換言之，即是綜合研究的運動，雖在三十年前，已在此種傾向，但其實行，在大戰之中，始有徐徐的進展，其顯明的發達是在大戰以後。際此之時，所謂分析的傾向，均已掃除無餘。如此種變化，我們於一二種科學中，即可求得證明。例如地理學近來之綜合的研究，已代替了分析的研究。此種綜合的思想，是很明顯的要支配現時與將來，同時只有自此種思想，方可以希望國民精神的解放，這也是不言而喻的。

由於以上的思索之行程，巴澤遂發生了如下的疑問。元來的科學，都不足以保障德國民族，德國文化及德國國家麼？即位於歐洲中央的德國，強鄰逼處，危機四伏，用以保障國家及民族的生存者，沒有其綜合的科學麼？德國在各民族之中，欲不斷的防衛其生存競爭的特性，而沒有其直接應用科學麼？

一切的生活，都是「鬥爭」，社會的各種現象，沒有一件事不是起於緊張，這種緊張是什麼呢？即是相互間想着勝利的對立。例如有「土人部落」對抗鄰接的部落，欲其生存，則非自行武裝，偵察敵情不可，且對於各方面所受的攻擊，應積極的有先發制人的準備，假使毫不準備，當然是決不能保其自己的存在。就是每個人亦是如此，例如一思想家，在其用全體精神，創造一大作品，而欲達到成功的時候，則在本身之中，不能不盡力克服反對自己之思想，即思想中之矛盾，否則必為怠惰的思想家，決不能為真實的思想家。又如戰場之中，考察兵士的心理，其最勇敢者，也不能不繼續的克服與自己勇氣之並存的卑怯心。如此，無論我們從那方面着眼，都是不外乎鬥爭。發展是鬥爭，進步是鬥爭，指揮是鬥爭，服從也是鬥爭，連真正和平都不能出乎鬥爭。我們要揭破和平主義假面具的時候，就是不外乎依永遠的鬥爭，來得到永遠的和平。

因此不管是土人的部落，現代的國家或政黨等之何種人類社會成員，對其社會（即擴大的「我」）應貢獻相當的努力，依此種努力的程度，而評定其價值。例如在土人村落之中，尊敬有能力的戰士，及尊敬智慧超絕的老人，而輕視夢想家，獨身者，怯懦者及守財奴，蓋此等人類，對

於鄰接村落之鬥爭的生活，（即社會的主要生活問題）沒有何等貢獻。此種原則，即於文化高與或近代國家之人類間，亦沒有什麼變更。土人村落與歐洲國家之區別點，僅在空間的大小，成員的多寡及文化現象的單純與複雜而已。然而自己防衛與生活保障的思想，確沒有相異之處。是以將本身的生命、精神、生活及思想，全部貢獻於民族、社會及國家者，始得稱之為完全有價值的人類，否則不能為民族社會及國家的健全成員，決沒有要求其保護的權利，而且應給以輕視。政府對於此等國民，應講求處以放逐或懲罰的方策，且其積極有效的方策，即為加以教育而使之變為有價值的人類。所以巴澤極力主張今後法國人之創造，則不能不傾向於德意志魂的強化。這即是他之所以提倡國防科學之新科學的理由。依巴澤的思考，到了現在，法國生存競爭於各民族之間，能防衛「德意志魂」的直接有用的科學已不存在，就是哲學，也不能適用於此種目的之完成。現時各種科學，都是偏重於便利本身的目的，若要達到我們繼續保持「德意志魂」的目的，則不能不創造一新科學（國防科學）以作達到此種目的的手段。

二 國防科學的內容

國防科學是什麼？依巴澤的見解，國防科學是研究戰爭與國土防衛之一切問題的學問。這種學問的材料，雖說是取自各種科學，但必須依國家安全與統一的觀點，以考察和整理其材料的複雜性。巴澤氏說：「國防科學，是關於各民族與各國士，尤其是本國與鄰國的學問，即在一定目的之下，（即為維持本國的存在，對於將來的戰爭，作最有益之準備的目的。）研究本國，各國及鄰國之地域性，經濟力，交通力及心理等的學問。這就是自提高一國之國防目的，而應用其各種思想與創造的行為。故國防科學，不僅是限於戰術與戰略的範圍，而是關於戰略之一般的背景。國防科學，又不是狹義的軍事學與兵法，而是戰爭之準備行動及利用等所必要的一切知識之總體。因此之故，國防科學，雖選取材料於一切科學，而對於所取之材料，又必須依本國國防的特殊觀點，來加以統一的整理。」

巴澤所說的國防科學，不一定拘於固有的國家領域第一，全洲問題的提倡，不必依任何科

學而處理；第二，對象選擇的觀點，亦不必依任何科學而處理。因其對象選擇的觀點，與任何科學都不同，而有特殊獨立的性質，依此種事實，宜于國防科學之獨立性的基礎，是不會錯誤的。依巴澤的見地，國防科學，是自特殊的觀點，而考察空間，經濟交通，政治及民族心理等的各方面。

第一，關於空間部分者，常稱為國防科學的空間論。即是自政治的及軍事的行動之關係，而考察其空間。蓋空間者，為一切現象的基礎，各個國家，都是普遍之空間的一片，依特期的標識，而與其他空間部分，有所分別，但依國境而區分為最多。所謂國境者，在平時給與政治家之活動的界限，在戰時為其軍事長官守衛的前提條件。空間的廣狹，崗嶺的起伏，植物的多寡，氣候的燥濕，等之空間的特性，足以影響於戰爭行為之決定。例如空間的廣大，使軍事長官的行動範圍，亦必擴大，軍事的行動，也必至緩慢。因為有交通距離之遠近，與運輸時間之長短的關係。抵抗軍在廣大地域之上，常較之攻擊軍，佔有利的立場，因為廣大的地域，不容易取包圍的形式，乃因其易於後退之故。即於追擊之際，在防禦軍威力之下，亦易於進展。蓋後退之防禦軍，漸與其軍力之心地接近，而敵軍又與其軍站地漸次的離遠，而軍力漸弱。且防禦軍在利於防禦的地點，能作禦

防的設備而敵軍以長時間行軍的疲勞，接後開始戰鬥，故頗難制勝以逸待勞的防禦軍。在廣闊地域之中的戰鬥，常採平面的攻擊，是以非使用多數的兵力不可，況且敵軍又極難採取包圍攻擊，遂不能不採正面攻擊的形勢。因此，敵軍即能偶得勝利，他所受的損失，亦必甚大。如一九一五蘇俄之野戰即其明證。

第二關於經濟部分者，即爲國防科學的經濟論。即根據戰時使用之可能性，而檢討其一國的經濟，尤其是關於生活的必需品及其工業原料品，必須與以特別的整理，經濟準備不充分的國家，對於長期的戰爭，受有如何重大的影響，在世界大戰之中，已經飽受了經驗。依此，可知在戰爭勃發之先，首先就不能不特別注意於經濟防備，例如生產充分的生活資料，製造充分的軍需物品。有如此準備的國家，始能開始近代的戰爭。當戰爭近於開始之際，農業國家必須要向兵器、彈藥、衣食、料糧之軍需供給的工業國，要求同盟；而工業國家，也必須向農業國家，請求同盟，或依本國的力量，而增進農產品的生產道。當世界大戰之際，農業國的蘇俄，武器缺乏的時候，把徒手的聯隊，送入戰線，拾集死傷兵士之武器而與之。次如工業國家的英德兩國，英國本爲世界海洋

之支配者頗能設法調濟生活資料與工業原料，而德國原來的生產地方，被其隔絕，生活資料與工業原料，均無法調濟，故其戰鬥力量，每日有很顯著的衰弱。如此，則認識一國之戰爭經濟的地位與指示其強化的方法，為國防科學的第二任務或使命。

第三，關於國防之交通的部分，即謂國防科學的交通論。所謂國防科學交通論者，即是研究戰時經濟財物之移動，與其生產加工及工費的場所。更要自軍隊輸送及戰鬥時之軍隊移動的觀點，而研究其國土的地形、軍事長官，當其戰鬥之時，對於如何使自己的國軍有利，使敵軍限於不利的地形等情，應考慮其最善的方法，即應使用最短的時間，節約空間，而威脅敵軍，使之陷於不利的情勢。

第四，研究國防民族心理的部分，乃謂國防科學的民族心理學。此種民族心理，在戰爭之際，從來是不大顧及的，但當現時，欲有所戰爭，對於國民心理的狀態，是決不可以等閑了。故當其準備戰爭之時，對於本國國民、敵國國民及中立國國民之心理構造的若何，不能不預先充分的加以檢討，而有所洞悉。例如趨使緩慢的被動的心理的國民，作迅速的攻擊戰爭，與使用熱情的乏

持久性的心理的國民，作長期的防守戰爭，是同樣的不合理，是以當戰爭之發生，必須應各種民族心理之不同，而決定其合理的有利益的戰爭方式，始能應機制勝。

在軍事的使用目的之外，爲着宣傳的目的，也有研究民族心理的必要。例如從德國而奪得全世界之好感的英國宣傳，確足以證明民族心理的正確知識與民族心理的傾向，是怎樣有效的武器。首先要激動本國國民戰爭及持久的心理，次須消滅敵國國民的戰鬥心理，其最重要者，尤須引起中立國的同情心理，苟能依輿論的指使與精神的趨向，誠有戰必勝，攻必取的把握。

三 國防科學的方法

如上所述的内容，國防科學的研究方法有二。第一，爲選擇觀察對象的材料，而作普遍概觀的方法；第二，爲檢討地球上各國國防科學地位的方法。依此，國防科學，可以分爲普遍化的部分與特殊化的部分。所謂普遍化的國防科學者，是自一切科學之中，選其國防上應利用的材料，而加以整理，且對於所選得的各種材料，宜把握其普遍的妥當性，而使之有合法的積集和統一。

空間，當然是國防科學的根本要素。如自然的國界，國土的形勢，及本國內的氣候，物產與水陸交通等，均須以戰爭爲出發點，而有系統的構成。每一國家之國防力的增進與退化，要看四隣逼處之本國的地位如何，因爲一國之位置，頗有決定一國安全與否的意義。例如德國之位於歐洲的中央，可謂是不幸的地位，因在此種位置之中，伏有多少不利的根源。第一，德國被弱小民族及各個小國的包圍，此種各民族及國家，均恐懼德國國力的發展，而不利於本民族或本國家，故盡力的依政治的手腕，壓小德國的力量。第二，德國由此等多數持有敵意的國家，及容易封鎖北海與大西洋二出口的英國，屢受世界經濟封鎖的壓迫。在德國的戰略，政治，經濟及交通等的國內戰線，誠因此而使之更加緊張，可是也飽受了多少的側面的壓迫。即德國國力的進展，不知該經歷了多少的障礙與困難。

④ 土地的各种形態，對於戰爭的行動，也含有重要的意義。軍隊的運用，尤其是大軍的操縱，常受地形的支配，因爲軍事行動，是不能不依從地形的法則。高山如阿爾卑斯山脈，當爲極堅強的天然國境。德國是位於阿爾卑斯山脈的北邊，故此德國的國防，對於南方諸國，頗感覺十分安全。

憑藉於阿爾卑斯山脈的德國，占有自然之堅固的地位，蓋德國可以由阿爾卑斯山脈，俯瞰敵軍的行動，與妨害敵軍的行動，並且自南進攻德國的敵軍，因山脈的重疊，而妨害其大軍的展開。在狹小河谷之中，交通不便，其軍隊的繼續補充，頗覺困難。低平地段的戰鬥，則與此相反。例如東普魯士與波蘭的低下平原，是一種國防力薄弱的國境，此等地方的敵軍禦防，僅能依河流坳地而行動，在後防的平野地與沼澤地，以待敵軍的攻擊，但是敵軍在廣大的平原之中，到處可以自由的展發大軍，且依廣大的森林，飛機得以充分的偵察陣地。

關於戰鬥之空間及地形的重要性，既如上述。其次應申述人種及民族的重要性。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這是能發揮民族特殊力量的緣故。因此，政治家與軍事家，想賴此而奏有效的行動，則對於本國及外國的民族性，不能不有正確了解。是以國防科學，有依民族心理的觀點，而加以明確檢討之必要。在戰時的宣傳競爭，收了如何的效果，作了怎樣的直接武器，當世界大戰之時，不知有了多少實例。現時較大的國家，都是綜合幾個民族或幾種種族而成，即是幾個血統相異人羣，而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國家。是以在同一的國民單位之中，包括了血統言語文化生理及

心理之不同的幾個民族，在此等各自不同的民族之中，其力量與意志最堅強者，都是以自己的意志與理想，來強制其他民族使其他民族之意志與性格，漸次消滅。例如在一國內的各個民族，都是在日耳曼民族支配之下，而組成了統一的德國。即是在一國之內，種族及民族雖云複雜，只要民族性能夠同化與統一，也足以發揚國防上的戰鬥力量。

以上所述，均是關於空間與民族對於戰爭行動之重要的原因。其次要說明由此兩者之混合而產生的經濟要因。現在不管什麼國家，若準備與敵國作長期的戰爭，則必須要與生活資料或工業原料充分的國家，實行同盟，且要保持與本國往來的交通，以資軍需與食糧的供給。對於此種經濟問題，未曾特別注意，而缺乏認識者，如大戰之中的德國，故結果招來了慘敗，當可為明確的例證。最近之工業化與世界交通的進步，及殖民地之支配進展與人口增加，故現代的經濟生活，較之前半世紀，已呈根本相異的現象。其結果，歐洲諸國，均感覺其食糧、衣料及原料等不能自給。在戰爭時，當為更甚。蓋當戰爭發生時，需要莫大的生活資料與工業原料之故。因此，為顧慮生活之經濟問題計，當戰爭發生之先，遂不能不決定對於各國的同盟政策，以確保食料的供給。

且要時時注意貨物運送的保護。在今日世界中的各國，除英國與美國之外，其戰時必需品都不足以自給，故各國有確定戰時經濟同盟的必要。

在此處我們應當敘述的，是軍隊與技術的問題。每一國家，必須要深切知悉各種兵隊的差異與必要。司令將校及兵士三者，為構成軍隊的三要素，彼等是由於相互依賴與相互協助而存在。且在現代戰鬥之中，不僅是限於軍人，即軍隊的概念已是很顯著的擴大化了。蓋現代的戰鬥，不徒是軍人的戰爭，而是全體國民的戰爭。即全國之內，製造軍需品的勞働者，後防傷兵的看護婦，及引導青年勇敢感情的老人，都可以說是參加國民戰鬥的兵士，而且都是站在第一線的兵士。其次為戰爭手段的技術，在實際上，現代戰爭之一切應用的技術，較之以前的戰爭，其性質恐怕是完全相異。例如數學與物理學，化學與生物學等之互相的協助，所作成新武器與交通機關，吾等的祖先，恐怕未曾夢想得到。例如鐵甲車，坦克車，飛行機，高射砲，潛水艇等新武器，可以迅速的攻入敵國的腹地，而破壞敵國的要塞，兵營，工場及車站等軍事機關。其餘如機關槍，聽音機，毒氣，死光及火箭放射器等，能發揮偉大的戰鬥力量，同時，依生物學的力量，能使敵國的細菌，迅速

的蕃殖，以促其傳染病之蔓延於通國。

將來的戰爭，不只是軍人，即全國的民衆全體，也不能不精神的及技術的武裝起來，因為戰爭的時代，已成過去的史蹟，而走入了全國民衆武裝之各種戰線的時代。近代的技術，對於現代的戰爭，雖有莫大的意義，但關於戰爭的英雄思想，仍有不少意義。就是持着鎗砲向敵衝鋒陷陣之技術家的兵士，也是以英雄思想爲其精神的基礎。依此種精神的基礎，彼等技術家，才有其勇於滅敵的行動。

四 國防科學與教育

如上所述之國防科學，我們要如何始能變成精神的國家的及軍事的生活中之要素，茲述如下。我們對於國防科學，應首先分爲純理科學的部份，與應用科學的部分。所謂純理的國防科學者，即是以純理論的觀點，來認識關於國防的各種事物與關係，以此等事物與關係爲對象，加以哲學的考察，而證明戰爭爲道德理想，依此發現各種處置的方策。所謂應用的國防科學者，即

是研究各個事理的改造，以保持對於敵國的優勝地位。此種研究的結果，不到戰爭發生之際，是應嚴守秘密的。例如一九一八年的自二十軒之遠距離而射擊巴黎的大砲，即其實例。

其次國防科學應分爲研究與教育二部份。所謂研究者，是屬於純粹理論的領域，乃依國防科學之精神的認識而邁進。所謂教育者，即是使國防科學的思想與知識要廣汎的普及於全體國民的心理，其普及的方法如次：

1 設國防科學的科目於大學或專門學校。

2 設國防科學的課程於一切學校。

3 在大學、中學及小學之中，施行國民之關於國防科學的遊戲與運動。

專門學校及大學之中，開設國防科學的講座或學科，是負有國防科學之研究與教育的兩種使命。故普通有高級學院的教授，依獨立的研究，而努力於新興學科的成立。例如地理學者對於地域與氣候，人種與民族心理，經濟與交通，及地圖學與政治學等，都把他當作國防科學的問題來研究。並且組織成一種普通的講義，而爲國防科學之全體的概念，使各科學生易於了然。此

等青年學生，當其在專門學業之後，均能充分理解關於國民生死之最重要的問題，至當教員的時候，對於學生能講述國防科學，使全體國民，都可明瞭國防科學，都能夠擔負國防的重責，對於中學及小學的學生，更應極力提倡國防的運動，其目的如次：

- 1 使青年國民，爲德國的民族社會，而涵養英勇的性操。
- 2 貫輸男女兒童的國防思想。
- 3 使青年明白空間，民族性，戰時經濟，軍制，戰史及戰圖等之重要國防科學的概念。
- 4 使全國國民，能明瞭各主要國家的國防位置。
- 5 當青年受訓練及其野外行動之際，在心身方面，也應使之慣於國防之運動的要求。

如上所述，要使國防科學普及，當然是不能不蒙多少的犧牲，這是不待說的事實。可是現在的德國，其重要問題，就是應如何能保證國家生存的問題，及國家生存與國防科學的有如何密切關係的問題，故不管犧牲的多寡，也要達到國防科學完成的領域。現在的德國，即是被壓迫時代的德國，在考慮德國的精神文化的危險之前，更不能不想到德國國家之生存危險。但是當德

國防科學的完成及學校國防教育之普及的時候，即是德國國民要求國家安全之戰爭爆發的時候。

五 結論

巴澤所提倡之國防科學的概念，既如上述。但是巴澤氏爲什麼要提倡此種國防科學的新科學，而且要將此種新科學普及德國全體國民呢？若稍加思維，則可知這是歐戰後德國之社會現象所應有的必然產物。想掌握世界霸權的德國，希望此種大野心的實現，遂不惜賂國家的存亡，而踴躍的應付世界大戰，經過四年半的血戰，終於敗北，據一九一九年的凡爾塞和平條約，戰敗了的德國，招來了悲慘殘酷的命運。本國領土的一部分，殖民地的全部，及全部的戰艦隊與商船隊，均被敵國奪取去了。且規定了浩大的賠款，限制了軍備的範圍，使世界第一等國的德國，一旦而顛覆到三等國的地位。從此種慘敗的境遇，要重整旗鼓，再發展到如大戰前的強國，這是大戰後之德國國民的指導理念。彼等日夜不懈的爲德國之復興與發展，盡力表現了德國之不屈不

機的精神，如國家主義所支配的「拉基斯」之發展，從德國的社會現勢看來，爲其必然的產物。就是巴澤所提倡的國防科學，也是應德國之社會現勢的實際要求而發展。那末，國防科學的特徵，是很明顯的，着眼於實際與教育手段了。

國防科學之提倡者巴澤說：「昨日之敗者，即戰明日之勝者。苦於大即時敗此之德國的國民，不能不準備未來的決戰。德國要取法一八七〇年以來之法國國民的行動，依最後的努力與注意，以備將來的復興。因此，不只是重新振理粉碎了的軍隊，且必須考慮戰爭時需要如何的精神與行爲之總體，與如何整頓國民全體之精神狀態的問題。依此種的需要所產生之一切精神的準備，一概可以綜合於國防科學之名稱內。」國防科學，是一國國民之國防意識的精神表現。所謂昨日之敗者，即明日之勝者，對於大敗於世界大戰的德國國民，給與了莫大的安慰，且可以爲鼓動反抗心的名言。國防科學的思想，浸透了全國民衆，而洵湧期待將來之決戰的德國民衆，精誠團結，以確信彼等之將來的勝利。」依此，可知德國是因爲要等待明日的戰勝，而始有國防科學的提倡。本來戰勝的方策，只依軍人的研究，就可以的。但是依巴澤的見解，以爲今日的戰爭，

不只是單獨的軍事上的現象，且爲經濟能力、技術能力及心理能力等的現象，戰爭也不只是將校與兵士的行動，而是依經濟家、技術家、化學家、民族心理學者、新聞記者、地質學者及地理學者等之協動的行爲。是以戰爭之時，非軍人亦應有與軍人同等的權利與義務。因此，將來之戰爭，決不是某階級的事情，而是全體國民的共同職責。軍隊的派遣，不能完成整個的戰爭，即軍隊只能完成一部分的戰爭任務，蓋國民若不全部的參加戰爭，則無法發揮經濟的技術的及精神的一切力量，是否能操勝算，當爲莫大的問題。因此國民之在平時，遂不能不保持特殊精神的態度，以作將來堅苦戰鬥的準備，應乎此種目的，才有所謂國防科學的產生。總括一句，國防科學的提倡，即是國民國防意識之精神的表現，愛國情操之理性與概念的結合，及對於敵國外患之自力更生的自覺。

（按本篇原文見日本地理學雜誌第三卷第十，十一，十二號譯文見二十五年六月國論第一卷第十二期）

國防中心論

二五四

59
7-31
(3)

